千里“无人区”

陈平 著



千 里"无 人 区"

陈 平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 北京

(京)新登字071号

责任编辑:曾　平
封面设计:胡燕欣
责任校对:邹祖兴

千里"无人区"

陈　平著

出版发行: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5.5印张　120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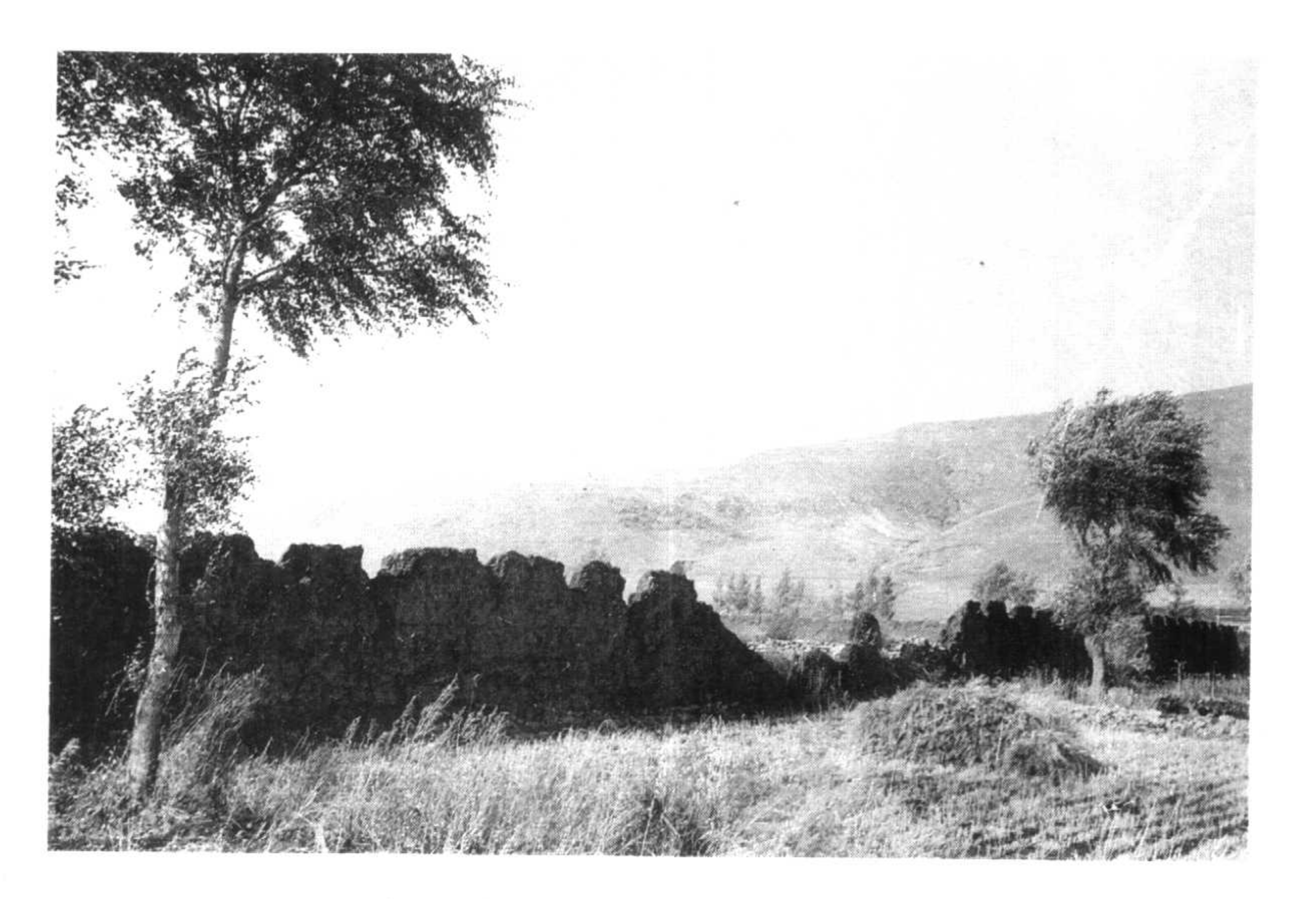
ISBN　7-80023-497-5/K・482
定　价:4.10元



滦平县周四沟部落



赤城县碾子沟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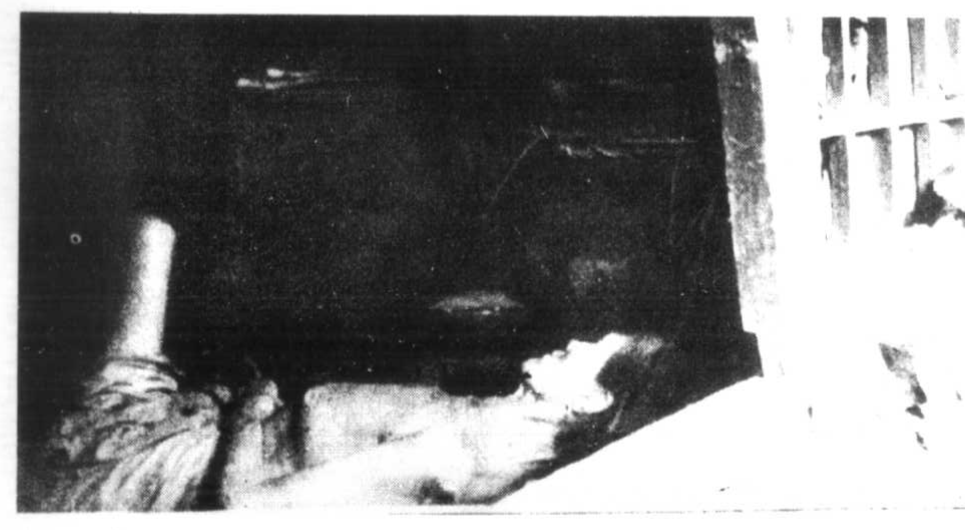
丰宁县大滩二道河子部落遗址



封锁“无人区”的沟壕



「无人区」人民背井离乡





「无人区」妇女



“无人区”儿童


承德水泉沟万人坑的骸骨


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军民在采集野菜


民兵在布石雷

自　序

我的一生同“无人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故乡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一个重点地区。1942年和1943年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是日军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最疯狂期间，我曾坚持在“无人区”里。为了对这段特殊的战斗生活记录点文字，从1962年以来，我在研究冀东革命史的同时，一直研究“无人区”斗争这一历史课题。这本书先后已四易其稿，是我多年的研究成果。

“无人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在中国敌后战场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不仅在中国鲜为人知，在世界战争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我曾写过论文，发表后，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认为“无人区”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壮烈的“一个特写镜头”之一；而“无人区”的研究成果则“填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尽管我曾经亲身经历过“无人区”斗争，但由于当时自己只是个“小八路”，不了解“无人区”斗争的全局和实质，而历史资料又非常缺乏，“无人区”现象仍然是个谜。因之，我在着手研究“无人区”之初，就力图从宏观上把握“无人区”历史，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要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而共产党八路军又为什么那么顽强地坚持“无人区”斗争？从宏观视角出发，多方搜集资料。

通过对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历史文献的分析，认识到中共中央从决定开展冀察热辽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之日起，就是从战略高度着眼于开展东北地区游击战争，最终收复东北的。通过对日本方面历史资料的研究，则看到日本首先侵略我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进而“确立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是侵华战争中最基本的战略环节。横贯冀察热辽的长城线，正是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日本侵略者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其性质不仅是战术战役措施，而是为了构筑一条庞大的绝缘体式的战略封锁线，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向东北地区的推进。敌我双方长年激烈的战略争夺的态势，构成了“无人区”斗争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特殊的残酷性。

我是个笨人，在多年研究“无人区”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资料的搜集上，是下了一番笨功夫的。从1962年开始，我着手研究“无人区”，当时文字资料几乎是一无所有。我就点点滴滴地搜集资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止，好在搜集到的部分资料侥幸保存下来了。1980年以后，又重新研究“无人区”，直到1990年，我跑遍了北京、南京、沈阳、抚顺、长春、大连、承德等地的档案部门及研究机构。虽然吃了一些苦，但从一无所有而积累了千余万字的历史资料，对“无人区”斗争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给这本小册子提供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也是苦中之乐吧！

粗略估算一下，我对“无人区”课题的研究，前后历时近30年，纯工作日约有7年之多，而80%是用在资料搜集上的。当然，不是说我的工夫就够了，也不是说所有的课题研究都得这样去搞；只是说，要搞历史研究，就得首先肯在资料上下笨

工夫，从宏观到微观，“上穷碧落下黄泉”，把工夫下到家。资料占有越充足，课题成果内容就越充实，这一点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我搞研究工作绝不仅仅满足于文字资料，写论文，也不是从资料到资料地堆砌，而是尽可能地作实地考察，取得必要的感性认识。在研究“无人区”的过程中，我还曾多次深入实地，对“无人区”遍及长城内外的26个县，进行实地访问，行程两万余里。对当年的主要抗日根据地、重要战场、烈士牺牲地、惨案现场等都作了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得到了各地领导、党史部门及乡亲们的支持与帮助，使我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和感性知识。在此向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有人会说，历史已成为生活的陈迹，怎么能够取得感性认识呢？我在实地考察实践中得到了切身感受。尽管我当年曾在“无人区”里战斗过，可是当我再次来到根据地的深山密林之中，那山山水水、一树一石都使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就象又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望见了遮天蔽日的烽火，引发了对历史深沉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如今以历史研究者的角度重新考察“无人区”，感受大不一样，重温历史，认识得到了升华。比如，资料中对坚持“无人区”的英雄人物、冀热辽军区第三区队长高桥烈士的牺牲地点、时间有几种说法，为了考订准确，我就去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八素台老西沟去实地调查。不但时间、地点搞准确了，而且无意中发现这里的地形非常独特，老西沟的进口处叫葫芦峪口，层峦叠障，九曲回旋，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去处。据群众讲，古时曾有一伙绿林好汉在此凭险聚义多年，官兵奈何不得。可是，当1944年三区队到这一带活动时，这里已被日伪统治达12年之多，还没容得开展群众

工作,日伪军就反复“扫荡”,在群众中连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等起码的抗日工作都没能组织起来。结果,尽管有那样好的地理条件,而没有群众的屏障,三区队终于在老西沟遭到日伪军的袭击,蒙受了全军覆没的惨重损失。“无人区”斗争中有无数类似的事实,使我深深地认识到,群众路线就是共产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正象长年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八路军第十团团长王亢说的:“八路军没有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群众的支持。”由此我对这本书的主题思想之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写起来就把握得更准确。

对我这样长年累月执着地探索一个课题,千里万里跋涉进行实地考察,是遇到许多困难的。我自己也闪过这样的念头:既然“无人区”的论文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学界的好评,也就说得过去了,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自讨苦吃。可是,当我回到了战斗过的老根据地,见到许多地方当年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群众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我站在烈士的无名墓碑前默哀致敬时,更是感慨万端。这些未曾谋面的战友们已长眠地下,连个姓名也没留下,而我却幸存下来了。这幸存意味着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牺牲者,也就没有我这个幸存者。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戈留欣诺村的历史》一文中曾说:“我觉得写完了戈留欣诺村的历史,我已不需要活在世界上了,因为我已尽了义务,可以长眠于九泉了。”我身为残酷的“无人区”斗争的幸存者,必须尽责任、尽义务把“无人区”斗争的历史记录下来。所以,我暗下决心,鞭策自己,甩掉资历、级别、待遇等等身外之物,挤班车、住小店、开步走,跋山涉水,也就不在话下了。

我谈的这些考察中的感受，虽然不能写进书里去，然而对研究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实地考察结果，不仅充实、考定了不少重要史实，而且调动起我对"无人区"斗争的感情，一切资料、文字在我眼前都活了起来。我还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搞革命史研究必须对党对人民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与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感情用事是两码事，也不是说在行文中滥用感情色彩的形容词，而是说，应该把革命感情作为研究工作的动力源泉，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深厚的革命感情与严谨的治学态度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工作。

我经历过"无人区"斗争血与火的洗礼。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种种暴行，所以在积累资料过程中，特别注意对日本方面资料的搜集，对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的种种罪行，桩桩件件、方方面面，不仅取得中国方面的确凿证据，而且尽量取得了日本方面历史文件、历史人物及史著等方面的佐证。1982 年，我撰写"无人区"论文第一稿，就是针对当时在日本发生的篡改侵华历史的"教科书事件"，用历史事实，驳斥那种否认侵华罪行的谬论。1988 年，我在《一个特殊战略地带——长城线上"无人区"》(第三稿)一文中，揭露日军制造"无人区"罪行的内容更加充实了，引起日本学者姬田光义、丸田孝志等的重视，并专程到中国来。在我的陪同下，他们对"无人区"作了考察，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与我的论文共同收入《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介绍到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学者及报刊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制造"无人区"是日军侵略中国战争中一桩重大战争犯罪的历史公案，是"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事件集大成的体现，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思想体系的集中表现。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中国人民并不愿意再去掀动那页悲痛的屈辱史。然而，在日本却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在翻历史的案，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侵略战争的罪行，甚至美化战争。就以制造“无人区”的罪行来说，在日本官方史著中被一笔抹煞，而在日本防卫厅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则被美化成“保障农民生活”等等。这是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这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再次伤害。每当听到这类喧嚣，使我这个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依稀间又看到了刀光血影，似乎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或者是以某种“冷战”的形式在继续着。

历史不能忘记，天真地轻易地忘却历史教训，是要受到惩罚的。血与火的历史永远发人深省！

目　录

一、“千里无人区”的由来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攀上燕山的崇山峻岭，逶迤向西，经由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口、黄崖关、将军关、古北口、白马关、靖安堡，抵独石口一段，长约850公里，雄关要塞，虎踞龙盘，是连结华北与东北的枢纽，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向东向北锁住了热河、辽西两大战略走廊，向南则虎视华北，直下平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这段长约850公里的长城线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同时，共产党领导着抗日军民，也顽强地坚持在长城线上的抗日根据地里，并持续突破“无人区”封锁线，向东北推进，展开了举世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史家称作抗日战争史中最悲壮的一个“特写镜头”。

（一）两　条　屈　辱　线

1933年元旦之夜，山海关车站附近一声爆炸，几记枪鸣。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驻在山海关的日本军队，又使出发动侵略战争的贯用伎俩，自制事端，自我报警，自动出击，一举攻陷了要塞山海关，扼住了辽西走廊的咽喉。紧接着就发起了热河事变，2月21日开始，日军纠集一部分伪军，共10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省进攻。当时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孙殿英等军阀，都是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土壤里生出的烂果子，吞噬自

己同胞如狼似虎，在异族入侵者面前怯懦如兔，望风而逃。三路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于3月5日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10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紧接着日军进逼长城，闯入冀东，威胁平津。

一心内战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舆论和顾全“面子”，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并以亲日派分子黄郛主持华北政务。何、黄二人达成默契，一个作招架抵抗，一个斡旋求和。长城抗战打响后，主帅抗战不力，临阵携贰。30万大军在长城线上一字儿排开，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协同配合，没有主动出击，只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全国人民潮涌般地支援，前方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而何、黄亲日派却向侵略者暗送秋波，频频接触，乞求停火。日军很快突破长城防线，席卷冀东，直捣平津。1933年5月31日，一纸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宣告长城抗战彻底失败。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定，在祖国大地上划出了两条屈辱线。

一条是尽人皆知的《塘沽协定》中明文规定了的所谓“军事分界线”，西起延庆，经由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至芦台。从“军事分界线”至长城线内的冀东地区，成为所谓的“军事缓冲区”，中国、日本军队都撤出“军事缓冲区”。这条“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所谓的“军事缓冲地带”的冀东，实际上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道屏障，又是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的“滩头阵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华北以至全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大，这条“军事分界线”无声无息地消失，只在万里长城这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一笔屈辱债。

再一条屈辱线是鲜为人知的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这条线的划定，没有经过中日协商谈判，也没有写进任何协定条款，而是由日本单方面划定的。

《塘沽协定》中含糊其词地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一线”，日本侵略者却毫不含糊地沿着长城，从山海关到独石口一线，为伪满洲国划定“西南国境线”，把新占领的热河省正式划入伪满洲国版图，而且“顺手牵羊”，将长城外侧原来归属华北的兴隆、青龙两县及密云、怀柔、延庆、赤城各县的部分地区，一古脑地划入伪满洲国。行省已任人宰割，又何惜这县、区之地，国民党政府对入侵者抢占领土的强盗行径未置一词。这条“国境线”也就成为后来制造“无人区”的中心轴线。

（二）所谓的既定“国策”

万里长城，这华夏古老文化的象征，却被隔海而来的侵略者当作什么“国境线”，在当时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这要从日本所谓的既定“国策”即“大陆政策”说起。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其“大陆政策”的基调；而首先征服满蒙，是其“大陆政策”的先决条件。据《日本近代史资料》记载，日本军本部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从战略上来观察，它（指满洲）本身就形成一个战略关键据点，在这里形成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战略枢纽之地”。所以，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四省之后，就视为吞到肚里的一块肥肉，是至死也不肯吐出来的。在其侵占东北的 14 年过程中，始终将满洲与日本本土视为“一个整体”，完全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

按着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满洲既是日本的“国防第一

线”“生命线”，那么，在长城线上划定的“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也就是日本的“国防第一线”“生命线”了。

日本这种“确立满洲”的“国策”，从其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1937 年 12 月 21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德国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在其拟定的《日华媾和谈判细目》的九项条款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①] 嗣后的一系列斡旋“和平”的国际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有许多变化，但是始终坚持“承认满洲国”。直到其覆亡前夕，1945 年 5 月 11 日，日本祈求苏联出面斡旋，“体面地结束战争”，提出了诸多对苏联的“让步”条件，甚至于按其强盗的逻辑，提出将中国的内蒙也“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然而仍然坚持“维持满洲帝国的独立”[②]

在日本的整体军事力量配备上，将其最精锐的战略总预备队 70 万关东军，不是驻在本土，而是盘踞在中国东北。直到战败前夕，在日本军界甚至叫嚣宁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足可见满洲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日本侵占热河之后，就把热河纳入伪满洲国体制，加强统治。特别是在其所谓的“西南国境线”上，更采取了一系列“固边措施”，重兵防守，加强控制，在长城沿线各大小关口都设置了边防警察所及边境海关等机构，严密封锁，俨然成了不可侵犯的“国界”。所以到后来，当其“国界”受到“侵犯”时，就采取了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残酷措施。可以

①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50 页。
② 同上，第 537 页。

说,“满洲问题”就是“无人区”的宏观背景,而“无人区”斗争则是反映“满洲问题”的一个聚焦点。

(三)抗战到底之“底”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一直在策动“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为筹码,求得与日本的妥协。而国民党政府不但当初以其“不抵抗主义”断送了东北,而且在国际“远东慕尼黑”阴谋策动及日本的诱降攻势下,屡屡动摇。最露骨的是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竟然公开声称: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那么,七七事变以前丢失的东北三省、热河及冀东呢?不要了吗?这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准备接受日本再三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与日本侵略者达成妥协。

中国共产党坚持最彻底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同一切妥协投降及“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以实际行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实现收复东北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1936年7月16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对日妥协的舆论,斯诺问毛泽东:“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明确申明共产党的立场,说:“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①]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对“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4页。

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特别是针对蒋介石准备牺牲东北的错误言论，坚决而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1]。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以战略家眼光指出了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

二、大出击　小集家

(一)撕开伪满“国境线”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挺进冀东创建冀察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委及冀东党组织的多方准备，于1938年6月1日，八路军第四纵队(简称“四纵”)奉命出击，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出发向冀察热地区挺进。一路斩关夺隘，攻延庆、袭赤城，克昌平，进而撕开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进入热河西部滦平县白河流域与丰宁县黑河川，展开强大攻势，连克永宁、四海、千家店、黄花城、大庄科、八道河、汤道河等重镇。沙峪遭遇战，歼日伪军200余人，花盆一战消灭伪满军一个营，缴获甚丰，使一路苦战的消耗得以补充。

为了在平北，热西地区站住脚跟。跨长城内外建立了滦(平)昌(平)怀(柔)抗日联合县政府，并留下一个大队一个独立营坚持游击战争，四纵主办继续东进。

6月12日，分头前进的四纵主力到达雾灵山西侧密云、平谷长城南侧一线，稍事修整，即分兵三路，再次越过伪满“西南国境线”，向雾灵山区进发。于17日，包围兴隆县城，发起强攻。鏖战一昼夜，遇到日伪军顽强抵抗，歼日伪军500余名，捣毁伪县公署等机关设施。正在强攻最后几座负隅顽抗日伪军

堡垒之际，承德大批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来援。八路军主动撤出战斗。

6月下旬，八路军四纵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执行中共中央以雾灵山为中心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

雾灵山是燕山山脉的主峰，海拔2116公尺，方园百余里，与云雾山、五指山、都山等大山相衔接，纵横千余里，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雾灵山属伪满辖境，日伪已建立了严密统治，据点林立，汽车路及电讯联系畅通。为了打开局面，四纵决定分兵扫荡雾灵山周围的日伪军，摧毁其统治基础。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先后拔除镇罗营、墙子路、峪口、将军关、靠山集、下营、六道河、前苇塘、半壁山、东河口等重要据点。并于7月19日攻克平谷县城，7月30日，与冀东起义队伍配合解放蓟县城。在军事上初步打开局面的基础上，围绕雾灵山先后建立了密（云）平（谷）蓟（县）、兴（隆）滦（平）丰（宁）、承（德）兴（隆）平（泉）等三个抗日联合县政府。

（二）谁是"侵略者"

当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但对1938年八路军对伪满地区的大出击，日本侵略者却惊慌失措地疾呼："延安触角伸向满洲"。日本承德宪兵队长早川唯一于昭和13年（1938年）12月21日发出的《热河南部地区治安情况半月报》中信口雌黄说："满洲国的主权被侵犯"，要"剔抉设立在承德白河地区的中共党政地下组织的基干，……封死中共党政对满洲国的侵略进攻。"

贼喊捉贼，侵略者竟然要"反侵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在日本侵略者方面却煞有介事，"主权"当然不能被

"侵犯","国境线"当然不能遭到"侵略"。更何况,所谓的"侵略"正是主权所有者来收复失地。日伪军重兵麇集长城线,对八路军四纵形成包围态势,疯狂进攻。加上大雨连绵,山洪暴发,活动在山区的八路军行动受阻,在雾灵山周围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未能展开。正值此时,中共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发动十万武装抗日起义成功,为了加强对起义队伍的领导,中共中央命令四纵迅速挺进冀东,与起义队伍会师。四纵遂突出日伪军包围,进军冀东。

四纵与冀东起义队伍会师后,立即计议创建根据地和改编起义部队等问题,根据中央指示,建立冀(东)察(哈尔)热(河)宁(辽宁)军区。四纵和地方领导都没有在冀东这样平原和浅山区创建根据地的经验,遂又开赴燕山第二主峰都山地区,拟在那里创建根据地,可是刚刚到了长城线上,触动了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这根敏感的神经,又遇到了日伪军的重兵堵击而返回。建不成根据地怎么能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遂决定四纵和起义队伍都西撤平西根据地。使起义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

(三)不平静的热南山区

八路军第四纵队撤走后,留下了三个游击支队就地坚持。除第一支队和起义队伍余部坚持在冀东基本区迁安、丰滦、滦县一带外,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都活动在热南山区和长城沿线。第二支队大部活动在遵化、蓟县与兴隆交界的长城线上,赖邦率一个大队坚持在五指山区。第三支队大部坚持在兴隆、平谷、密云交界的长城线上,李满盈部则坚持在雾灵山区。

1939 年,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处于低谷,而在长城

线上和热南山区却渐渐显出勃勃生机。这些游击小支队，总兵力200多人，每支队伍不过几十人，然而他们极为活跃，机动灵活，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兴隆县佛爷来、柳河口、北双洞、五道河、六道河、三道河、苗耳洞、狗背岭等据点，并连续在寿王坟，罗圈沟等地伏击敌人，打得日伪军日夜不得安宁。伪满洲国的"国境线"仍然不平静。

这些小游击队实际上都是小股的武装工作队，合兵打击日伪军，分兵发动群众。他们常常高度分散成十几股，以至几十股，三三俩俩潜伏到群众中去隐蔽活动，片片有堡垒村，村村有保垒户。他们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以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心，老百姓由衷地称颂说："开天辟地，盘古至今，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呵！"

经过半年多的隐蔽发展，各股游击队都得到壮大发展，到1939年6月，正式组建了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并且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主力部队，成立了冀东军分区。更主要的是，这阶段隐蔽而又深入的群众工作，为嗣后热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1939年第一次小集家

姚依林于1940年写的《冀东游击战争是怎样坚持的》[①]一文中记载："开始实行并村办法(我×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企图减少甚至消灭山沟小道中三五户的小村庄，便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增多我游击队活动的困难。"

---

① 载于《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4页。

这是关于热南地区日伪集家并村最早的记载。

实际上，日伪在热南地区第一次小规模集家并村，是从1939年11月开始的。集家并村的范围，包括兴隆县黑河川和横河川以及杨树台以北几个山村，都是八路军第二支队活动的中心地区。

提起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来，人们就会回忆起这一带的一段特殊历史。这一带曾有过250年的“封禁”史，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无人区”，但是有益的。

清朝康熙元年(1662年)，清王朝选定遵化马兰峪为帝王陵寝(即清东陵)。在营造陵区的同时，划定马兰峪以北长城以外广大山区为“后龙风水禁地”。南迄马兰关，北抵雾灵山(亦称五龙山)；西迄曹家路、墙子路长城线，东止窄道子、石庙子一线，包括兴隆县大部地区，总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据《遵化州志》记载：风水区周围屯兵把守，风水区内不准居住、耕种、埋坟、采矿、砍伐、狩猎等等。几百年的封禁，使这里草木丛生，古树参天，虎、豹、熊、鹿成群，灰鹤、白鹭等鸟兽聚居繁衍，成了一个天然的动、植物保护区。由于这一带山区保持了良好的生态平衡，使冀东及平津一带雨量充沛，水流清澈，气候宜人，受益不少。清王朝覆亡后，“禁区”于1915年开禁，军阀、官僚、豪绅、巨贾蜂拥而至。伐木热、采金热盛极一时，森林开始遭到破坏。1933年日本入侵后，连年“扫荡”作战，特别是1939年开始制造“无人区”以后连年疯狂纵火烧毁森林，使得几百年封育而成的森林几乎全部毁于战火。

第一次集家并村最大的一片是横河川安子岭北部山区。据当地老人们回忆，那是1939年冬11月间的一天下午，佛爷来伪警察署来了命令，天桥峪、羊羔峪、厂沟等3条山川14条

山沟里的 34 个村落 760 余户人家，都集并到安子岭、双炉台。

故土难离。中国的农民最依恋故乡，依恋土地。而这一带山区的农民，都是在“风水禁区”开禁后，由异土他乡逃荒进山的穷苦人，已经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进得山来，住窝棚，开生荒，十多年惨淡经营，总算安顿下一个可以赖以生存的家。而这一道集家并村的命令，对他们来说是大难临头。搬走了，丢下这土地怎么办？丢下这房子怎么办？冰天雪地，离开这冬烘的暖房热屋，岂不冻死。而指定集家的地点双炉台、安子岭那里，一切毫无准备，既没有给定居建房的地址，又没有任何建房的材料。就是有，已经滴水成冰的隆冬，又怎么能破土动工。面临着这倾家荡产的绝境，家家呼天抢地，人人如五雷轰顶。

打开日本的有关史著，对集家并村则有着奇妙的记载，说“并非强迫收容，而是喜于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与自家经济的更生发展”，“居民自主奋发和警察的指导相一致”① 的。

好一个“居民自主奋发和警察的指导相一致”。下达命令的第二天，来了十几个警察，吆三喝四，催逼群众搬家，顺手抢掠了一通，扬长而去。第三天，大部分群众正在犹豫，一部分刚刚动手要搬，500 余名日伪军闯进山来，将 34 个村落的 760 户人家抢掠一空，大火弥漫了山川，哭喊叫骂声震撼着峡谷。一场浩劫过后，3300 间房屋趴了架，抢走骡马 620 头，羊 4800 只，粮食衣物不是被抢走，就是被烧毁。家家破产，户户断炊，更无安身之处。一部分人被驱赶到集家点，一部分人背井离乡去投亲靠友，大部分仍在山里坚持，躲进深山搭个窝棚，饥寒

---

① 《满洲国警察史》，伪满洲国治安部编。康德 9 年(1942 年)朝鲜印刷株式会社出版，下卷，第 385 页。

交迫中度日。

身受毁灭性摧残的广大群众，面对着家破人亡的困境，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认识到要生存就得斗争。八路军游击队给了群众热情支持，一面帮助群众安顿生活，度过难关，一面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日伪军。1940 年 1 月，军民配合袭击了双庙警察所；3 月，又解放了冷嘴头据点。日伪受到打击，群众增强了斗志，纷纷挣脱日伪控制，从集家点迁回家乡，重建家园。

第一次集家并村宣告破产。

(五)1940 第二次小集家

1940 年秋季，日伪又在兴隆县实行第二次集家并村。

随着八路军游击区的扩大，这次集家地区也有所扩大。除 1939 年已集过家的黑河川、横河川外，又扩大到狗背岭、驴儿叫一带山区及长城线北侧罗文峪口以西的冷嘴头、沙坡峪一带，马关关以西花市一带，古北口以东雾灵山区大小黄崖一带，都划为集家区。与此同时，在关内遵化县马兰峪陵区(属伪满特区)也实行集家并村。

为了保护群众，保护游击区，八路军游击队沿长城一线主动出击，支持群众展开反集家斗争。日伪军集中兵力疯狂“扫荡”，烧杀抢掠，沿长城线大部山区村落成了废墟，但人民群众顽强斗争，日伪沿长城线的集家并村计划大部未能实现。

五指山中心区横河川羊羔峪一带，仍然是这次集家并村的重点，而且由于原来在这一带坚持的赖邦游击队被调走，出现了一段空白，给了日伪以可乘之机。

这次集家点由 1939 年的安子岭、双炉台移到山区深处的

羊羔峪。并且由一个日本军官率领 20 多名伪警进驻羊羔峪，设立警察分驻所，加强控制。

1939 年第一次集家并村时房子都已被烧毁，家家住着临时窝棚，这次又过了一遍火。祸不单行，正当群众被驱赶集家走投无路的当儿，11 月 5 日，一场大雨，山洪爆发，来不及收割的庄稼、秋菜都泡了汤，毁烂在田里，使本来已经破产的群众，陷入了更深的苦海之中。

28 个自然村的 410 户人家，1600 口人，从 14 条山沟被驱赶集中到羊羔峪北大地集家点上。这块不足 20 亩的地面上一下子建起了 400 多座形态各异的临时窝棚，拥挤不堪，饮食不佳，卫生条件恶劣，人们心情郁闷。1941 年刚开春，瘟神降临到集家点，瘟疫流行，并迅速蔓延到羊羔峪村里，连日本人和警察也都传染上了。得了病就高烧不退，口鼻喷血。当地根本没有一点医疗条件，一下子死了 400 多人。

为了拯救群众出苦海，迁遵兴游击队赶来，在群众的支持下袭击了西台子伪警察所，这时羊羔峪集家点上的日伪警察又都染上瘟病。敌人遂狼狈逃窜。

第二次集家并村再次失败。

三、抗日烽火燃遍热西、热南

1940年至1941年间，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八路军挺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平辟平北”三位一体的任务。平北和冀东地区在开辟发展长城内侧基本区的同时，分头向伪满辖境热河西部和南部地区发展。

（一）大刀阔斧开辟热西地区

1940年1月，中共冀热察区党委派出平北工作委员会和平北游击大队，进入昌平、延庆交界地区，分散隐蔽活动，站住了脚跟，并建立了昌（平）延（庆）抗日联合县政权。4月5月间，八路军第十团团长白乙化率部梯次进入伪满与华北交界的丰宁、滦平、密云地区，跨长城内外，以云蒙山区为基地开展游击战争。文武双全的白乙化团长，首先抽调出大批部队干部充实地方工作团，由部队与地方干部相结合组成8个工作组，划分4个片展开发动群众工作。白乙化团长则率领主力跨出长城，深入伪满境内丰宁、滦平地区，展开外线作战，吸引日伪军的兵力，掩护长城线上的工作开辟。6月间，4个区相继开辟就绪，即成立了丰（宁）滦（平）密（云）抗日联合县政权。7月间，又在三个重点地区创建了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和四海游击队，并建立了自卫军（民兵）。8月间，配合“百团大战”，

主力第十团和地方游击队、民兵向平古路出击，攻克小营火车站，破击铁路线，烧毁潮河大桥，威胁要塞古北口。

从日伪档案中看到，伪满方面日伪对八路军向热西及平古线的出击非常警觉，作了详细记载，称之为“对满洲国的第二次进犯”。于9月11日开始，集中重兵，进行了78天的“扫荡”进攻。丰滦密抗日军民展开了顽强反“扫荡”斗争。第十团子弟兵在群众的支持下，先后在水堡子、梨树沟、二道沟、石门子、董各庄、白道峪、冯家峪等地与日伪激战37次，重创日伪军，取得反“扫荡”胜利，不但保住了原地区，而且新开辟出大片新区，丰滦密联合县由原来4个区发展到8个区。反“扫荡”胜利后，继续迅速扩大游击区，到1941年6月，又由8个区扩大到16个区，并在中心区普遍发展党组织，新发展党员700余名，建立了70个党支部。在基本区里普遍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昌(平)延(庆)抗日联合县以延庆地区为依托向滦平西部发展，龙(关)赤(城)抗日联合县向丰宁县黑河川发展，建立特三区。从此，热河西部沿长城线(即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都已发展为相对稳固的抗日游击区，并向滦平、隆化边界地带发展。热河西部地区遍地燃起抗日烽火。

(二)隐蔽发展热南地区

1、边缘渗透

1940年，冀东地区正处于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已建立了7个联合县抗日政权，构成了基本区，并以基本区为依托，向热河南部山区发展。发展的方式，主要依靠地方工作隐蔽渗透进行。为了便于渗透发展，在靠近长城

线，建立了迁（安）遵（化）兴（隆）和平（谷）密（云）兴（隆）两个地跨长城内外的抗日联合县，迁遵兴以迁安、遵化为依托，向兴隆东部及中部地区发展；平密兴以平谷、密云为依托向兴隆南部狗背岭和兴隆西部雾灵山区域发展。与此同时，靠近长城线的丰（润）滦（县）迁（安）和蓟（县）宝（坻）三（河）两个联合县，也深入长城北侧，向伪满地区发展。丰滦迁以迁安为依托，向冷口外青龙县发展；蓟宝三以蓟县为依托向黄崖关外兴隆县南部发展。

2、釜底抽薪

1940 年间，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老党员周治国，对伪满青龙县境内燕山第二主峰——都山山区的开辟取得成功。

这年春季，周治国利用在都山南麓楼台子村关系户家养病之机，对当地敌情、民情、社会、地理状况做了调查研究，就主动向冀东军分区领导请求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开始时，他只身一人，依靠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声誉，灵活地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上层人物的关系，争取保乡团、红枪会等民间组织的头面人物，张祥林、孙景华等都带头挖出埋藏的枪支，动员隐藏的旧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很快组建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又通过这些头面人物对当地的伪村长、甲长、牌长，以及伪职、伪警人员进行争取，很多人表示同情抗日，或保持“中立”，不破坏抗日。这样，对日伪基层组织来了个“釜底抽薪”，不声不响把这一带 200 余村庄开辟成隐蔽游击区。

为了取得一个时期的相对稳定，游击队作战也以“灰色”面目出现。

1940 年 12 月 25 日，漆黑的午夜，峪耳崖金矿内突然火

把通明，火光下，几十名狂呼呐喊的“神兵”闯进了日伪军营房，黑脸的、红脸的、蓝脸的“神兵”们挥舞着大刀长矛。20名日本兵慌乱中没容得抵抗就作了刀下鬼，30多名伪矿警吓得魂不附体，磕头如捣蒜。一次里应外合的奇袭，游击队没伤一根毫毛，缴获50多支长短枪，解决了游击队的装备问题。日伪军很长时期里懵懵懂懂不知底里。

到1941年4月，地区逐渐发展巩固，建立了4个区政权，并经领导批准建立青(龙)平(泉)联合县办事处，组建起200多人的青平游击队，喜峰口外都山南侧创建成稳固的游击区。并且派出工作队跨过锦热铁路，到热中七老图山一带隐蔽活动。

3、**水银泻地**

194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出动一个旅团和数千名伪满军，向古北口、喜峰口长城线推进，严密封锁“国境线”，并越过长城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长城线上的冀东八路军部队受到压迫向南转移，在玉田、蓟县南部水网地带受到华北方面日军重兵合围，遭受严重损失。8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开会，总结夏季反“扫荡”失利的经验教训，诸多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广大山地的游击区和巩固的根据地，在环境残酷时没有足够的战略回旋余地和赖以隐蔽休整的基地，遂决定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开辟热南山区。

于8月下旬，第十二团和第十三团主力部队全部跨过长城开进热南山区，地方上成立长城工作团，由丰滦迁联合县长高敬之、迁遵兴联合县长姚铁民为正副团长，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若干小分队，分散到滦河以东、雾灵山以西的热南广大山区开辟抗日工作。与长城工作团相配合，主力部队分散以

连、排为单位，与地方干部密切合作发动群众。这样多股的小型工作队，象水银泻地一般布撒到热南广大山区的深谷奥峪之中，工作深入到家家户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在滦河以西雾灵山以东，北迄白马川，南抵长城，建立了8个区政权。

至1941年底，平北地区西迄独石口，东抵古北口，冀东地区西迄古北口，东抵桃林口，沿长城内外开辟了广大游击区，并在燕山崇山峻岭中建立了多块山区根据地，从此，两个地区联成一片，都以长城为战略轴线，同伪满与华北两方面日伪军展开拉锯争夺。

四、大规模制造“无人区”

1941年秋季，八路军冀东部队隐蔽开进热南山区之后，给华北方面日伪军造成错觉，以为冀东的八路军已不足为患了，伪报上说：只有几个八路军在长城上哭呢！而伪满方面日伪则大为惊恐，称之为“对满洲国的第三次进犯”。面对着共产党八路军连续三次“进攻”，热南、热西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经日本关东军从上到下紧锣密鼓的策划，从1941年5月开始，在其所谓的“西南国境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

(一)“时局应急特别肃正”

长城线上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伪满洲国最高主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芒刺在背，适值1941年5月开始，华北方面日军动员4万余兵力对冀东发起“扫荡”进攻，日本关东军遂趁火打劫，于5月17日，由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出第二六四号《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在其“要领”中指明重点地区为丰宁县西南部，滦平县西部，兴隆及青龙县西南部，并强调要采取“治本措施”，即“建立集团部落，建立警备道路、警备通讯及部落防卫设施。”

如前所述，八路军冀东部队第十二、十三团在夏季反“扫荡受挫折后，于8月间突然开进热南，而且迅速打开局面，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西南地区特别肃正”计划。日本关东军防

卫司令部遂于9月15日发布第二八号实施《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作战命令。其“要领”中指明，实施地区扩大到热河全省，重点为丰宁、滦平、兴隆、承德、青龙5县。并再次强调进行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为“治本工作之重点”内容。

为了实施此项“时局应急特别肃正”命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在伪满中央机构中进行总体动员。据日本战犯、满洲国铁路警护军少将参谋长原弘志供称：

“1941年(我记的是10月)，我以总监部警备科长的身份奉总监藤井贯一之命令出席了关东军防卫司令官山下奉文所主持的有关西南地区肃正工作指导会议。这个会议在长春关东军防卫司令部举行。出席者有伪满政府中央机关代表约20名。由最高参谋长片仓忠指导了这次会议。他报告说：‘热河的治安在伪满洲国来说是一个后患，所以一定要彻底肃正。但肃正工作是由现地机关负责实行，作为中央机关来说，必须鼓励及满足他们在人员、资财、经费等方面的要求’。”

根据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的命令，从1941年下半年，就从伪满各地向热河全境特别是“西南国境线”增派兵力。为了有力地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在东边道进攻东北抗日联军大搞集家并村的军政骨干全部调到热河，对热河省伪机构实行大换班。原通化省伪警务厅前任厅长岸谷隆一郎升任热河省次长；通化省伪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调任热河省警务厅长；通化省伪协和会副本部长户仓胜人调任热河省协和会副本部长兼事务长；通化省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吴元敏调任热河省第五军管区司令官。与此相适应，对所有伪军、政、会下属机构都得到充实，在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如滦平、

兴隆、承德、青龙等县的伪县长、警察署长、协和会长等要职，也大部换成由东边道等地调来的骨干人员。

在调整政权机构的同时，军事力量更得到加强，日本关东军第一〇八师团第九独立守备队长驻热河各地，伪满洲国军除第五军管区下辖的3个旅外，又从其他军管区调来14个团，分驻各地，作为机动兵力。还将原在东边道专门进攻东北抗日联军的12个省辖警察讨伐大队全部调来热河省。这些讨伐大队实际上是伪满国的机动讨伐队，受全伪满战事支配，哪里战事吃紧就调到哪里去。这些讨伐队成员极为复杂，大都是兵痞、贯匪、流氓、烟鬼等没有人性的亡命之徒，其骨干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死心蹋地的汉奸、叛徒。他们在东边道地区进攻抗日联军和制造"无人区"过程中，疯狂之极，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最强悍的程斌队和曲焕队的骨干分子，就是出卖并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凶手。

在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县又先后组建起许多县属警察讨伐队，计青龙县8个、兴隆县13个、滦平县8个、承德县5个、平泉县2个。

省讨伐队相当营建制，县讨伐队相当连建制。省讨伐队为机动兵力，重点使用于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县讨伐队主要分片负责本县境内的集家并村。

伪满方面从1941年下半年陆续增加兵力，1942年和1943年递次增调，在制造"无人区"的高峰时期，麇集在热河省的日伪总兵力达10万之众。

（二）"无 人 区"化 政 策

遵照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的命令部署，

于1941年9月间，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订出《西南地区肃正工作要纲》，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拟定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实施方案。

从其《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中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对制造"无人区"的措施，已从过去战术性的对策提高到战略的"治本"方针的高度认识了。文中分析说：

"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战工作。在政治方面，使之拥护抗日政府，支持抗战政策；在经济方面，使之担负军需之供给，确保战争所必需的物力；而且在军事方面担负起兵力补充及支援军事行动，以获得武装斗争的胜利。"

"所谓集家，即将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内的居民，集结于我方据点，或其近旁地区，使之与敌人的活动完全隔离，而由我方掌握控制，乃可彻底封锁扼杀敌人之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

在日军另一份文件中还有一段露骨的分析：

"鉴于冀热察国境地区当前的情势，其根本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在于匪民分离，这也几乎是担负保安重责之吾人，在灭共对策上最应建立功绩之处。"

"民众的支持，乃是彼等的依靠，这样就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乃致命的打击。"①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人民群众反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策略，

---

① 1942年10月29日，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灭共对策资料》。

是十分害怕的，对其说来是致命的；因此妄图以制造“无人区”隔断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来达到其侵华的目的。

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的部署，于1941年五六月份开始，热河省日伪机关即着手拟定计划和进行大规模集家并村的准备工作。从日本文件中看到，计划制造“无人区”的宽度，大体上从长城线计起，步兵一日之行程，大约为25或30公里。而其东西起迄点没有查到文件依据，据多年来多方调查表明，这次大规模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主要是在丰宁、滦平、兴隆、青龙几个县境内实施的，大致西迄丰宁县西南部千家店、红旗甸一带山区，沿长城线向东，经滦平、兴隆，至青龙县青龙河西岸，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总之，就是从1938年以降，所有在伪满热西、热南辖境的抗日游击区，全部划为“无人区”，并沿长城构成一条战略封锁线。

（三）所 谓“实验区”

热河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和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拟订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规划后，于1941年冬和1942年春，在滦平、青龙、兴隆等县搞建设“集团部落”的“实验区”。

1、在滦平

1941年冬和1942年春，滦平县日伪机关在于营子和吴栅子两村相继搞建设集团部落“实验”。于营子搞的比较了草，但在吴栅子搞的很细致，由伪县长亲自督办，一切建筑都按照伪满洲国民政部训令第九六九号《关于集团部落建设》通告的规格施工，号称“模范部落”，命名为“安乐村”。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造了许多假象，并请来伪满洲国一位大臣来视察，还拍成电影纪录片，到处播放，作欺骗宣传。

2、在青龙

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宣布大地村（现属宽城县）为集团部落"实验区"。当即成立"集家工作指导部"，由日人副县长西岛宽任主任，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队等。调集几百名日伪军警进行武力镇压，限令大地村所属22个自然村的群众10天内拆毁家园，搬进大地、熊虎斗、木匠屯3个集团部落。自己不拆的就纵火烧毁，拒绝进集团部落的就抓捕、屠杀。折腾了一个半月，22个村庄被夷为废墟，1800口人被迫离开家园热土，被驱赶进了部落。集家完成后，立即划定部落5公里以外为"无住禁作地带"，面积约40平方公里，占22个自然村总面积90%以上，荒废了大量耕地。

3、在兴隆

1941年冬季，兴隆县日伪机关又在横河川重点实行集家并村，并建设集团部落。

日伪鉴于1939年和1940年两次小集家的失败教训，对这次集家进行了周密安排，把集家点定在靠近半壁山中心据点的蕲杖子，并修通汽车路，建设集团部落，派驻伪警察讨伐队驻守。

这次划定的集家区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包括70多个自然村，1200多户，6000多口人。而蕲杖子集家点位于集家区的最南端，所以绝大部分村落都距蕲杖子在5公里以外，最远的相距约30多公里。可以想象，在一个集家点上集中这么大范围的众多群众，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日伪就划定距蕲杖子以北约5公里的一条山岭为界，岭南为"无住地带"，强行集家并村；岭北为"无住禁作地带"，彻底摧毁。这片"无住禁作地带"，面积约600平方公里，包括60多个自然村，约占整个集

家区的 80%。(见靳杖子集家区范围示意图)

(四)大　集　家

1、在热西

1938 年以来,八路军几次从平西根据地向冀东和热河地区的推进,都是以热河西部滦平、丰宁、密云地区为突破口和交通走廊的,而冀东地区与晋察冀和平西根据地的联系,也是通过这一带的地下交通线的。伪满方面日伪军为了有效地封死八路军向伪满地区的推进和切断这一交通枢纽,在实施“特别肃正”计划之始,就确定以丰滦密地区为重点,首先从这里开刀。

为了强化这一地区的制造“无人区”措施,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分部”。从 1941 年 10 月 4 日开始,集中万余重兵,对滦平、丰宁长城沿线山区(包括与密云、怀柔、延庆、赤城交界地区)进行疯狂“扫荡”。从古北口至独石口长城内外,由东向西,从南向北,纵横捭阖,分进合击,梳篦清剿。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扫荡”中,首先是寻找八路军十团主力决战,而当八路军转至外线时,便拿人民来发泄其疯狂兽性。就是按照日本档案文件中所说的全力“攻伐民众”。在所有的深山区,特别是八路军游击队活动过的地方,反复剔抉,实施彻底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在滦平县下营村两次集体屠杀 78 名群众,在孟思郎峪一次屠杀妇女儿童 27 名。日伪在对民众的“讨伐”中,以摧毁抗日基层组织为重点对象。在两个月的“扫荡”中,抓捕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 500 多名,屠杀 300 多名。

日伪在“扫荡”后期,即开始大规模驱逐群众集家并村,然

而，遭到群众的激烈反抗，许多地方群众硬是坚持不下山。1942年4月，又调来6000余日伪军，在长城各关口及深山区里增设了37个据点。然后以各据点为中心，把“无人区”划为若干片，每片进行反复“扫荡”，驱赶群众集家并村。

对坚持领导群众反集家斗争的共产党及政府机关经常活动的地区，则派出大量特务侦探，一经发现目标，立即多路奔袭合围，前后有几股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1942年4月8日，日伪军又奔袭丰滦密抗日联合县政府的基地臭水坑，县长沈爽等30多名干部牺牲，45名干部战士被捕。此时正值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领导机构遭到严重损失，反集家斗争受到影响。到1942年冬，日伪基本上完成了在热西长城线上集家并村的计划。

1942年4月1日开始，华北方面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与伪满方面日伪军形成合力，夹击丰滦密地区。沿长城南侧，东起古北口南的辛庄，西至昌平县桃峪口，挖起一条宽大的封锁沟。华北方面与伪满方面日伪军遂协同动作，将东起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迄白道峪，北至于营子，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见丰滦密“无人区”示意图），并且用尽一切残暴手段加以摧毁，房屋被烧光，群众被赶净杀绝，牛盆峪、马营、高家岭等10多个山村的森林也都被纵火焚毁。

日伪大规模集家并村的成功，大片“无住禁作地带”的出现，使平北热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严峻的局面。

2、在热南

在热南青龙县和兴隆县大规模集家并村的时间是交错进行的。青龙县日伪机关在1941年8月开始在大地村进行集团

部落"实验"的同时，即召集会议，部署在青龙河以西地区（现属宽城县）集家并村。在兴隆县，于1941年11月和12月间开始军事"扫荡"，在1939年和1940年的旧集家区长城沿线及黑河川、横河川等局部地区继续集家并村。到1942年4月，由日人副县长主持，组成"社会调查队"，对全县村落分布、居住状况等进行调查。然后召集各有关方面及19个大村村长举行秘密会议，划定集家范围，指定集家点，在全县范围形成全面制造"无人区"的规划，开始大范围的集家并村。

在热南青龙和兴隆的大集家过程中，都进行了血腥的大"检举"（即大逮捕）和大屠杀。

在兴隆县，大集家开始前就进行了一次大"检举"。据热河省协和会别室部员（又称共产党研究员）郝席庵供称：第一次大"检举"是在1942年2月5日开始的，在全县逮捕2000多人，在各地就地屠杀400多人。这次大"检举"中，以大洼、宝地、大小水泉、北台子、东道峪、楸木林、靳杖子、龙井关等村最为残酷，被逮捕五六百人。被抓捕的人，都受到严刑审讯，处死一二百名，未被判刑的人都被送往东北各地充当劳工，鲜有生还者。全面"检举"后，又接连在茅山、大灰窑、南双洞等重点地区实行"检举"，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

在青龙县大地一带搞建设集团部落"实验区"的同时，在全县范围搞了一次大"检举"，抓捕800多人。1942年4月间开始大规模集家并村时，又搞了一次全面大"检举"，从榆木岭、艾峪口、熊虎斗、唐杖子等24个村，抓捕了422人，342人惨遭杀害，唐杖子一个村就被屠杀100多人。

日伪军疯狂的"扫荡"、"检举"、屠杀以及烧房抢掠，使热南山区受到严重摧残，但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八路军的反

击，群众展开顽强的反集家斗争，基本上粉碎了日伪在热南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计划。

五、反集家斗争中扩大新区

日伪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阴谋目的，就是要摧毁长城线上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且在其所谓的“国境线”上构筑成一条战略防线。而这条战略防线，既不象冷兵器时代的长城，也不是近代的马奇诺防线，争夺控制的不仅仅是城池要塞军事目标，而是通过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的毒辣措施，切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同共产党争夺人民群众。而这方面正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所在，反集家斗争，就是依靠党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凝聚力，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在八路军军事斗争的支持下，取得了斗争胜利。

（一）军　事　斗　争

1、顽强坚持

日伪在热西的大规模集家并村，投入了很大兵力，而且伪满、华北与伪蒙疆三方面日伪协同动作，使得反集家斗争非常艰苦。八路军第十团配合地方游击队频频出击，从 1941 年秋到 1942 年夏半年多的期间里，连续作战百余次，给制造“无人区”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力量相差悬殊，未能粉碎日伪集家并村计划。但是，第十团主力转至外线作战的同时，留下第三营仍然顽强坚持在“无人区”里。没有房住，就动手搭窝棚，窝棚又被日伪军反复烧毁，就住山洞，山洞又被炸塌，就

自制帐篷，坚持在深山密林之中。在“无人区”里建立多处军事活动站，将粮食及生活物资分散隐藏在军事活动站的四周深山里，以便既可以流动又可以较长时期的坚持住一个地区，支持地方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反集家斗争。

2、战役出击

1941 年冬至 1942 年 2 月间，我军第十二团、十三团，在冀东基本区发动打治安军战役，长城以北热南地区一时空虚，日伪军一时得手，大搞集家并村，使游击区遭受相当的损失。1942 年 2 月中旬，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和副司令员包森等在遵化县亮子河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以打伪治安胜利之师，跨过长城，打击伪满方面日伪军，支持人民群众反集家斗争。2 月 17 日，包森率十三团进到长城线上野户山，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热南地区，于 4 月 21 日至月底，发起第一次战役出击。接着从 5 月 10 日至 5 月底，又发动第二次战役出击。先后拔除了小白旗、马圈子、汤道河、椊椤树、车河铺、二拔子、熊虎斗、六道河子等 17 处据点，破坏公路和铁路多段，并分兵一路越过锦热路，与在平泉一带活动的青平游击队相配合，开辟了都山以北与平泉的结合部地区，打开了热南与热中的通道，为以后开辟热中地区创造了条件。连续两次战役出击，打击了制造“无人区”日伪的嚣张气焰，给群众反集家斗争以有力支持，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报嘉奖。

（二）群　众　斗　争

反集家斗争的实质，就是发动群众对日伪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具体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采

取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

1、守土抗战

在反集家斗争中，平北和冀东各级党组织发出号召，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基层组织都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守土抗战”。平北地委和军分区在1942年2月间发出的《关于反“扫荡”的指示》中，强调要求：“那怕只剩下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党政干部团结深山区里的群众誓死不下山，不入“人圈”（即集团部落）。这些地方山深林密，日伪鞭长莫及，在反“扫荡”中群众便于警戒、转移和隐蔽。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深山区距离指定集家地点太远，如果群众被集并了去，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土地，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各级党组织就动员群众坚决抵抗，这是唯一的生路。日伪军虽然反复“扫荡”摧毁，只能激起群众更大的仇恨和更坚决的反抗。这些地区大都在反集家斗争中建设成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2、拉锯争夺

在深山根据地与集家点的中间地带，日伪势力便于控制，势必集家，但是在群众中又有相当的抗日工作基础，群众抵抗集家并村，而日伪则施以高压手段武力驱赶，党组织就动员群众向深山根据地转移，特别是青壮年尽可能转移到根据地去坚持斗争，只让老人、妇女进入“人圈”。在靠近长城线地区，则动员群众转移到长城南侧基本区去，或投亲靠友，暂避一时，伺机潜回原地坚持。在争夺战中，许多群众挣脱日伪的控制，转移到根据地，以兴隆县靳杖子集家区为例，处于中间地带的10多个村庄，1000多户，转移到根据地的群众达600户，3000多人。

3、拆毁部落

日伪集家并村开始，就强迫群众修筑部落围墙、碉堡以及汽车路。党组织就领导群众千方百计拖延施工进度，白天拖拖拉拉干一点，晚上就忽拉拉地拆毁了。有些地方好容易建成了部落，游击队来了就给拆毁了。象平北昌延二区干部，发动群众一夜工夫把汉家川几座部落拆毁，群众又回到山里坚持抗日斗争。特别是热南地区，在1942年间，在子弟兵两次战役支持下，将大部刚刚建成的部落拆毁。日伪原来计划在1942年内完成热南地区集家并村的计划在大部地区落了空。

（三）热辽地区大发展

1、敌进我进

1942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发出了《对冀东工作的指示》，指示中强调指出，对热南广大山区，“不应单纯从战役观点看作战役回旋区，而应看到战略意义”，要求对已有工作的山区，应力求巩固并且向前推进开拓发展。

1942年6月下旬，新成立的冀东地委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冀东的斗争形势，长城内侧华北方面日伪军正在冀东基本区搞“治安强化运动”，长城外侧伪满方面日伪军正在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整个冀东地区处于四面受敌两面被夹击的不利局面。为了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决定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的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敌进我进，把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变成四面出击的有利条件，根据中央分局关于向东北推进为主攻战略方向的指示精神，主要出击方向为热中、滦东、热东和辽西。

根据冀东地委决定精神，我冀东部队从6月到7月胜利

完成了恢复基本区的“复仇战役”后，8 月间稍事休整，9 月间即分路出击。第十三团向雾灵山、狗背岭一带出击；新建的第十一团也以一部出击都山、五指山区，两个团协助配合，再次发动热南战役，连续苦战，重创日伪军，给热南人民反集家斗争以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第十一团一部跨过锦热路，进入热中地区；第十二团则渡过滦河，开辟战略要冲滦东地区，第一营又越过长城，进入热东、辽西地区。

2、**开辟热中**

热中地区地处七老图山脉和老哈河流域，以承德、平泉两县北部及宁城县为中心，包括围场、赤峰、建平、喀喇沁旗、隆化等地，接近伪满腹地，是连接内蒙和通往东北的交通枢纽地带。

从 1940 年 7 月，青平工作团派出李青山等 5 人工作组，来到这一带隐蔽开展抗日工作，站住了脚跟。1942 年 5 月，周治国率领工作团来到这一带与李青山等会合一起，积极开展游击区，以七老图山主峰光头山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工作，在承德、平泉、宁城、喀喇沁旗等地开辟了包括 200 多村的抗日游击区，建立了 4 个区政权，在中心区开始建立基层党政组织，并且发展建立起 200 多人枪的游击队，光头山根据地亦初具规模。

9 月间，第十一团两个营进入热中地区，隐蔽休整一个时期，于 11 月间，奉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命令，为了配合冀东基本区反“扫荡”和热南地区反集家斗争的战役出击。第十一团两个营全力出击，连续拔除平泉黄土梁、八里罕等重要据点，并且对伪组织来了个大扫除，连续拔除了 40 多个伪警察所及村公所（相当华北的伪大乡）。一时声势很大，群情振奋，地方上

又扩大了两个新区，光头山也建立起游击根据地。

部队与地方党政机构人员都集结到光头山根据地，准备春节举行庆祝会。出乎意料的严峻形势出现了。由于伪满方面日伪军一面作战，无后顾之忧，而且兵力充足，立即从伪满各地抽调来万余重兵，奔袭光头山根据地。适值严冬，大雪封山，部队掩护地方干部奋力突围。原承平宁办事处主任周治国在《战斗在长城内外》文章中记述说：

> “大年三十晚上（1943 年 2 月 4 日），我们在承德县大营子正准备过年，敌人就包围上来。这时天降鹅毛大雪，狂风呼啸，在风雪弥漫中，我们向光头山方向突围。突了一夜，到光头山中一个小村，又被敌人发现，我们又突上了光头山顶。入夜之后，光头山上风号雪飘，战士们腹中无食，衣着单薄，雪深没膝，湿透的衣服鞋袜冻在一起，有如铠甲一般，行动起来咔咔作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好多人手脚耳朵都冻得毫无知觉，一触即断。有个战士跌了一跤，手一着地就断了好几个手指头，断了以后连血都不流。……”

这支“铁流”般的队伍，大家以红军长征过雪山的精神互相鼓励，摸爬滚打几昼夜，牺牲 40 多人，冻伤 70 多人，终于突出了重围。

承平宁工作团跳出日伪军的包围圈后，到围场、隆化边缘地带隐蔽活动，又开辟出几块隐蔽游击区。日伪军大“扫荡”过后，他们又回到光头山中心地区，重整旗鼓，恢复工作。

1943 年 5 月，冀东地委决定，在热中地区建立承（德）平（泉）宁（城）抗日联合县，杨雨民任工委书记，周治国任办事处主任。并成立第三区队，由高桥任区队长，长期坚持在承平宁

地区。

3、开辟凌青绥

凌青绥地区以青龙县东部及建昌、凌源、绥中为中心，包括兴城、锦西、朝阳、义县等地。是控制热东通道和辽西走廊的战略要地。

1942年6月冀东地委扩大会议后，组成5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以张仲三为指导员、宋国祥为队长，进入青龙东部地区，以蚂蚁沟和老岭一带山区为立足点，向长城内侧抚宁、临榆和长城外侧建昌、绥中等地隐蔽发展。

7月间，冀东子弟兵第十二团渡过滦河开辟滦东地区，先头部队第一营立即越过长城，向伪满地区出击。

第一营营长马骥是个很有政治素养的指挥员，他尽可能使军事行动服从于党的政治任务。他率部出击到滦东地区后，就与地方武装工作队密切配合。为了以军事行动支持地方迅速打开局面，根据当地日伪兵力空虚而且惧于八路军声威的有利因素，马骥率部连续出击，在抚宁县董各庄、临榆县大深港、青龙县隔河头、鲇鱼洞等地连打几个胜仗，杀出了我军的威风，震慑了日伪军，滦东局面迅速打开。10月间，当地方党政干部开辟长城外侧伪满地区时，马骥又率部出动配合。考虑到当地伪军缺乏与八路军作战经验而且兵力尚不充足，于是改变斗争策略，与地方武工队相配合，主动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团结上层人物。经过各方面工作，与不少地方伪军达成“君子协议”，伪军不主动出击，必须出动时，事先提供情报，回避与八路军作战，不祸害老百姓；八路军暂不破坏交通，不主动攻击据点，不摧毁伪组织。当然这种局面只能是暂时的，然而这种暂短的相对稳定局面，却给新的开辟工作赢得了难得的

时机。在这暂短的相对稳定时期里，马骥又将部队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活动，而且都给了开展群众工作的任务，教给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积极配合地方工作。

在争取上层及伪军伪组织工作的同时，武工队和第十二团第一营相配合，又从支持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入手，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由于伪满方面实行极为严酷的经济统治，并且以“国境海关”实行经济封锁，热东、辽西地区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尤其是布匹、食盐及各种日用品更为匮乏。为了求得生存，有些胆大的人就偷越伪满“海关”到口里走私贩运。有的走单帮，有的几户联合搞。武工队和子弟兵就从发动、组织贩运入手，把群众组织起来。每个村组成贩运组，几个村设一个连络站，站站相通，形成几条地下贸易交通线。

每一项得民心的政策，就会使党增加无限的凝聚力。群众性的贩运很快形成高潮，有百多个村庄组织起贩运队，出动上千副驮子。有不少村武工队和子弟兵还未去过，群众就已自动组织起来参加贩运活动。武工队把贩运队组织好，选出领头人，每个队又选出担任侦察、探路、警戒的骨干分子，在武工队和子弟兵的保护和帮助下，很快学会了侦察情况、传递消息、站岗警戒等行动。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批抗日骨干，成了各村建党建政的积极分子。

不到半年时间，凌青绥地区就形成了局面，开辟出 100 多村的游击区，初步建立了基础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并且以老岭为中心建立起根据地。到 1942 年 12 月，经冀东地委批准，建立了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抗日联合县。1943 年初，又一分为二，在长城外侧伪满辖区建立凌青绥抗日联合

县。工委书记张化东，办事处主任信修。并组建第七区队，队长马骥，坚持在凌青绥地区。

4、**特殊战斗队**

1942 年间，在冀东地区建立了两支开展东北抗日斗争的特殊战斗队，一支是东北情报站，一支是东北工作委员会冀东分会。

东北情报站建立于 1942 年 10 月，骨干人员都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派遣来的，受冀东地委领导。东北情报站在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都设有情报站，向东北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都派遣了情报人员，长期潜伏，搜集战略情报。与此相适应，冀东军分区司令部也加强了联络科，积极配合东北情报站的工作。

1942 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加强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北方分局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书记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相继在各军分区也建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分会。工作任务是负责东北的地下派遣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以待时机”。冀东分会是在 1942 年 12 月建立的，但是冀东分会的工作任务除秘密派遣外，还有公开地发动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特定任务，并且负责培养有游击战争经验的人员派往东北腹地，伺机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冀东地委领导对东工委工作给予特别重视，由李楚离和李运昌先后担任分会书记，切实加强领导。为了实现东工委分会担负的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任务，采取“借地不拆屋”的方式，把东工委的工作重点放在热辽地区，由东工委分会的负责人担负热辽地区领导职务，即：东工委分会宣传部长杨雨民兼任承平宁工委书记；东工委分会组织部长张化

东兼凌青绥工委书记。这样就可以以承平宁和凌青绥为基地，向东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进行地下派遣工作。

东工委和东北情报站工作的开展，使冀东对东北的抗日运动有了纵深的发展。为抗战胜利时进军东北起到了很好地配合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战略远见。

5、**冀热边局面的形成**

热中、热东、辽西广大新游击区的开辟，并且与热南及冀东基本区联合一片，就形成了冀东、热河、辽宁三角地带的新战略格局。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于1943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撤销中共冀东地委，建立中共冀热边特别委员会（简称冀热边特委），下设5个地委；在行政方面，也撤销第十三专署，建立冀热边行署，下设5个专署。

回顾1938年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四纵挺进敌后并在冀东发动抗日大暴动，当时的战略构想就是要在河北、热河、辽宁的结合部创建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时轰轰烈烈，但当时未能实现战略目标。此后又经过5年多的惨淡经营，在日本侵略者大搞“治安强化”和疯狂制造“无人区”的严峻形势下，在全国敌后战场都面临空前困难时期，游击区被大大压缩的形势下，地处深远敌后的冀热边地区，却能在四面受敌岌岌可危的困境中，四面出击，爆炸式地发展，实现了党中央5年前的战略目标，这是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胜利。

六、反集家斗争中建设根据地

1941年到1942年间，冀东和平北地区党组织，在激烈的反集家斗争中，与发展扩大新游击区的同时，加强了“无人区”里的根据地的建设。

（一）加强党组织建设

从1941年春季，平北地区在丰滦密联合县云蒙山区，冀东在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王厂沟等多块山区根据地里，开始普遍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础组织。为了适应反集家斗争环境，强调“火线入党”，在斗争中考验党的积极分子，而在入党手续上则力求简化和保密。在平北有些地方，同时建立两个“平行支部”，一个支部的党员，大都是半公开的村干部，而另一个支部的党员则都是秘密培养的骨干。两个支部工作上互相协调，但组织上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保存力量。由于反集家斗争中战斗频繁，难以一村一人地逐个发展党员，中共冀东西部地分委就采取集中培训的办法。地分委书记李子光亲自主持办了个建党培训班，把各块根据地党员骨干集中起来，由主要领导干部轮流上课，培养出一批质量较高的骨干力量，再由他们到各块根据地中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样，在雾灵山、狗背岭等几块根据地里，半年左右，村村都建起支部，成了反集家斗争的战斗堡垒。

到1942年春季以后，反集家斗争白热化，许多党员在斗争中光荣牺牲，一小部分变质，而同时在斗争中又涌现了大批骨干分子，迫切要求入党。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各地及时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如丰滦密第二区，1942年春季，利用战斗间隙整顿基础党支部，全区168名党员，重新登记64名，又发展32名新党员，恢复和重建了17个党支部，成了丰滦密中心根据地的战斗堡垒。在兴隆县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几块根据地里，基层党组织在反集家斗争中得到迅速发展，共建起89个支部，党员总数由原来100多名发展到600多名。

在反集家的特殊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党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充分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如青龙县王厂沟（现属宽城县），是以一个行政村建成的一块独立的根据地，有10多个自然村落，共有42名党员。为了便于领导，在中心村建立了党总支，又根据自然村落的地理分布情况，建立了3个分支部和若干个党小组。每个分支部或小组负责一个自然村，而每个党员分片包四五户群众。这样就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坚持反集家斗争。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下，全村130户人家，只有20户富户人家屈从日伪的压力进了“人圈”，110户群众始终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凝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整体，王厂沟根据地巍然不动。在1942和1943年，斗争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中，这里成了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一块主要基地，几次重大决策，如打治安军战役、恢复基本区战役等，都是在这里作出的。这是王厂沟人民永远引以为荣的历史奉献。

(二)“无人区”根据地里建设抗日政权

在白热化的反集家斗争中，山区根据地里的基层政权组织，出现了急剧的转化。1941 年以前，山区的基层政权组织大部是两面的，可是，从 1941 年下半年，日伪大规模集家并村后，把深山区大部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出现了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斗争形势。房子被烧，家园被毁，一切生路被断绝，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群众丢掉了对日伪的一切幻想。尽管日伪军不断来“扫荡”，而且更加频繁，并且进行政治攻势，麻痹群众。然而，所有根据地的村庄都与日伪彻底断绝了一切往来，所有的“两面村”，一下子都转化成抗日一面村。根据政权性质的变化，需要及时进行改组。另外，在日伪大集家过程中，许多中间地带的群众纷纷迁进根据地，而靠近根据地边缘的群众，也大量迁入深山，重新建立聚居点。这样群众性的大迁徙大转移，使许多原来的政权隶属关系被打乱，也迫切需要整顿。

针对变化的情况，各根据地里及时整顿了政权组织。由于大部地区都变成了与日伪誓不两立的抗日一面村，所以，在根据地里彻底摧毁伪满基层政权的村、甲、牌残余组织，建立起一面的抗日村政委员会。为了适应在反集家斗争中群众性大迁徙形成的新形势，在各块根据地里分片建立中心村，下设若干个行政村，分头领导星罗棋布的居民点。

尽管反集家斗争中环境异常紧张，但在基层政权建设中绝不草率从事，也不搞领导指派，而是在群众中充分酝酿，尊重群众的民主愿望，实行选举制度。由于山区群众普遍没有文化，难以实行投票选举，就采取“豆选”的办法，由群众直接选

举村政委员、村长等。这种简陋的选举，在山区根据地群众的心目中却是神圣无比的。他们意识到这是他们翻身做主人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更与日伪的残暴法西斯统治做对比，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生活极为珍视。当时流行着一首歌曲，歌中唱道："六月三伏天，日寇实行大并乡；数九寒天北风紧，日寇要搞大'检举'。万众一心齐努力，并乡'检举'都粉碎；根据地里把身安，建立人民好政权。铺着地盖着天，星星月亮照经年；露天房岔去安眠，这里有我自由权！"

政治民主化成了抗日战争中党联系人民的纽带；政治民主化，获得了潜藏在民众中的巨大能量。

（三）全　民　皆　兵

在"无人区"这种特定环境中建设抗日根据地，武装人民，加强民兵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正如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关于恢复开辟热辽的各种政策·武装政策》中指出的："必须清楚了解，建设与开辟热辽根据地，就一定要武装热辽人民，组织起有力的热辽本地武装。没有这一工作的完成，则我们建设热辽根据地就会成为不可能。"而"无人区"的广大群众，经过日伪连年的集家并村，疯狂"扫荡"摧毁，已经彻底倾家荡产，赤条条一无所有，所有的，就是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的赤胆忠心。武装起来，以牙还牙，战胜敌人，是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于是，在各块根据地里，在发展党组织和建设抗日政权的同时，突出地加强了民兵武装建设。县设武装部，区设大队部，各中心村设中队部，各村设分队或民兵班。据兴隆县统计，在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几块根据地里，有群众约 3 万人，而民兵自卫队达 6000 多名。青壮年都参加了民兵，许多青

年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参加武装斗争，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不少老头老太太，也随身带上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同日伪军拼命。“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全民皆兵。

（四）减　租　减　息

在各块根据地里，普遍建立了报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还建立了农会，并且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山区穷苦人民，大都是生活潦倒而逃荒进山的，靠伐木、开荒、狩猎，维持最低的生计，然而又要受到严重的盘剥。山区里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占山户”与“种地户”的阶级关系。穷苦人进得山来，惨淡经营十几年或几十年，有了赖以糊口的土地和家园，殊不知，地主、豪绅勾结官府，立下一纸官契，就占有了整个山川，称为“占山户”。而穷苦人开荒的土地被“占山户”霸占后，就沦为无立锥之地的租佃户。如兴隆县狗背岭根据地的中心村朱家沟，全村 40 多户农民都租种朱家地主的土地，而实际上朱家手中只有 2.5 亩的官契。山区里的借贷盘剥更为惨重，有的称为“一米七粟”，就是春借一斗米，秋还七斗谷；有的称为“年三大加二”，就是一年的五月节、八月节和年节三次计息，利加利，利滚利，而且收息时要用大加二（一斗加二升）的计量。在日本侵占热河后，特别是制造“无人区”以后，大地主逃往大城市，中小地主逃往据点或部落中。当根据地断决与日伪一切关系成为抗日一面村以后，逃亡地主难以再经管土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考虑到“无人区”的特殊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对“占山户”依仗官府势力霸占的土地和带有勒索性的“一米七粟”“年三大加二”的高利债

务，按政策予以废除，土地归还农民，利息重新计算。就这样，使千千万万农民挣脱了身上的经济枷锁。对于那些一般的正常的租佃关系，则考虑到“无人区”的特殊环境，不论穷富都已倾家荡产，即使是逃入据点和部落的，只要不当汉奸干坏事，都体谅他们的处境，大宽容度地执行政策，在减租及增资的幅度上，要兼顾双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大前提是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有利于团结抗战。如兴隆县狗背岭根据地响水湖村农民孔庆芳，长年租种地主王绍基的土地，租粮 2000 斤。1942 年日伪集家并村时，王绍基被迫迁入六道河子部落，抛弃了土地家园。减租运动中，决定土地仍由孔庆芳耕种。由于日伪军“割青扫荡”摧毁，收成大减，但到秋后仍按政策交给王家 900 斤租粮。张相沟佃农李文彩，长年租种镇罗营据点内地主王凤元几亩土地，言明租粮 500 斤，减租中按政策计算应交租粮 200 斤，秋后李文彩主动交给了王凤元。王凤元和王绍基收到租粮后，深为感动，主动与根据地建立关系，为根据地提供情报。

（五）文 化 生 活

在环境严酷的“无人区”里，各块根据地里村村办起了识字班、夜校，并以识字班、夜校为阵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本来山区人家居住就很分散，而在反集家斗争中，原来的自然村落，又分散成独户窝铺，隐居在奥峪深山，家家隔山，户户越涧，就在这“云深不知处”的山旮旯里，每个自然居民片都自动结合，结成识字班或学习小组。这样的文化夜校，在狗背岭一块根据地里，就办了 6 所。以青年民兵为骨干有 42 人常年坚持学习，从 1942 年办起，从未间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

利。学习的课本都是县、区干部辅导编写的。学习的课程内容，都是紧密结合战斗生活，从“打日本，救中国”之类内容学起，并辅以时事、政治及数学等。很多人都认识到1000到2000个字，能读书报和写信、记帐，不少人后来成了优秀的脱产干部。象战斗英雄范山林，建国后担任乡、社党委书记多年，就是在本村抗战夜校里打下的文化基础。

在识字班夜校里，还开展歌咏、读报等文化活动。在恶劣得难以生存的“无人区”里，这样的文化生活虽然很简陋，但对世代同文化无缘的穷苦山民来说，既是知识的启蒙，更是革命理想的启蒙，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热辽地区根据地的建设，不仅对坚持“无人区”斗争起到了支撑全局的作用，而且对整个冀热边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有的贡献。1944年9月19日，冀热边特委在《对恢复口外工作决定》文件中评价说：“口外广大山地是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有利依托，历次口里环境紧张时，我们均依靠口外山地得到休整、苏息，并依此有利阵地驱除口里敌人，恢复我被摧残地区。如无口外山地作依托，冀东游击战争的坚持是会遇到更多困难的。

七、长城南侧的“无人区”

1942年6月至1943年上半年，正值伪满方面日伪在长城北侧热辽地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期间，伪蒙疆方面日伪军加紧推行所谓“治安跃进计划”；华北方面日伪军疯狂进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且与伪满方面日伪通力协作，在长城南侧制造“无人区”，三方合力，两面夹击，妄图摧毁长城线上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伪蒙疆方面的“无人区”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辖境的延庆、龙关、赤城交界地带的大海陀山区，是平北地区的主要根据地。为了摧毁这块抗日根据地，伪蒙疆方面日伪军连年不断进攻“扫荡”，但根据地始终巍然屹立。1942年夏，伪蒙疆政府制定了《赤龙延三县特别工作计划》，决定以摧毁大海陀山区根据地为目标，实施“集家防卫措施”。

伪蒙疆方面日伪在其《计划》中总结教训说：“前年以来，经过数次武力讨伐和肃正工作，但那种大风一过式的讨伐，尽管规模很大，但其效果却是虎头蛇尾”。因此，这次要以实施“集家防卫措施”为主，制造“无住地带”。

伪蒙疆宣化省政府曾出示一张制造“无住地带”的布告，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其推行“集家防卫措施”与伪满方面制造

“无人区”的措施如出一辙。《布告》中说：

“查近来平北地区之一部，竟有跳梁之共党不时出没，……为挽救垣域内居住之良民脱离匪患，于匪跋扈地区指定‘无住地带’，令彼等良民移住无匪地域，而使敌匪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歼灭之境。……

禁止限制事项：

1、如无官方之许可，不得擅于无住地带内耕种地亩；

2、如无官方之许可，亦不得遂意进入或通行于无住地带。”

根据日伪文件记载和实际情况的调查，伪蒙疆方面日伪制造“无人区”的范围：西迄长安岭，东至靖安堡（白河堡），北自鹏鹗、后城一线，南至滥角、后河一线，包括整个大海陀山区根据地，并且由延庆岔道至永宁镇挖了一条封锁沟，切断大海陀根据地与延庆南山根据地的联系。

从 1942 年 6 月起，伪蒙疆方面集中重兵，对大海陀山区根据地发动进攻，再也不是“大风一过式的讨伐”了，而是稳扎稳打，分区域“扫荡”，采取碉堡推进政策，逐步压缩，反复摧毁，不少村落连续被“扫荡”几十次，被烧毁七八次。

为了粉碎日伪制造“无人区”的毒辣措施，保卫根据地，平北地委及时发出《反并村斗争的指示》，党政军民总动员，内线防御与外线出击相配合，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争夺，终于粉碎了日伪阴谋计划，保住了大海陀山区根据地。

（二）冀东地区的“无人区”

1、对冀东“再认识”

1942年春季和夏季，冀东抗日军民连续粉碎了日伪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特别是向热河、辽西及平津近郊的出击，猛烈扩大了新游击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为震惊，叫嚣对冀东要“再认识”，并且决定在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在冀东以及平北部分地区（包括伪冀东道、燕京道）沿长城南侧制造“无人区”。

对冀东如何“再认识”呢？从日本宪兵队《灭共对策资料第一四号·冀东地区中共党的概观》一文中，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其中特别是对冀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是给予特别重视的。文中说：

“冀东是进攻满洲的前进基地，是日本军的深渊后方，同时又是日苏战争上，切断日军的进击路线的最有力的地理条件的地区。

日军确保冀东，就能确立满洲。对苏进攻也会可能容易。因此，彼此双方的斗争将会日趋炽热化。”

为了“再认识”冀东形势，冈村宁次于1942年6月，视察冀东。听取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少将步兵团长铃木启久的报告，具体地分析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摧毁鲁家峪等游击根据地之后冀东八路军的动向。铃木启久这样说：

“我军占领鲁家峪，使八路军确实受到巨大打击。但是他们放弃了这处阵地，并不表明八路军减弱了。他们往往放弃一处阵地，又进入另一处山区。另一方面，他们对地下工作非常努力，可以说这是增加了他们的实力。……虽然这些地区表面上看来不象以前那样活跃了，象是一块白色的土地，但是只要剥开一层表皮，就会发现红色的土地。那么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呢？我只能回答

说，在山区，因此我们必须对山区彻底的打击不可。……在长城附近的山地，有相当多的中国居民，他们虽然不完全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但他们隐藏八路军确是事实。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干 一下。”[①]

铃木启久对冀东形势的估计立即得到证明，这就是冀东我军于6月至7月间发动的“复仇战役”，连续作战，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恢复了日伪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所摧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游击区发展，子弟兵壮大。毫无疑义，这会更加深日伪对冀东的“再认识”的。

也许是巧合，华北方面日伪军与伪蒙疆方面，对武力“讨伐”的失败发出了同一声调的哀叹：“那种千篇一律的讨伐，不仅效果微小，反而起到相反效果，……丧失民心，……更加招致共产党势力的扩大”，而且“促成了抗日战士的团结，培养战术技术方面作出贡献，……将原来缺乏训练且有脆弱性的农民，终于培育成今天的十二、十三团为基干的优秀队伍。”[②]

“大风一过”也好，“千篇一律”也好，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居然不再迷信他们的武力了。这从反面对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全民战争的战略策略的正确和英明。

2、部署制造“无人区”

1942年8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主持兵团长会议，下达命令说：

“目前南方正在广大海域作战，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少数兵

---

① 铃木启久《制造“无住地带”》。选自(日)原岛修一编《日本战犯回忆录》。香港四海出版社1975年1月出版。

② 《灭共对策资料第一四号·冀东地区中共党的概观》。

力确保大陆，不使南方战线有后顾之忧。然而，作为基地的本方面军管区内，特别是冀东方面的治安，处于极其令人忧虑的境况。这样情况继续下去，是目前形势所不许的，必须迅速肃正，以免有所风吹草动。”随即命令第二十七师团全部开赴冀东，从9月1日起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且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①

对“无人区”内的禁止限制事项作出如下规定：

“沿长城线，距长城线4公里的遵化、迁安两县地区的居民，一律撵走，严禁在此地区耕作或通行。此地区划为‘无人区’。

甲、该地区的居民自9月×日，20天内离开划定区以外，不得留下一人；

乙、撤离时，自己能搬走的一切东西（粮食、家具等）在指定期限内搬完；

丙、自划定线至长城线的地方，禁止一切耕作；

丁、撤离后，房屋和剩下的物品全部烧毁；

戊、该地域内在20天以后，严禁进入和通行。”②

3、日本方面的记载

关于在冀东地区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具体实施情况，《华北治安战》③ 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为了隔断与满洲国的出入，在长城内侧由马兰峪

---

① 铃木启久《我在冀东任职期间的军事行动》。河北省政协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② 同上。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第214页。

(遵化以西约30公里)到建昌(迁安以北约20公里)附近,使宽约4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地区成为无人区,将所有的村庄迁并到别处。"

"长城无人区包括76个村,1235户,6454人;暂时无人村28个,2343户,12036人。"

铃木启久在其《制造"无住地带"》一文中对在他指挥下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作了详细的交代。当制造"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后,他曾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乘飞机视察"无人区"的情况,记述了"无人区"被摧毁的惨状。

"飞机沿长城线向西飞行再折向南边,不久就飞到迁安县北部地区上空。这里原来青色的森林出现了一块块的红色和黑色的烧毁和烧焦的痕迹。我想:'到了,从这里起就是所制造的无住地带了',我打开地图查看时,飞机已到了遵化县上空。

看看下方,只见森林中出现无数个烧成红色和黑色的大火后的灾迹。许多显然是整个村庄焚毁后,大火蔓延烧向山林形成更大的山火,这些灾迹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呈椭园形,非常之多。一根根光秃秃的烧成黑色的树干,杂乱地林立在山头。

这里原来有许多村庄,但现在只剩下烧光的残迹,一户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证明计划成功!我一面这样想,一面仔细观察地面,突然从森林中看到有些淡紫色和白色的烟雾冒了出来。我想,还是有人,搜查得还是不够严密。我参照地图确定了它的位置,划下了记号。

第二天,我立即将各联队长召集到我的办公室,我把地图上的位置告诉联队长,然后下令说:'你们务必要加

强严厉地斩根烧绝，彻底清出一条无人地区。

……

之后，各个联队更加每一天都严密地执行搜查和烧光、杀绝、赶绝的政策，把所有遗留的家宅村庄，一栋不剩地烧光、毁光，反抗者一律屠杀，把不能反抗的老百姓一律押送到满洲，让他们供给关东军光当劳役和作苦工。

这是步兵团下令制造‘无人地带’以来，仅仅20天就把冀东地区糟蹋成这种样子。

在这个期间内，日本军强夺了约640平方公里的中国老百姓的土地。十几万中国老百姓被迫挨着冻饿流走到他处。一万数千户老百姓的房屋被日军烧成灰烬，约200多名中国农民仅仅因为用愤怒的眼光投向日军而被杀害。”

4、实际情况出人很大

《华北治安战》和铃木启久《制造“无人地带”》一文中关于“无人区”范围的记载，只是伪冀东道区域内的，而且是计划数字，实际实施的范围要大得多。

据记载，长城线上带状“无人区”东起迁安县建昌营，西至遵化县马兰峪。而实际制造的“无人区”，向东延伸到卢龙县的桃林口，与沿青龙河岸的封锁沟相衔接。而向西则更远，那是日军第十五旅团在伪燕京道境内制造的。“无人区”封锁沟东起蓟县壕门，与伪冀东道境内“无人区”封锁沟相衔接，向西经由蓟县全境及三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直抵昌平县的桃峪口，总长度约500多公里。

据日方记载，沿长城带状“无人区”的宽度是4公里，这只是计划中的数字。而实际实施的是依山脉的自然走向，沿山脚

挖成封锁沟，作为“无人区”的边界。所以，实际搞成的“无人区”要比计划数字宽得多，一般都在8公里或10公里，而在喜峰口内和蓟县盘山根据地，都宽达30多公里。

据勘测，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的带状“无人区”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搞得比较彻底的约1500平方公里。

至于《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提到的“暂时无人村”，书中亦只是一笔带过了。实际上是与在长城线上制造带状“无人区”同步实施的，目的就是摧毁冀东基本区内多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据各县党史部门实地调查，共计有8块：

遵化县4块：以鲁家峪为中心的5个村；以娘娘庙为中心的12个村；鸡鸣村2个村；高拔岭1个村。

迁安县和迁西县1块：以莲花院为中心，共50个村（包括丰润县潘家峪）。

丰润县2块：火石营1个村；黑山沟、西新营等4个村。

滦县1块：以赵家峪为中心青龙山区5个村。

总计80多村。

5、**血腥罪行**

如前所述，战犯铃木启久对在冀东地区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作出了交代，然而那只是开始制造“无人区”时20天的情况，又只是凭他当时听的报告和事后的回忆，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不但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暴行一笔抹煞，而且凭空大加美化，说什么是“采取收购农作物并保障今后生活的手段使居民迁出”。[1]

---

①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215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谎言是掩盖不住历史事实的。

为了便于与《华北治安战》的记述相对照，这里举出迁安、迁西（历史上是迁安县）、遵化三县党史部门对“无人区”调查的各项数字。

一、关于“无人区”的范围：迁安县约500平方公里；迁西约500平方公里；遵化约300平方公里。总计约1300多平方公里。

二、“无人区”包括的村、户、人口：迁安72村，约2000户，1万多口人；迁西100多村，5500户，2.3万多口人；遵化县87村，6680户，3万多人。总计，259村，14180户，6.3万人。

所有“无人区”内的群众，几乎没有一户是容得搬家而自行迁出的，都是被日军武力驱赶背井离乡四散逃亡的，而房屋、粮食、衣物及一切生活用品全部被纵火烧毁。据统计，遵化县被烧房屋9000间，迁西县2.9万间，迁安县6400间，总计，4.4万多间。

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地屠杀。1942年9月10日，迁安县日本驻军将从长城线上“无人区”里抓捕的312名群众，集体屠杀在大杨官营老牛圈。据遵化县的调查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共屠杀中国人2238人，而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就屠杀了1200人。长城线上马蹄峪、沙坡峪、冷咀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被屠杀647人。迁西县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屠杀群众2503人，而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就屠杀了1460人。

日军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没有象伪满方面那样建设部落集家并村，而大部是武力驱赶。但是对一些根据地的群众，则采取了搞集家点的办法，强令群众集中居住，并派军警

加以控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生活困苦，许多人死于饥寒和瘟疫。据统计，迁安县几个集家点里就冻饿和病死1000多人，小关庄村800口人，就死了300多口。遵化县死于瘟疫的650人，死于饥寒的570人。迁西县死于瘟疫的约2200人。而有些集家点上的群众更遭到一些意外灾害，如迁西县大韦庄的集家点，设在了一条空旷的大山沟里，附近19个村2000多户1万多口人被强迫搬来居住，家家户户都是搭的茅草窝棚，挨挨挤挤连成了一条五里长街，不意一场大火烧了个净光，有20多人丧身火海。

这就是《华北治安战》一书所美化的"保障今后生活"的真象。

6、顽强的斗争

日军在长城南侧制造的带状"无人区"及多块的"暂时无人村"，大部地区都是抗日游击根据地和稳固的游击区，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抗日军民团结奋战展开激烈的保卫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象古北口东翼长城线内侧和黄崖关内的广大山区，虽然被日军划为"非治安区"，反复烧杀摧毁，但始终没能制造成"无人区"。遵化县沙坡峪至洪山口一线，迁西县喜峰口里长河川及迁安县小关庄等地区，都是抗日根据地，虽然日军用重兵反复"扫荡"摧毁，并且认为制造"无人区"成功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成为"无人区"。据调查，在遵化县长城线上"无人区"里，始终有138户，380多人坚持在根据地里。迁西县喜峰口内大片"无人区"里，始终有1.2万多人坚持战斗。

为了保卫长城线上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游击队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日军。据迁安县统计，1942年9月以后，在坚持"无人区"斗争过程中，子弟兵和民兵共作战15次，歼灭日伪

军1000余名。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对日伪军发动政治攻势，收到了很大效果。如迁安"无人区"内的黄金寨、高古庄、大庄等碉堡的伪军相继起义，参加了八路军。遵化县洪山口驻防的伪治安军，经过政治争取，倾向抗日，不但尽可能地保护群众，而且暗地里支持抗日工作，使洪山口、龙井关一带的"无人区"封锁线有名无实，成了由冀东基本区通往热南的一条重要的地下通道。在长城南侧"无人区"里，设有许多处物资站，开辟了许多条地下通道，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热南根据地，对支持那里的更为艰苦的"无人区"斗争起到了很大作用。

蓟县盘山根据地民兵班的斗争精神最为顽强。从1942年秋，日军在盘山周围30多个村庄制造"无人区"，共产党员丁福顺就团结起10个民兵，组成盘山班，顽强坚持在盘山根据地里，一直坚持到1943年夏季恢复基本区战役。在这将近一年的时期里，他们受尽了种种苦难和日伪军的多次"围剿"。最困难的是在深秋到隆冬的季节里，树叶、野菜都没有了，他们就靠吃白薯秧子度过了一个寒冬。1943年春节，一场大雪封了山，日伪军又乘机进山搜索"扫荡"，扬言不是追死就是困死盘山班的民兵们。民兵们被困在"清凉洞"里整整七天七夜。他们带来的几个白薯叶团子吃光了，大家就噙雪团啃冰块，险些被冻死饿死在山洞里。日伪军搜不到民兵们，就遍山呼唤诱降他们，说："你们出来吧，下山吧，要什么有什么！"还指名道姓对民兵们喊："你们这些穷光蛋，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盘山上有你们什么？下山来吧！"是啊，盘山班的民兵们都是贫无立锥之地的穷苦人，班长丁福顺哥仨，是三条穷光棍，都快穷断了根了。可是这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握着手中沉甸甸的步枪，强烈地意识到旧社会，祖祖辈辈是统治者

的枪口对着穷苦人，而今共产党交给了他们枪，交给他们坚持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就要为祖国的解放为自己的翻身去战斗。日伪军"扫荡"过后不久，伪县长差人送来一封劝降信，盘山班民兵英雄们回答的好："我们头顶的中国的天，脚踏的中国的地，盘山是抗日根据地，我们要用生命来保卫！"

长城内侧的"无人区"，是在 1943 年夏季被粉碎的。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冀东我军在 1943 年春季和夏季，连续发动两次恢复冀东基本区的战役行动，从长城外杀回基本区，突破"无人区"封锁线，荡平了沟壕碉堡，基本区内的"暂时无人村"，也随着战役的胜利进展而得到恢复，群众又纷纷回到家园，重新建设起更加巩固的根据地。

八、热辽地区全面制造“无人区”

1943年间，热中、热东、辽西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冀热边区战略格局的形成，中共冀热边特委和行署新体制的出现，引起伪满方面日伪的密切注视。出笼于1943年的一份《对中共冀东党的战略分析及对策》文件中指出：“为形成冀热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一贯的动向”，冀热边新体制的出现，“表现了冀热区之特性”。针锋相对提出对策，从1943年春开始，在1942年已在长城沿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基础上，重新作出规划，猛烈扩大制造“无人区”的范围，凡是抗日游击区，全面制造“无人区”。

（一）在热东、辽西

前面已经交代过，1942年间日伪在长城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范围，东至青龙河西岸从凌源叨尔凳至卢龙桃林口一线。1943年春，日伪在热东、辽西制造新的“无人区”规划的范围，就是西迄青龙河东岸，向东至九门口（距山海关10公里）；南迄长城线，北抵凌源要路沟至王宝营一线，宽约30至50公里不等，包括青龙县东部、凌源、建昌南部及绥中西部广大山区。

制造“无人区”规划制订后，从1943年2月开始，就集中兵力大“扫荡”，强迫群众修建部落，驱赶群众集家并村。刚刚

组建起来的凌青绥工委、办事处，在第十二团和七区队的支持下展开了激烈的反集家斗争。十二团和七区队，曾集中兵力在青龙县杨树窝铺、龙王庙伏击日伪军，配合游击队打开三岔口、安子岭等几处日伪“义仓”粮库，把日伪军抢来的粮食还给群众。为了适应反集家斗争的需要，第十二团、七区队各抽出一部分部队，分散成以排为单位，主动接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组成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战斗队，分配到各区去支持反集家斗争。为了保卫老岭根据地，帮助花厂峪建立起民兵爆破组、侦察组，经常出击到五道岭、娄子石、江水岭、白雀沟等地去摆设地雷阵和侦察情报，并配合七区队拔除了由老岭根据地通往关内的吴庄据点，粉碎了日伪对根据地的封锁，打通了凌青绥与关内基本区的主要通道。

在抗日军民激烈的反抗下，日伪几次集家并村计划被粉碎，斗争持续到秋季，日伪军下了毒手。9 月 18 日，长城内外日伪军集中 5000 余兵力，分 10 路合围老岭根据地，足足围困“扫荡”了 17 天，对老岭根据地的中心村花厂峪予以彻底摧毁。花厂峪党支部领导群众展开顽强斗争，坚决不下山，并且下大力搞好坚壁清野，保护好群众，掩护好公粮公物。在日伪反复“扫荡”搜索中，党支部书记米恩林、党员徐尚勤等 6 户，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献出了 8 个小儿女的生命，并有 20 多名党员和骨干分子光荣牺牲。但是，终于保住了根据地，并且获得了“铜墙铁壁花厂峪”的光荣称号。

日伪在疯狂摧毁老岭根据地的同时，以重兵展开全面大“扫荡”。霎时间，凌青绥新游击区里腥风血雨，烈焰冲天，村村被夷为废墟，无辜群众遭屠杀。据统计，凌青绥地区反集家斗争中有 1 万余群众被屠杀，仅青龙县就被杀害 7200 多人。已

接近初冬季节，群众的食住都成了大难题，中共凌青绥工委遂决定及时转变斗争策略，在一般游击区，停止拆“人圈”反集家斗争，转入“人圈”内部隐蔽工作。而在群众基础较好，山势险峻的地区，组织群众继续坚持山地斗争。经过顽强拼搏，除坚持住以花厂峪为中心的老岭根据地外，并且在青龙县茨榆山南沟、钟响沟、黄石砬，绥中县周岭沟、塔子沟、葫芦套沟、跳石沟，凌源县吴杖子、佛爷洞、要路沟等地，建立了隐蔽的游击基地。

（二）在　热　中

1、孤悬敌后的不利处境

从日本档案资料中看到，伪满方面日伪对承平宁这块冀热边突出最远的抗日游击区异常重视，视为八路军向东北腹地推进的主要出击方向，决心加以扼制。从1942年间，日伪沿长城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之际，就将都山区制造成“无人区”，从锦热路至长城线纵深百余里的游击区被摧垮，隔断了承平宁与冀东基本区的联系，陷于孤悬敌后的状态。从1943年春，日伪形成的在热辽地区全面制造“无人区”的规划，将承平宁地区列为重点，对刚刚形成局面而尚未建立县机构的承平宁地区加以疯狂摧残。

日伪在承平宁制造“无人区”，是先从摧毁光头山这块孤立于敌后的根据地下手的。从1943年春节，日伪军大举围攻光头山之后，就将光头山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继续反复“扫荡”。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在连续“扫荡”中，多次发起大“检举”，着力摧毁基层抗日组织，并同时驱赶群众集家并村。

在审判日军战犯前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

明的罪行时，中国特别军事法厅对日军在光头山区实行大“检举”情况作过调查，取得大量材料，并经木村光明供认不讳，记录在案。摘录如下：

“光头山南侧大逮捕：与袭击光头山我武装部队的同时，日伪军警宪300余人，自腊月30日（1943年2月4日）夜五更开始大逮捕。以开会为藉口，将大地、张家营子、马架子、九神庙、车轮窖等村男子全部集中起来，至正月初八（2月12日）为止，共逮捕现在有姓名可查者297名。

光头山西南侧大逮捕：在圣祖庙、榆树底、三家、和家、三沟、六沟一带，据现在有姓名可查者72人。（南侧大逮捕同时进行）

光头山西南侧二次大逮捕：同年农历6月18日（1943年7月19日）发生。日伪警宪特350余人，从和家、榆树底、严家营、龙王庙4个村捕去84人；从石凳上、东沟门、大西沟捕去20人。”

另外，在其他地方也不断进行搜捕，据统计，1943年上半年内，计共在光头山地区逮捕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740多人。使光头山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

2、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

在日伪军持续疯狂的摧毁下，光头山根据地暂时难以站脚，周围的4个区也岌岌可危。承平宁工作团的党政干部遂分成两路，一路由杨雨民率领向赤峰以西及隆化县茅荆坝、围场毛大坝等高原地区发展。另一路由周治国率领，向叶柏寿、朝阳一带发展。并先后两次派人去东北吉林等地寻找东北抗日联军。

第三区队和地方游击队更顽强奋战，先后拔除三座店、小

寺沟、头道营、驿马吐等重要据点。8月20日，在平泉盘道梁设伏，击毙伪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和宪兵队长夏谷两个制造“无人区”的祸首，给制造“无人区”日伪以沉重打击。

在三区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承平宁工作团又积极恢复光头山根据地和周围的4个区，再加上新开辟的两个新区，承平宁共建立6个区。遂于1943年5月，建立承平宁抗日联合县，工委书记杨西民，办事处主任周治国，三区队和游击队发展到600多人。

在青纱帐期间，承平宁地区一面恢复光头山根据地和中心区，一面继续向东西扩展，又开辟出两个新区（未正式建区）。然而，从秋季开始，日伪又集中力量大搞集家并村，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且承平宁大部是新区，基础薄弱，在日伪重兵反复“扫荡”，疯狂烧杀的摧残下，到1943年冬季，大部地区被集家并村，失去群众依托，部队及地方干部吃住及各种物品供应都非常困难，而且远离基本区，得不到支援。为了摆脱困境，1944年2月6日，三区队一举攻入原宁城县址小城子，伪满方面大为震惊，又迅速从东北各地调来万余兵力对承平宁地区发动更加疯狂的“扫荡”，而且更加扩大“无人区”范围，游击队活动到那里，就立即在那里集家并村，根本不容许抗日力量站脚。三区队和游击队，在没有休整的情况下连续作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1944年2月6日，三区队二连副连长舒殿有率两个排在宁城李营子南山遭三路日伪军奔袭合围，在拼到弹尽药绝时，舒殿有高喊：“誓死不当俘虏！”带头从身后悬崖上跳了下去。结果舒殿有和8名战士牺牲，许多人跌伤，但终于大部突出了重围。

赵洪武游击队在宁城胡家营遭日伪军包围，17 名战士拼到最后被俘。日伪军威逼他们投降，17 名战士个个横眉冷对，威武不屈。从队长赵洪武起 16 个人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小战士丙丁火（原名巩书安），这个 16 岁的小战士，面对着 16 名倒在血泊里的战友，愤慨大骂诱降的日军，光荣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面对严峻的局面，承平宁工委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三区队暂时返回基本区休整。区队长高桥却派主力连队带电台、好武器回基本区，他亲自率一个排就地坚持。不幸，于 1944 年 3 月 29 日，在宁城八素台老西沟遭到日伪军袭击，高桥和全排战士全部光荣牺牲。英勇善战的高桥区队长时年仅 29 岁。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竟然将高桥的头颅一直展览示众到其覆亡。

1944 年夏，日伪在承平宁全面完成集家并村，承平宁地区的部队和党政干部陆续返回基本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地下斗争。1943 年 5 月建立承平宁联合县时共有干部战士 600 多人，到最后撤离时已不足百人了。留在七老图山和老哈河畔的是一座座无名墓碑。1979 年群众在光头山上伐木时，在森林中发现一具革命战士的骸骨，身边的钢枪已锈蚀得不成样子了。

作家刘白羽于 1946 年曾访问当时已是热河省副省长的杨雨民，深深为承平宁抗日军民的顽强斗争精神所感动，以《创世纪》为题写文章称颂说："他们作了世界上任何人想象不到也非常人体力所能支持的事情"，他们的斗争事迹"供给了我们一部丰富的热河人民斗争史——从死到生，从死亡中创

造了新生的世界。”[1]

（三）全面完成集家并村

日伪在热东、辽西及热中地区集家并村的同时，对热西地区也按照总体规划更大范围地扩大集家并村。1942 年大规模集家并村时，沿古魏长城搞到丰宁县的千家店、花盆、红旗甸一带山区。1943 年春季开始，又沿长城向北扩展到独石口，将整个黑河川及老丈坝、大滩等坝上地区，都实行集家并村，并沿长城划定“无住禁作地带”，严密封锁其所谓“国境”线。与此同时，在丰宁县全境及隆化县大部地区，1 万多平方公里的并没有抗日活动的地域里也全部集家并村。

从 1939 年开始，到 1944 年春，经过近 5 年多时间，日伪宣布在热辽地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基本完成。其范围相当广泛而错综复杂，多年来，各地党史工作者作了大量调查，已基本上弄清。按现在区划，包括青龙、宽城、承德、兴隆、滦平等 5 个县的全境；丰宁、隆化、怀柔、平泉、宁城、建昌、凌源等 7 个县的大部地区；绥中、喀喇沁旗、围场的局部地区；平谷、密云、延庆、赤城等县长城以北当时被划入伪满辖境的地区，还有遵化马兰峪的所谓“满洲国特区”。据统计，“无人区”总面积约 5 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为 8500 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 1.7 万个（在平泉、宁城等地 100 多个只集家未建“人圈”的村子未计算在内），共建立 2506 座“人圈”，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 140 万人。这样，在东起九门口，西抵独石口（约长 850 公里），北起围场，南至长城内侧（最宽处约 250 公

[1] 《时代的印象》，光华书局出版。

里),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绝缘体式的特殊战略地带。(见无人区及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九、“无住禁作地带”

（一）“攻　伐” 民　众

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切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总要打出“拯救民众”之类的幌子，以欺骗舆论。然而，日本侵略者对于制造“无人区”的实质目的却有着露骨地表白，他们引经据典地说：

“孙子兵法云：伐人之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谓伐交，即攻伐支援敌人的第三者，在这里来说，即对民众予以讨伐，把支持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夺过来，而归顺我方，……集家工作的最大意义即在于此。”①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一语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原文的意思是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日本宪兵队的引据不尽确切，却赤裸裸地暴露出侵略者公然“攻伐”民众的狰狞面目。

如前所述，1942 年间日伪沿长城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之日起，即开始在宽城大地，兴隆五指山及丰滦密等地区，将抗日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以进行摧毁，从 1943 年日伪在热辽地区全面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后，即将滦平、兴

① 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 1942 年 10 月发出的《灭共对策资料》。

隆、宽城、青龙以及老岭，光头山根据地及较稳固的游击区，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残，一切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用日本文件中的话说，就是“要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①。

（二）杀　光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就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如前所述，从 1941 年开始大集家，就伴随着疯狂的大“检举”和大屠杀。即到 1943 年全面集家并村并且大范围划定“无住禁作地带”以后，对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见一个杀一个。发了疯的日本侵略军竟然搞杀人比赛，闯进根据地的日本兵，就象追捕猎物一般，追杀中国人。杀死后将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回去可以按数报功领赏。如此残暴行径，如果不是笔者当年在“无人区”里亲闻目睹，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当年驻密云县白马关日军机枪分队长船生退助写的《无人区》一文，对日军的此类行径提供了佐证。文中说：

> “作战命令规定的方针：为了建立无人区，我们要进行扫荡讨伐，把所有房屋统统烧掉，追杀射击中国人……不问任何理由枪毙。”

该文中记述 1942 年 9 月间日军讨伐密云县西白莲峪时的情况说，日军在已经被夷为一片废墟的白莲峪的一条小山沟里，竟然意外的发现了一间小屋，里边有一个 70 多岁抱病垂危的老农民和两个小男孩，大的六七岁，小的四五岁。可以想象，这祖孙 3 人对任何人也不会构成危害的，然而船生退助

---

① 1943 年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灭共对策资料》。

等“为了中队的成绩”，先是放火烧了房子，把动转不得的老人活活烧死在屋里，又把两个哭喊爷爷的孩子一枪一个杀害了。而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第十七大队第十中队的阵中日记上则说：“1942年9月24日，船生分队的成绩：消灭山里农民1个，烧毁房屋1间，遗弃通匪嫌疑者尸体3具。”即便如此，也还是掩盖不了其罪行。

宽城县孟子岭、王厂沟、石柱村一带，是日军制造“无住禁作地带”的重点地区。1943年9月10日，驻喜峰口的日本宪兵队第二游击队对这一带“扫荡”，从这一带逮捕了580人，屠杀380人，200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80%死于苦役之中。从1943年12月，石柱村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以后，遭到日军连续摧毁，全村700多人，被屠杀300多人，有22户(100多人)被杀绝。

在审判日军战犯、前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大尉特高课长木村光明时，石柱村张国胜、何殿惠、何玉成等曾连名揭发日本宪兵队的暴行，木村光明对此供认不讳，签字认定说：

> “我确认这些罪行确系承德宪兵队所为，作为当时宪兵队特高课长的我应负全部责任。”

兴隆县是日军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全县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地区占总面积的40%多，(见伪满热河省公署总务科绘制的兴隆县地图)在连续几年的摧毁下，根据地里被屠杀约1.3万人。特别是1943年以后，日军在完成面上的集家并村后，更集中力量疯狂摧毁根据地。在几块根据地里，不要说是中国人，就连牲畜、家禽，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全不放过。到后来，在热南山区根据地里，连一头驴一只鸡也难以见到了。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曹

操《蒿里行》)羊羔峪张村长家有一只劫后余生的小猪,大家都当成稀罕物,倍加喜爱它。这只小猪对当时的战斗环境似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日军来了,大家转移,它就从圈里跑出来,乖觉地跟在人们后面去隐蔽。

(三)烧　光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毒辣手段的手段之一,就是彻底摧毁群众的一切居住条件。对一般的集家区,划为"无住地带",强迫群众将房子彻底拆毁,搬进"人圈"。在"人圈"以外,绝对不准居住。而对划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的抗日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是纵火焚烧,片瓦不留。据统计,整个"无人区"的 1.7 万个自然村落,全部被夷为废墟,总共烧毁、拆毁 380 万间房屋。而对双方反复拉锯争夺的地区,特别是根据地里,都反复烧过多次。象五指山区羊羔峪、驴儿叫一带,反复烧过 20 次左右。许多房屋的墙壁石头都烧成红褐色,粉化了。然而,日伪军还不罢手,索性连残垣断壁都给推倒,房屋的地基石也给挖掉。

为了摧毁抗日军民赖以隐蔽的山林,日军在每年冬春之际,到处纵火焚毁森林。当年热南山区地广人稀,特别是封闭几百年的"后陵风水禁区"内,尽管遭到一些破坏,仍然保留着大面积原始森林。然而经过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疯狂破坏,大面积的森林被焚毁殆尽,连一般山场的树木、植被也大部毁于战火,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成了片片焦土,京津及冀东地区的自然生态受到很大影响。"山火蔽日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鬼泣!"就是"无人区"凄惨景象的写照。

(四)抢 光、 割 光

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掠夺更是疯狂到了极点。从制造“无人区”之日起，伴随着猖狂的烧杀，就是彻底的抢掠。本来生活就极为穷苦的山民，经过日军几年连续的“扫荡”抢掠，一切生活用品早已荡然无存了。可是日军每次进山“扫荡”，依然是到处搜索抢掠，连半口破锅，一只空瓶，都要抢掠。搬不动的碾子、磨盘，也用炸药崩碎。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热河省(重点是“无人区”)被日军抢走粮食 96 亿斤，牲畜 24 万多头，其他物品难以数计。

最为根据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手段，就是日军的连年“割青扫荡”。所谓“无住禁作地带”，就是不但不许居住，而且禁止耕作。然而，根据地人民为了生存，为了战斗，就得坚持生产，日军就割毁庄稼，破坏生产。到 1943 年，随着大范围“无住禁作地带”的划定，也就更加疯狂地割毁庄稼。原来以为这种狂虐行径，不过是日军一时兽性发作，经审判日本战犯得到证实，原来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统一策划部署的。木村光明在其《坦白书·制造无人地带》一节供词中交代说，1943 年 3 月，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推测已快到春耕季节，八路军将在“无人区”开始春耕，便命令日满军警严加戒备，发动破坏春耕生产的“扫荡”。至 6 月，估计八路军已协助农民完成春耕，又命令从 7 月起，动员日伪军发起“割青扫荡”，“将春期耕种的农作物完全毁坏，使其不能再耕种。”据调查，兴隆、承德、宽城、青龙、滦平几个县，从 1942 年起，在大部地区割了一次青苗；1943 年割青面积更大，而在重点地区割了两遍；1944 年在不少地区割了三遍；1945 年 8 月，在五指

山、雾灵山根据地“割青扫荡”的日军是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才下山的。在不少地方，庄稼刚长起几寸高，就被日军割掉；季节尚早，根据地抗日军民就翻种上晚茬庄稼，刚刚长起来，又被割了二遍；时令已晚，只能种些萝卜、白菜，日军来了还是给割掉了。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彻底摧毁根据地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条件。

日军文件中所说，对抗日根据地“要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绝非过甚之词。

十、人间地狱——“人圈”

“人圈”是群众愤慨的说法，意思是猪有猪圈，羊有羊圈，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中国人也被“圈”了起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所以通常都叫“人圈”，其实正名叫“集团部落”。

建设集团部落是制造“无人区”的中心环节。前文已经讲述过，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就是通过建设集团部落实行集家并村，“把支援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夺过来，而归顺于我方”。为了要民众“归顺”，“争取民心”，日伪作了不少欺骗宣传。然而，当集家完成，群众被驱赶进了“人圈”，“归顺”了之后，却遭到了无比残暴的摧残。集团部落制造了一座座人间地狱。

（一）生　活　无　着

群众被迫集家并村驱赶进入“人圈”后，碰到的头一个大难题就是生活失去着落。整个热辽地区被集家 1.7 万个自然村，集并成 2506 个集团部落，平均约合 7 个村合并成一个部落村，而重点地区还要密集，象兴隆县 2000 多个自然村，集并成 199 座“人圈”，约 10 个村并在一个“人圈”里。人所共知，山区的特点是山高路远，地广人稀，集家并村后，一般的集家点距离原来居住的村落，相距十几里，甚至几十里，隔着几架山几条河，怎么回去耕种呢？更何况部落周围四五公里，甚至更

近距离范围以外，已被划成“无住禁作地带”，是根本不准去耕作的。而且出入部落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除去往返跑路，就没有多少时间干活了。再加上在集家“扫荡”过程中，牲畜、农具都已被抢走或毁于火海。所以，除去划定“无住禁作地带”内大面积耕地被荒废，就是在准许耕种的地域内，也荒芜了许多土地。象基本上没有划“无住禁作地带”的丰宁县，因农民无力耕种而荒芜了 11 万亩耕地；“无住禁作地带”不多的平泉县荒芜耕地 8.8 万多亩。兴隆、宽城、青龙等“无住禁作地带”多的县分里，都有近 50%的土地难以耕种。据冀热辽行署 1946 年的调查报告，热河省共荒芜了 600 万亩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集家进了“人圈”就意味着彻底破产，只能向当地地主租种一点土地来维持生计。然而，在“无人区化”政策之下，地主的土地也被荒废了许多，“人圈”周围被准许耕种的土地是很有限的，即使肯出极高的租额想要租到赖以糊口的土地也是极难的事。再加以本来就穷苦的山民在集家反复“扫荡”过程中，仅有的一点衣食财物早已被抢掠得一干二净，因之，群众进了“人圈”，生活立即陷于绝境。

（二）为自己建造地狱

1、部落的模式

对于集团部落的建筑模式，当时伪满政府有大体一致的规格，在《满洲国警察史》中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各地地形地貌虽有不同，而模式大同小异，其基本格局都如同集中营。（见靳杖子部落示意图）

“人圈”四周挖有宽宽的沟壕，围墙高约有三至五公尺不等，就地取材用砖石或土坯砌成。墙顶上是铁丝网或插满枣树

刺枝，以防攀登。墙上有垛口，内侧有“马道”，一般的可双人并行。距十几公尺设一站台，四角和大门及要街地段都建有碉堡，部落中心建有高大的瞭望台，可以监视四方控制全局。每个部落只留一个大门，多者两个，由伪军警把守。部落内设有日伪军驻地，伪警察所、村公所、组合、义仓、学校等公共设施。

可以看出，“人圈”的建设是相当浩繁的工程，特别是对被驱赶集家已经倾家荡产的群众来说，简直是无力承受的。据伪满《警察史》记载，伪满政府是拨了建设费的，可是笔者访遍长城内外“无人区”，没有一村一人见到过这笔建筑费，所有的“人圈”建设的全部用工用料都是群众承担的。

群众被逐出家园进了“人圈”，本应该先建自己的住房，好有个安身之处，然而，却一律被勒令去建造部落的防卫设备及公用设施。大部分被烧了房的群众已一无所有自不必说，即使是容许拆了旧房搬来“人圈”的，所有带来的建筑村料也都被强征去用于公用建筑。因之被集家的群众几乎全部失去建造自己住房能力。

2、如此“尊重民意”

建造“人圈”之时，就是群众被奴役的开始。可是伪满《警察史》却把建造部落描绘得尽如人意，说什么“尽可能倾听并尊重民意”，而且“进行适当说服工作”，因之部落的建设完全出于“居民的自主奋发”[①] 等等。完全是一派谎言。

让事实讲话吧！

赤城县千松台村，原来只有 30 户，日伪却硬是逼迫附近

---

① 《满洲国警察史》，伪满洲国治安部编·康德 9 年（1942 年）朝鲜印刷株式会社出版。下卷，第 380 页。

30多个村落的250多户人家并入，根本就没处安身，人们就只好住牲畜棚、菜窖、戏台等地方。一座戏台就住上了20户人家。日伪军根本不管这些，一律强迫先去修筑部落围墙。提起修围墙，群众真是遭了殃，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漏工偷懒严惩不贷。小京门村石万祥女人拉扯着3个小孩子，穷得只有一条裤衩，打着赤脚去搬石料，磨得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稍有怠慢，监工的日伪军举鞭就打。高廷甫、王英两人，当时都只有14岁，伪军赶去修围子，日军嫌他们小，就用大石头把他们压在河湾里，折磨他们取笑。

1943年，丰宁全县全面集家并村，规定从3月到6月，各村必须把房拆光搬完。到期不搬就按"反抗集家"处理。部落里新房未建，男女老少露天食宿，刮风下雨无住遮避。地方窄狭，多少家挤在一起，人畜杂居，厕所连着锅台，肮脏之极，就闹起瘟疫来。南辛营700多口人，集家不久就病死130多人。就是这样，日伪军还是不让群众盖房安身，依然强迫群众先去修筑部落围墙。监工个个凶神恶煞一般，看谁不顺眼就毒打一顿。南辛营村周成山被派出车去南岗子，走的慢了点，被监工一步一棍子打着走，裤子被打烂，鲜血直流。在西两间房村监工的伪警察，嫌群众干活慢，经常让群众对面跪成两排互相打嘴巴。塔前村的车辆全部被征用昼夜不停拉石料，慢一点就打，牛瘦得成了骨头架子，最后全村大牛几乎都累死了。波罗诺村农民被逼从大年初一就拉石头修"人圈"，一直干到五月节，连地也不让种，都荒芜了。折磨死很多人。天桥红旗营村佟九洲家9口人，集家时就死了6口。很多人被逼无奈逃亡异乡。有的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这里要说明的是，赤城县和丰宁县大部地区并没有八路

军游击队活动，集家过程群众没有什么反抗就“归顺”了，然而老百姓却遭到如此之蹂躏，被驱出家园而挣扎在死亡线上。

（三）非人的居住环境

1、所谓的“自卫防护”

《满洲国警察史》中对建设集团部落作结论性的评价说：

“作为部落的防护及农村的共荣社会，可以认为，合理的部落建设，几乎是无可非议的。”①

日本侵略者搞集团部落建设，主要着眼点就在于“确立治安的自卫体制”，建设“人圈”之初，就将18岁至50岁或16岁至60岁的男人，编入“义勇奉公队”(即自卫团)，有不少地方青壮妇女也被编入自卫团，进行军事训练，群众为此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赤城县党史研究室写的《黑河川“无人区”》一文中，对“人圈”中的所谓军训有一段调查记述：

> “集家后又搞军事训练，动作稍有差错即招来大祸。小京门村刘万中、王文月，由于看齐动作稍差一点，被按倒地上用枪托打得屙了一裤子屎。西万口村韩万礼，在军训中腿被打断，落了终身残废。西万口村自卫团在深秋一次训练中，将队伍喊进冰凉刺骨的黑河里，到了河心，又喊卧倒，都必须趴在水里，一个青年抬头换气，被打得死去活来。又有三个青年被查漏了岗，日军就叫他们三个跪着共同顶一张桌子，一人一条腿，还得顶平，一歪就打，整整跪了一柱香。跪完了又叫脱光衣服，用皮带猛抽，直打

① 《满洲国警察史》下卷，第382页。

得浑身青紫，鲜血淋漓。……特别是还要搞紧急集合，只要钟鼓或哨声一响，不论干啥活马上放下去集合，不得迟缓一步。日伪军随心所欲地搞紧急集合，想什么时间搞，就什么时间集合。日伪军吃不上好的不高兴了，就搞紧急集合；喝醉了酒，也搞紧急集合；为了抢东西，就搞紧急集合；为了搞女人，也搞紧急集合。”

这段描述是典型的“人圈”中的“防卫措施”写照。各部落中都是这样，白天忙着搞这类捉弄人的所谓“军事训练”，到了夜间，都得轮流去站岗，稍有动静，就鸣锣吹号，群众闻讯就得立即跑上围墙去警戒，呐喊呼叫。部落门卫极严，早晨总是太阳升得老高，看着确实“平安无事”，才开门放人出去耕作；傍晚太阳还没下山就得回部落，部落里就戒严了。稍有风吹草动，就几天不开大门。可是，在“人圈”内一般人家却必须“门户开放”，勒令“夜不闭户”，以便日伪军警特务们横行无阻地奸淫抢掠。

2、**家家陈户**

“人圈”里是划定范围由各户自建住房的，可是已经一贫如洗的老百姓，连糊口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又哪有能力建房，多半是搭个马架子窝棚。不少人家从被赶“人圈”直到日本投降，几经寒暑，还是住着破烂窝棚。冬天，塞外的暴风雪袭来，满屋飞雪，冰冷彻骨。仅兴隆县统计，几年中冻死群众 1000 多人。到了夏季，屋里、院里、街上一个样，遍地是泥泞、污水、垃圾、粪便，臭味熏天，毒气弥漫。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等恣肆繁殖。如前所述，从 1940 年兴隆县羊羔峪集家点上闹瘟疫起，瘟神就降到“无人区”的每座“人圈”，伤寒、霍乱、疟疾、痢疾、鼠疫等可怕的传染病就连年广泛流行起来。还有一种可

怕的血液病，得了病的人鼻口喷血，流行很广，死亡率极高。瘟疫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据各地不完全的统计，赤城县千松台“人圈”，共有280户，有63户死绝，千松台、石片沟、张家营3个村，死于瘟疫病的都占总人口的1/4，因无法生活而逃亡的占1/5，人口减了一半；平泉县127个部落村，共7万多口人，死于瘟疫的1万多人。其中柳溪乡11个部落，5300人，病死2100多人；建昌县集家并村后计，共死于瘟疫7700多人；兴隆县在1943年夏季一次瘟疫大流行中，就死了6000多口人；大水泉部落，一次流行鼠疫死了300多人；隆化县在瘟疫流行中，不少村死去一半人口，象黄土梁子部落，共410口人，死于瘟疫220多口。集家并村后，在“人圈”里的瘟疫年年流行，人人病倒，家家陈尸，户户号啕，死了人都抬不出去，尸体就臭在屋里。

年年瘟疫流行，日本侵略者不闻不问，而他们自己却千方百计地防疫，他们的住处与群众隔绝，而且经常消毒，并按时注射防疫苗，还垄断了有防疫作用的犀牛角、羚羊角以及广角等中药，供他们服用。

对集团部落中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活环境，《满洲国警察史》中居然描绘成“沐浴真正王道乐土的慈光”，“王道慈光普照大地”，真是绝妙的讽刺。

（四）敲骨吸髓的经济盘剥

日本侵略者对“人圈”里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诗人厂民在其《人圈》一文中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给”。

1、什么都要

“人圈”里施行的是伪满洲国谷物统制的“出荷”及“组合配给制”。每年年初就订下每亩地“谷物出荷”的数目，不论旱涝虫灾，不论撂荒与否，秋季必须如数缴纳。可是集家并村后，农民被集中到不足原来四分之一的耕地上，且加以生产能力急剧下降，所以根本交不足“出荷”限额。另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据统计，当时“人圈”中各种捐税及强征摊派项目多达 26 种：

“谷物出荷”，每亩 1 斗(15 公斤)。

“民生集谷”，每亩 1 斗。

“义仓粮”，每亩 1 升。

“地亩捐粮”，每亩 2 升。

“地亩附加粮”，每亩 1 升。

“民生税”，每亩 2 角 4 分。

“地亩税”，每亩 5 角。

“地亩附加税”，每亩 2 角 5 分。

“门牌税”，每户 1 元。

“协和会捐”，每个成年人 2 元。

“牲畜捐”，驴每头 4 元，羊每只 7 角 5 分，牛马骡每头 5 元。

“出生捐、死亡捐”，各每人 2 角。

“宰杀捐”，猪每口 4 元，羊每只 2 元。

“材料费”，每亩 2 角。

“兴农合作社股金”，每户 1 元。

“义款”，每户 6 角。

再有，就是日伪军警宪特的敲榨勒索，更是巧立名目，种类繁多，如：

“送草”，每甲3天10次，每次50至100斤。

“送柴”，每甲3天1次，每次500斤。

“送猪”，每甲每月3至10口，每口猪至少净肉80斤。

“送鸡”，每甲每月5至12只。

“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讨伐队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30元。

“团员费”，每甲经常派两名自卫团员到村公所服役，月需150元至200元。

“棍团费”，每甲每月抽10人受训，需100元。

“劳工费”，每甲每月抽10人至300人不等，名曰“勤劳奉仕”，月需200元。

“村甲职员费”，每人月需100元至150元。

除此以外，还要献纳铜铁、皮毛，以至蛋菜、杏仁、核桃等干鲜果品，无一不在搜括之列。

作家方纪在其《血泪凝成的数字》一文中，列举了许多调查数据，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的暴行。如丰宁县王家营子部落，不足9000人，除粮食几乎全部被征光外，每年要献储金30万元，门户捐20万元，猪800口，羊300只，牛400头。大牲畜每年被征用219天；每年约出500个劳力无偿劳动6个月。

2、**什么都不给**

百姓劳动所获被全部搜刮干净，就只能靠配给物资过活。据兴隆县调查，按当时规定，每年每户布10尺或7.5尺，每人每年面粉1.5斤，盐每月7.5两，每户每月火柴1盒，每人每年油4两。此外，还有碱、糖、大米之类。然而，这不足挂齿的配给品仍然是名义上的，有的根本不给，有的给了，被伪官吏

们层层扒皮，群众得到的微乎其微了。

大米、面粉之类东西老百姓见都见不到，就是粗粮配给的也很少，群众吃的是一种叫作“共合面”的东西，是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粮食混合磨制成的，又臭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群众私藏一点粮食被搜出来，就要当成“经济犯”治罪。兴隆县六道河子“人圈”中一个人闹了病，弄了点米熬粥吃了，不料在街上呕吐出来，被警察见了有米粒，就被抓了起来，受尽折磨。隆化县老局子村李有生一家 5 口人，3 个孩子相继冻饿而死，最后李有生也饿倒了，邻居送来半升小米，他抓起一把生米就噙在嘴里，还没嚼烂咽下就断了气。

百姓穿的就更到了使人难堪的地步，按规定配给的布很少兑现，最多时每人三四尺，不少地方多少年一尺也没给过。而且配给到群众手里的布料，都是质地极为低劣的人工纤维，或是用旧布烂棉絮重新纺织成的再生布，下水一揉搓就烂了，群众称之为“唾沫缎”或“还魂布”。男人外出或下田劳动，有一条破裤子就是好的了，不少人只是身前挂一条破布或围一片麻袋。有的人一年到头穿着一件兽皮筒，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下田干活还舍不得穿，就脱在地头上，光着身子劳动。女人、儿童更为窘迫，冬天里孩子们就钻在已成败絮的破被里取暖；女人们不论老少，就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是常年打光身。没奈何，就在屋里挖一个洞，来了人就藏进洞里，顶着锅盖或树枝遮蔽身体，名叫“遮羞坑”。诗人厂民在《人圈》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子弟兵进入了滦平县黄土梁子“人圈”，几个战士到一家去找水喝，进了院一问话，屋里女人惊慌喊叫：“同志，不要进来！”原来屋里有年轻的姑嫂二人，一个赤身裸体，一个只穿着一条破洞百孔的破裤子，出不得门，见不

得人。战士们含着热泪脱下自己贴身的衣裳扔进屋去，姑嫂二人才腼腆地出来招呼子弟兵。象这样凄惨的景象，笔者在“无人区”里活动时，是屡见不鲜的。

3、奇特的大拍卖

不必说一般百姓早已被榨干了汁水，就是富户绅商也纷纷败落了。记者仓夷在其《热河的血泪》一文中记述了一段奇闻：

> “一些富有人家，留着明堂瓦舍不敢住，只住破室烂屋，避免敌人的注意。但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敌人把火车路卖给了有钱的地主；把赤峰大桥卖给了地主。承德市的日寇忠魂塔也卖给了商家（索价170万元）。伪警察署、县公署、兵营、学校一切公物，都拍卖给热河老百姓。老百姓不得拒绝，有的是有钱的人出钱，有的是大家公摊。日寇简直想尽一切办法来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奇怪的是，买主只掏钱而得不到实物，既得不到产权，也没有使用权，白白被敲诈了一大笔钱。这种公产大拍卖，实在是掠夺史的奇闻。

（五）杀人不见血的毒化政策

毒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的一个罪恶手段。日本政论家铃木三郎曾经这样说过：在中国第一是日本的私娼，第二是吗啡密卖商，第三是打着大日本旗向中国内地进攻。而满洲则是日本制毒、贩毒的重要基地。据《中国烟祸年鉴》记载：关东州为吗啡贸易之枢纽，日本人曾设厂旅顺制造吗啡，每年出品70万磅。在伪满洲国统治期间，正式公布《鸦片管理法》，使种毒、制毒、运毒、卖毒以及吸毒完全合法

化。在伪满洲国各级政府机构中设有“禁烟局”，实为种烟局的机构，在各县伪政府中，原在总务科下设“烟政股”，后来升格为“烟政科”；在经济体制中，设有“鸦片组合”，专门经营毒品。

从鸦片战争以后，鸦片逐渐在中国泛滥成灾，在旧中国军阀统治下的热河省种植鸦片已相当盛行，当日本入侵后，则把热河作为鸦片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疯狂扩大种植面积。据1938年编写的《围场县一般状况》一书记载：围场县共有耕地约160万亩，1932年种植鸦片5万亩，而从1933年日本侵占围场到1937年的5年时期里，鸦片种植面积猛增至13万亩。据干部群众反映，以后几年中还是逐年增加的，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几乎所有好一点的耕地，甚至宅旁院内都种上了鸦片。伪政府不但限定种植面积，而且限定产量，规定每亩产13至16两烟干。即使在上好的土地上种植鸦片，也难以达到限定的产量，可是交不足“鸦片出荷”，不但不配给粮食和生活物品，还要遭到非刑拷打，甚至坐牢发配劳工。在大规模制造“无人区”以后，土地大面积荒芜，群众连糊口的粮食都难得种植，却仍然强令大面积种植鸦片。据伪热河省政府民生厅长李葆华供认，1943年前，全省每年强征鸦片400万两，1944年，针对热河百姓生活中最难堪的没有衣穿的窘境，采取以布匹配给按亩强征的办法，鸦片征收量增加到600万两，据调查实际上达1000万两。

在日伪“组合配给”的经济统治下，一切物资都困乏到了极点，然而，唯有鸦片的供应是充裕的；在日伪的高压政治统治下，群众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独有吸毒不受限制。据围场县调查，当时全县人口约24万，而吸毒的人达5.5万之多。一般妇女吸毒者较少，儿童吸毒者更少，在成年男子中吸毒者却约

占百分之五六十。吸毒需要一套烟具，太麻烦，也不解瘾，“瘾君子”们大都改为扎毒针，扎得浑身结成大大小小的黑疙瘩，弄得遍体烂疮，扎到无处下针的时候，也就毒死了。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杀人不见血的屠刀之下。这种毒品泛滥给当时的抗日斗争造成许多不利，物色干部、动员参军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找到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可以，可是你同他刚谈上几句话，他便在那里打哈欠流眼泪犯了瘾，十分败兴。解放初，热河省的救灾、灭病、禁烟是最严重的三大社会问题，下大力抓了几年才得到解决，消除了后患。

（六）残暴的政治高压统治

1、所谓的大“检举”

在“人圈”中，实施的完全是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体制。行政上设村长、甲长、牌长（相当华北地区的伪大乡长、保长、甲长）。一般的一个部落一个甲，十几个部落结成一个村。另外，部落中还设有“部落长”，专门管理“自卫团”等事项。警察机构是突出加强的，重镇设警察署，村公所所在地设警察分驻所，部落中还设有若干名部落警察、经济警察，“国境”地带还设有“海关”警察。各个部落中都建立“义勇奉公队”（即自卫团），设团长 1 人（多由部落长兼任），团员则囊括全部青壮年男人。自卫团内分设谍报组、联络组、搜查组、检举组等等，除负责日常的部落防卫外，还要被强征跟随日伪军外出“讨伐”，带道，当背伕，踹地雷，割庄稼等等，平时则经常被强征去修筑道路及各种工程。部落中普遍建有伪协和会，村设分部，甲设班，从事反动宣传，调查民情等，名义上是群众性团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特务机构，高级人员大都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在长城沿线

和抗日根据地周围，除重要城镇设立军事据点外，一些大的部落，普遍建成“武装防卫集团部落”，建立武装自卫队，配有火枪之类武器，在各个部落之间，以警备路结网，建立有严密的联防及互相搜查、检举等规定。

尽管“人圈”外有高墙、碉堡，内有严酷的统治制度，然而，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靠这些手段是隔不断共产党同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的。至于所谓的“收揽民心”的种种“思想对策”，更是痴人说梦。要彻底切断党同人民的关系，真正实现“民匪分离”的阴谋目的，必须从根本上切断共产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就是彻底破坏“党的细胞组织”，破坏“共产党的手足及视觉、听觉”，“才能破坏其致命点”[①]。所以，如前所述，从1942年大规模集家并村之时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搞大“检举”，而到1943年全面制造“无人区”以后，在所有已建成的“人圈”里，更加频繁地搞大“检举”，搜捕基层党员干部，破坏基层抗日组织，血腥镇压人民群众，以强化部落中的反动统治。

日伪在初期搞大“检举”时，总还要立些罪名，如“匪团组织大检举”、“通匪家族大检举”等等。对被“检举”的人，也要加上一些罪名，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密输犯”以及“通匪”、“济匪”、“资匪”等等。搜出几张信纸、几个信封，就可被视为“通匪”；读“四书”、“五经”，就可被视为“思想犯”。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明明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却不准说“我是中国人”，得说是“满洲国人”，一句说错，就会被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按“国事犯”治以重罪。

---

① 1943年10月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灭共对策资料》。

这种血腥的大“检举”，是伴随着全面集家普遍建设部落同步实行的。据承德日本宪兵中尉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交代，1943年全面集家开始后，于1月中旬，经承德日本宪兵队长安藤次郎和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共同策划一个在热河省全省范围进行全面大“检举”的计划，名曰“二·一工作计划”。“检举”的办法已不是有目标地搜捕党员干部或嫌疑者，也不讲什么原因和罪名，而是将实行“检举”村庄的村民中凡年满18岁至60岁的男子全部逮捕，由木村光明等头目提供搜捕名单，逐个“剔抉”党员干部及骨干分子。宪兵曹长太田秀清交代说，在他参与的多次“检举”中，得到的命令都是对18岁至60岁或20岁至50岁左右的男子一网打尽的。据兴隆县调查，就在“二·一工作计划“的全面大检举中，全县被捕群众达5000多人，半壁山伪警察署辖境内就捕去2000多人。其实日伪也不仅是抓捕男子，也成批地抓捕青年妇女，有的被日伪军奸污霸占，有的被运往东北，其命运更为悲惨。木村光明驻在承德期间，就长期霸占着一个“扫荡”中被抓来的女教师。

2、所谓的“特别治安庭”

对被“检举”的百姓，名义上也经过审讯、定罪、判刑等法律手续。为了适应“西南地区特别肃正”的需要，从1942年制造“无人区”进入高潮阶段，就在热河省设立了14个“特别治安庭”。早在1938年伪满政府编写的《司法部现势》一书中就明文规定，“特别治安庭”是个临时随军机构，跟随日伪军到各处“扫荡”，可以随时开庭，而且实行“第一审主义”，一审即终审，就地宣判就地处决。这些所谓的“执法者”，对日伪军在“扫荡”中的滥捕滥杀是决不干预的，而恰恰相反，它的实际作用，就是就地监视伪军伪职人员，怕他们徇私或手软。当然，实际

上有无罪名并不重要，兴隆县半壁山警察署在辖境内执行“二·一工作计划”的大“检举”时，就有“特别治安庭”参加。抓捕了2000多人，就地屠杀400多。大莫峪村42户，捕了73人，当场被杀72人，有8户男女老少被杀绝，成了“寡妇村”，就是“特别治安庭”现场“执法”的结果。不仅在军事“扫荡”中可以恣意屠杀中国人，就是那些被所谓“依法”判刑收了监的犯人，依然可以肆意戮杀。据平泉日本宪兵队军曹植松楢数供认，1942年4月15日，他奉命对新兵进行“胆量试验”(也叫“胆量教练”，在日军中普遍进行)，他就带着6个新兵到承德监狱随意提出7个中国人，当作“胆量教练”的靶子，被他和6个新兵每人一个屠杀了。

3、杀人魔窟

在频繁的“检举”搜捕中，被抓到的群众都要遭到严刑审讯，反复折磨，当场屠杀一批，释放一部分，余下的大部分特别是青壮年男子，都被关进各县设的“置留场”，再审讯逼供，过一遍筛子，又送到承德或锦州监狱，再一遍一遍地过筛子，反复酷刑拷问。每过一遍筛子，就要有一批人被屠杀或死于酷刑之下。

日伪在各地的“置留场”和监狱，就是残害中国人的一座座魔窟，而以承德监狱最为集中也最残酷。在那里面，象灌凉水、压杠子，已是一般化的刑罚了，什么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剥神经等酷刑就有10多种。1945年间，搞过一次电刑试验，杀害300多人。监狱中专门制造了一部杀人机器，人上去了，翻板一翻，人被翻下去就被绞死了。原来一次绞死1个人，不够用，又加以改进，一次可以绞死4个人。承德市游览名胜皇帝离宫的西墙外的水泉沟，就是日本法西斯集中

屠杀人的“万人坑”，累计有3万多中国人被屠杀在那里。当年的水泉沟凄惨无比，天空乌鸦如云，啄食人肉，衔着人肠子满天飞；山坡上野狗成群，扒吃尸体，都吃红了眼，叼着人头、肢体跑到街上。到了晚上，狼群又来了，满山遍野鬼哭狼嚎，简直是魍魉世界。群众谁也不敢接近那里，日伪军警去那里杀人或埋尸时，也得先鸣枪驱散狗群，不然疯狂的狗群就敢追逐活人。

作家方纪在其《血泪凝成的数学》一文中记述说：“当我‘拜访’了敌人在承德的屠场水泉沟的时候，我相信上面的数字是远远低于敌人的残忍的！在那里铺满了厚厚的一层白骨，接连无隙的坟丘，和用镐子挖不下去的遍布尸骨的土。”这是1946年的情景，四十多年以后，笔者也曾“拜访”过水泉沟这个“万人坑”，那里仍保留着几十座坟丘，是承德解放后人民政府历年动员群众收敛掩埋起来的骸骨。一座无字碑大坟丘里，就掩埋着7000多颗骷髅。几十年过去了，每场大雨冲刷过后，山坡上仍然露出遍地的骨殖。兴隆县南土门，也是当年日军一个屠杀场，现在仍残留着100多座（当年200多座）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民的“肉丘坟”。其中最大一座就是1942年大灭窑惨案留下的，埋着160人的尸骨。

4、劳工的可悲命运

日本侵略者对大“检举”中撒大网抓捕到的青壮年男子，经过层层过筛子，屠杀的屠杀，判刑的判刑，最后对那些实在找不到“罪证”借口的人，也不放过，绝大部分被送往东北各地或日本劳工集中营去服苦役，结果大部分被虐杀于苦役之中，鲜有生还者。据伪热河省民生厅长李葆华供认，到1944年累计，从热河省抓走劳工13万。据调查，到1945年日本投降止，

共从热河省抓走劳工 15 万人。据滦平县统计，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抓走劳工 5.4 万人，抗战胜利后，只有 20%回到了家乡，80%下落不明。

大批劳工除陆续被虐杀于苦役之中外，更有被集体屠杀者。

1956 年，战犯、前日军中将藤田茂获释回日本，临行时，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的古海忠之托他带给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一封信。① 当藤田茂回到日本向岸信介递交这封信时，岸信介拒不接见。1960 年 1 月 1 日，藤田茂遂将这封信公开发表在日本《アカハタ》第 3132 号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岸信介在伪满期间，为了给日本移民抢占土地和国境上制造'无人区'，而使数十万农民流离失所。为了修筑兴安岭工事，大批抓劳工，工程一完，为了保密，竟将 5000 余劳工杀人灭口。……岸信介，你对这些罪行不感觉痛心吗？"

这封信只揭了兴安岭一处的集体屠杀劳工事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修筑了大量军事工程，那些劳工的命运如何，还是个谜。

通常都认为，日本侵略者大抓劳工是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经查阅有关日本历史档案资料，才发现日本大抓劳工也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毒辣措施。1943 年 8 月 11 日出笼的承德日本宪兵本部的《灭共对策资料第一四号・冀东地区中共党的概观》文件中说得明白：

"将乡村青年逮捕送满洲一事，是否以破坏乡村的

① 在伪满期间岸信介曾任产业部长、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与他共事，任伪满政府总务厅主任处长。

党、政、民兵各组织为直接目的，先当别论，而使党失去工作对象则是最大的打击。”

“党工作的对象即民众，其中尤其是青年层，他们同时又是扩军对象、生产的源泉。”

“拨赤区青年入满洲当苦工，使之离开乡村，切断他们与党军的联系性的方策，作为剿共工作是极其有效的。通过此举，使党失去工作对象，阻碍党的发展，降低赤区生产，薄其经济力量，断绝扩军的源泉，进一步破坏乡村组织，动摇党的立足点。”

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机会参与欧美帝国主义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然而，其具有明确政治、军事目的的大抓劳工，以及对待劳工那种残酷至极的超经济剥削，比之欧美帝国主义之虐待黑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为残忍的是，将中国人送往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供细菌武器试验之用。据《承宪高第三九九号》文件记载：“西南国境地区前半年(自昭和 17 年〈1942 年〉1 月 1 日至 6 月末)肃正工作中宪兵服务成果，半年中实行一齐检举 154 次，共逮捕 1293 人，其中送石井部队 4 名。”又据长岛玉次郎等人在检举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实际最高统治者)武部六藏的材料中交代，自 1940 年至 1945 年间，一、共逮捕 11195 人；二、交战杀害共计 1384 人；三、送石井部队 12 人。

据《热河抗战简史》记载：日本侵略者在热河地区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共屠杀、虐杀 10 万多人。这是当年估计数字，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的。如前所述，日本侵略者先后共从热河省抓走劳工就是 15 万之多，按比较可靠的统计，80%死于苦役、虐杀或被集体屠杀。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除以上种种暴行外，使热河地区人口锐减，请看几个“无人区”重点地区的情况。

青龙县，1934 年统计，总人口 28 万，到 1945 年下降到 25 万；

滦平县，1933 年统计，总人口 24 万，到 1945 年下降到 21 万；

兴隆县，1933 年统计，总人口 15 万，按旧中国正常人口增殖率，到 1945 年 12 年半期间内，起码应增殖到 20 万左右，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过程的疯狂摧残，全县在根据地被屠杀的 1.4 万人，在“人圈”中遭杀害的 2 万人；死于瘟疫和冻饿的 1 万余人，再加以生活极度困难与战乱不稳等因素，绝大多数妇女丧失了生育能力，到抗战胜利时，人口已不足 10 万了。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十一、事实的驳诘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行径，实质上是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以"攻伐"民众为主要目标的特殊战争。这是世界战争史中罕见的重大战争犯罪，必须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如同其它许多历史事件一样，对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同样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所以，这里把不同的历史证据及评价摆出来，以澄清历史面貌。

（一）历 史 上 的 争 议

1、美国T·A·皮松氏的揭露

1937年间，日本关东军正在伪满间岛等地大搞集团部落建设，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以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美国T·A·皮松在《亚美利下》杂志3月号上发表的《申请鲇川设定》文中"满洲国集团部落论"一节中指出：

"集团部落的建设，是为了分离民匪，日本当局强制做的工作。这使全国（指伪满洲国）人口十分之一即500万农民，被迫烧毁家园，于指定的集团部落重建家业，对此付出何等的代价，他们要出人力并负担墙壁用的材料费，负担过重的课税及国防捐款等等，要负担所有这些强

制性的义务。"[1]

据《满洲国警察史》的记载，皮松氏还说，"强迫国民固定于一处，极言之，恰如关在监狱铁门内被剥夺自由的囚犯。"

T·A·皮松氏是何许人，尚且不知，然而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出，1937年间，国际上已有人在抨击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但当时日本人竭力掩盖事实真象，外人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皮松氏对集团部落的揭露与指责是很皮毛的。但这是目前见到的历史上最早的揭露。

2、**反驳书**

即使是皮松氏这样肤浅的指责，亦为跋扈一时的日本侵略者所不容，立即写出《反驳书》[2]，发表在伪满铁弘报课的刊物上。摘录如下：

"要论述满洲国的集团部落，首先必须研究建设集团部落的根本原因，才能认识其必要性。也就是说，必须弄清集团部落的建设是出于何种原因，为了达到何种目的。这是为了使多年来饱受匪害之苦的僻地居民，在萎缩疲惫的困境中重新获得新生。使该地居民得到警察的安全保护，沐浴真正王道乐土的慈光，是为了振兴民力，使居民在王道治理下安居乐业，使他们尽快的摆脱匪团势力。……为了国内治安的安全、整顿，使国民一个不剩地过安居乐业的生活。适应军警的讨伐，将僻地散在居民经常受匪袭威胁的地域集团化，并配置了强力的防备设施和适当的警备力量。为了断绝匪团必要的粮食补给之路，必须

---

① 《满洲国警察史》下卷，第384页至第385页。

② 同上，第385页。

使匪团与居民分离。匪民分离，其一可以使居民从匪害中摆脱出来；其二、居民可以过有集团秩序的团体生活，进一步结成合理的农村共荣社会，因此，建设集团部落。……可以确信，全体农民实现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已为期不远。"

文中又分别列举了四个方面建设集团部落的"意义"，都是些"农民真正面临了一种划时代的变化""在王道施政下愉快的生活"等等，不一而足，说得天花乱坠，集团部落简直成了天堂。然而，《反驳书》中，没能举出任何一村一户一时一事的事实作论证的依据，全部是空话，也就是一文不值的谎话。

出版于1942年间的《满洲国警察史》作如此的记载，固然荒唐，但也是必然的。而出版于战后昭和43年(1968年)的《满洲国警察小史》[①] 对伪满各地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的情况，依然不作真实记载，只是就《满洲国警察史》的叙述略加减缩，虽然没有《满洲国警察史》那样的溢美之词，但依然根本回避了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军的犯罪行为，而且说："断绝了抗日武装集团的粮道，同时给予当地农民生活的环境与条件以保障，可以认为是警察的本来业务。……所有这些都是治安当局基本的考虑方法，可以认为是真意"。说的很转弯抹角，但其"真意"仍然是在为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开脱罪责。不仅如此，在《小史》"热河一心队"一章中，又大肆美化指挥"热河一心队"制造"无人区"的首恶岸谷隆一郎和皆川富之亟，说他们可卑的死"可以看作为流血牺牲

---

① 加藤丰隆著，(日)满蒙同胞援护会为财团法人出版。

于中国东北的热血青年唱的挽歌。”①

这不仅是对制造“无人区”罪行的掩盖与美化，也不仅仅是对制造“无人区”犯罪分子的讴歌，而是从根本上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这是可卑的，这是对中国人感情的伤害。这样的历史著作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是有害的。

（二）让史实讲话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公正，因为历史尊重史实，那么，还是让史实讲话吧！

1、战犯供词

木村光明　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间，正是热辽地区制造“无人区”高潮期间，他任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大尉特高课长，官阶不高，但握有实权，诸多在热河地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都是他参与策划和指挥的。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厅的《侦讯木村光明的总结意见书》中对其参与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作了如下认定：

> “该犯自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曾先后指挥所属部下在我热河省承德县、青龙县、滦平县及河北省密云县、迁安县等地各村镇，逮捕我抗日干部及和平居民2882名（滦平地区没有统计在内）。对这些人采取了各种法西斯兽行进行审讯，使用了殴打、悬吊、灌凉水、灌汽油、过电、火烧等酷刑。经过拷问而杀死1100余名，又被

① “热河一心部队”，是由东北调入热河、冀东专门制造“无人区”的10个省属伪满警察讨伐大队组成的，岸谷隆一郎和皆川富之亟是伪“一心队”的指挥者。1945年8月19日，日本投降时，岸谷隆一郎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在承德市自杀；8月22日，皆川富之亟在遵化县城被伪“一心队”杀死。

监禁致死 48 名。其中被喜峰口宪兵分队一次杀死在宽城的就有 80 名；被承德宪兵分队一次杀死在承德西郊水泉沟的就有 100 余名。更残忍的是青龙县九虎岭村赵相阁，被捕时当场被日寇将双眼和心挖出而死。”

木村光明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在《侦讯书》后边签名认定：

“以上综合意见书，已经翻译用日语念给我听了。这里所载之事实，是我在侵略中国的期间所犯的罪行。这是我在被讯问时亲自供述过的，并且对此的一切证据我直接看过，或经翻译用日语念给我听了。我确认这些罪行都是事实。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国人民认罪。我在意见书的每一页上签名。”

应该指出，《侦讯书》所列举的木村光明的罪行，仅仅是承德日本宪兵队在热河制造“无人区”罪行的一小部分，从《侦讯书》所列举的地区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对整个“无人区”全面调查的结果，不仅“滦平地区没有统计在内”，而制造“无人区”的另外几个重点县，如兴隆、平泉、宁城、隆化、丰宁等地都根本没作过调查。查阅木村光明的案卷，当时调查的是宽城县和承德县，但也不是全面的，只是九虎岭等局部地区。另外，因系法庭立案，所立案的罪行必须限定是受木村光明直接指挥的日本宪兵队所作所为，而不是日伪各系统的全部罪行，所以，与实际总数据相差悬殊。比如，据宽城县党史研究室多年调查累计，在整个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军在宽城县共逮捕 21750 人，遭屠杀的 13400 人。

原弘志　伪满铁道警护军少将参谋长，1943 年 7 月至 1945 年 3 月间，任锦州铁道警护本队长期间，以“西南防卫委

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策划全面制造"无人区"的"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会议"，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西南地区特别肃正要纲》，拟订了《铁道警护总队西南地区肃正工作要纲》，并指挥其所部协助热河、锦州地区日本守备队及宪警部队推行全面制造"无人区"的《特别肃正》计划。据原弘志供认：

"从 1943 年 7 月起至 1945 年 3 月止，我任锦州本队长期间，我命部下在锦州及热河地区，逮捕中国抗日武装人员、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总共有 9100 余人。内有抗日武装人员及抗日地下工作人员 340 名，送锦州高等检察厅及其分厅的 200 名，其中 30 名判处 10 年以上重刑。对被捕的和平居民，送致各地检察厅处理的有 2500 名，引渡给地方警察当局处理的 3000 名。审讯时，警护队严刑拷打，因而有病的、受伤的及因伤病致死的。"

由于伪铁道警护队主要负责保护铁路线，而不是在大的地域面上活动，所以，可以认为原弘志所供认的这个数字是接近于事实的。然而，其《铁道警护总队西南地区肃正要纲》是从 1941 年 10 月下达实施的，而原弘志供认的只是 1943 年 7 月至 1945 年 3 月他任锦州本队长期间的情况，就是说还差近两年的情况没有包括在内。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这个只对"特别肃正"全面制造"无人区"行动起配合作用的铁道警护队在铁道线上，在不到两年的时期里，就逮捕了 9100 多中国人。

田井九二郎　1943 年至 1944 年 4 月间，曾任热河省伪警务厅直辖侦搜队(亦称"特搜队")队长，据他供称：在他任侦搜队长期间，率领侦搜队 50 多人，活动在平泉、青龙、凌源等地，共逮捕抗日干部及和平居民 600 多人。与此同时，指挥各县、旗侦搜班，逮捕干部群众 400 人。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侦搜队，在不到1年的短短时期里，就逮捕中国人1000多名。那么，在整个热辽地区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集中了10万日伪军警宪特，反动机构形形色色，对中国老百姓都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该有多少中国人遭逮捕、屠杀，是可以推想而知的。

2、**历史档案**

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时，为了掩盖历史的罪责，曾大批销毁档案，在热河省政府院内足足烧了五六天，涉及到战争犯罪的档案资料，几乎焚毁殆尽。所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争犯罪行为难以找到历史文件作证据，这也就成了某些人否认侵略罪行的口实。可是，已经铸成的历史，到底要留下蛛丝马迹的。多年来，各地档案、党史及各有关方面，经过多方面搜集，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些是日军在热河地区制造“无人区”期间的“讨伐”“检举”等犯罪记录，这里摘录几份，以窥一斑。

1941年2件：

(1)《承宪高第三九号·思想对策月报》记载：自昭和16年(1941年)7月至12月，讨伐324次，杀死八路军1405名，伤197名，俘179名。

又：自7月至12月，施行“一齐检举”73次共逮捕1942人。其中有14次大逮捕，共逮捕1099人。

两项合计，半年中杀、捕、伤、俘抗日军民3723人。

(2)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月报》第五一号记载：

锦州高检自康德8年(1941年)1月至同年11月，共处理“思想犯罪”988件，1169人。其中不予起诉的仅87人。

1942年1件：

《承宪高第三九九号·思想对策月报》记载:昭和17年(1942年)前半期(自1月1日至6月末),西南国境肃正中宪兵服务成果:检举次数154,检举人数1293人。

1943年4件:

(1)《热警特秘第五一号十——四六》记载:康德10年(1943年)1月至6月份,"侦谍班成果"累计:

逮捕抗日人员1764名;

一般刑事犯 315名;

总计,2079名。

(2)《热警特秘第五一号十——七三》记载:康德10年(1943年)九十月份统计累计:

射杀抗日人员64名;

逮捕抗日人员1535名;

诱扣抗日人员197名;

总计,1796名。

(3)《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四》记载:康德10年(1943年)9月中旬至下旬,在青龙、承德、兴隆、平泉等地实行"第一次剔抉"工作,共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958名。(见日文原件)

又:《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七》记载:康德10年(1943年)10月6日至19日,施行"第二次剔抉"工作,在兴隆、青龙、承德等地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292名。

两次短期的、局部的"剔抉"共逮捕1250人。

(4)《热警特秘第二九号四——一》记载:康德10年(1943年)7月10日,在喀喇沁右旗(现平泉、宁城)逮捕地下组织人员刘振德以下153名。

上述历史资料，是从销毁档案的余烬中摘录的几份，仅仅是1941年至1943年间限于警宪系统的个别的、短期的、局部的事例。显然是挂一漏万，然而，透过这些记录在案的事例，也足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军制造“无人区”的全局的全过程的面貌该是什么样的一番情景。

战争已经结束将近半个世纪了，怎样透过这些数目字来认识“无人区”这一历史现象呢?仍然是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些数目字的历史分量，这是用中国人民鲜血写下的一页历史，它是活生生的血泪斑斑的史实。透过这些数字，我们仍然可以依稀见到当年的一片刀光血影。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制造“无人区”这一场以“攻伐”民众为目的的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怎样地屠杀中国人民，在监狱集中营里集中杀；在大“检举”中挨门挨户杀；在“讨伐”、“扫荡”中满山遍野杀。长城内外，滦河上下，鲜血流淌，尸骨堆山。

作家方纪在其《血泪凝成的数字》一文中痛切地说：

“在这些简单的数字里，包含着多少悲惨的事实，多少人民的血和眼泪，多少个家庭，多少个生命，多少资财的损失被列进这简单的数字里了！这是热河人民血泪凝成的数字，这是中国人民血泪凝成的数字。我们不忍看到这样的数字，但我们需要这样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必须补偿的罪恶。”

制造“无人区”事件已经成了历史，而我们要揭露这桩战争犯罪的历史公案，绝不是为了揭历史的创疤，而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言。所谓的“补偿”，首先必须正视历史，而且永远记取历史教训，而不能篡改歪曲历史。

十二、英雄的人民　顽强的战斗

（一）力量的源泉

1、3∶1的特殊纪录

1944年春，日伪在热辽地区基本上完成全面制造“无人区”计划以后，大部游击区都已变成了集家区，日伪就更加集中力量摧毁尚在坚持斗争的几块抗日根据地，如丰滦密云蒙山区，热南的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五厂沟以及热东的老岭等，其疯狂肆虐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据丰滦密一年的统计，日伪“扫荡”的时间约8个多月。承兴密联合县政装部1944年统计，一年中日伪军向雾灵山、狗背岭等根据地出扰达438次之多，其中大规模“扫荡”就有50多次，出动兵力达3.7万人次。据承兴联合县办事处主任王佐民当年作的统计，1943年和1944年间，在兴隆县盘据日伪武装力量2万名人，与人口比例为1∶7；而对五指山根据地的连续进攻“扫荡”时，总是集中五六千至2万余兵力，而当时坚持在五指山根据地里的群众约6000多人，这样，武装的日伪军与群众的比例是3∶1。就是说，疯狂的日伪军以3个武装人员“攻伐”1个老百姓，这在战争史上恐怕也是一项特殊的纪录吧！在游击区根据地遭到空前残酷摧毁的严峻形势下，能否坚持住几块抗日根据地，就成了整个热辽地区抗日斗争的成败关键。然而，坚持

根据地的形势是十分不利的，几块根据地都处在四面“无人区”的封锁包围之中，在“无人区”里，主力部队难以迂回活动，只能在外围作战或短促出击给予支援，而坚持“无人区”里根据地的重担，只能由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来担承。

2、**鱼儿离不开水**

坚持过“无人区”斗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刻的感受，就是象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共产党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即使在惨绝人寰的“无人区”的环境中，只要有人民群众就可以坚持；而所谓的“无人区”里绝对不是真的没有了人，而恰恰相反，这里坚持着最勇敢的人。真的没有人的“无人区”是坚持不了的。诗人、作家陈大远在《无住地带》一文中记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1942 年 4 月间，日军疯狂摧毁鲁家峪根据地，冀东《救国报》社受到严重损失，在反“扫荡”中几个月出版不了报纸。1942 年 9 月，日军发起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他们转移到热南山区，这里伪满方面日军也正在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斗争环境异常残酷。为了给报社找到一个稳定的出版报纸的根据地，在工兵的帮助下，终于在兴隆县河南大峪南山里找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就建起几间房子安顿下来。陈大远在文中记述那里美丽如画的景色：

“这里十分寂静，听不到人语，听不到枪声。入夜，却又有点儿喧嚣，有些不知名的鸟雀在‘哥哥’、‘咕咕’、‘吱吱’地乱叫，远近呼应，若有节奏；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野兽，在断续地、清脆地、尖声辣气地呼号。这不象是鸿濛初开的时候大自然的交响曲吗？我们开始生活在另外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太阳爬上山顶的时候，西山的高处已经披上红色的

朝霞，红霞渐渐消退，山里就出现了白天，这时间四周望去，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庭院’的景色。青翠的松柏，同鲜红的玻璃树错杂相间，那些娇艳的黄叶，深沉的兰花，它们互相争斗，互相消溶，真是五色缤纷，丰富多彩，一幅无尽的自然织锦，覆盖着好象百朵莲花的高山。这片高山密林之中，不时飞出几只矫健的白鹤或是几只彩色的野鸡。真没想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会看到胜似江南的北国风光。”

这里确实是“鸿濛初开”的自然生态区域，就在报社院旁，他们找到了约20平方米的一大片百年老山参，足足挖了两柳筐上好的人参。在这里可以安心办报了吧！不行。

“但是问题接着来了，粮米、蔬菜供应不上，吃一斤米、一个萝卜，都要翻山越岭从四五十里以外深夜背来。我们需要的电讯、稿件，要从几十里甚至一二百里以外才能取到。我们的编印工作，不会受到敌人的冲击，却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无法继续下去。我们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认真地总结，请示了领导，十几天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白云缭绕的世外桃源，重新回到战火纷飞的人间。”

报社在群众帮助下，又重新在“无人区”根据地里安顿下来，又是一番情景。

“我们把编辑部和印刷所安设在老乡帮助我们搭起来的马架子里面。老乡们为我们放哨，为我们转送报纸。粮食蔬菜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用不到从几十里以外去购买，老乡们把藏在深山的倭瓜、萝卜送给我们，甚至从‘人圈’里给我们运来粮食。没有菜吃，老乡们帮助我们采集山葱、山韭菜、野蒿杆，有时还可以打来几只山鸡、野兔改

善生活。”

“我们总结了这样两句话：敌人制造的‘无人区’，远远胜过我们自己寻找的‘无人区’；处在人民之中，是‘海阔凭鱼跃’，离开人民，就只能‘索我于枯鱼之肆’了。”

3、瓜儿离不开秧

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间，正是塞外“无人区”里最难熬的时期，日伪军万人大“扫荡”，扬言要把五指山根据地的每块石头都翻过来。在根据地周围重兵包围，在根据地的各座大山上和各条山沟里，建起临时工事或搭起帐蓬，长期监视，白天看烟，夜间观火，逐条山沟逐个山洞反复搜索，群众遭到很大损失，牺牲700多人。鉴于形势已极端险恶，领导上决定由游击队和民兵掩护群众突围转移。当时迁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驴儿叫一带形势最严重，可是区委书记丁春生正在闹病，怎么办？丁春生在《战斗在迁遵兴“无人区”》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危难时刻基层干部群众对党组织的深深眷恋之情。

“1943年冬，敌人集中了兴隆、石庙子、半壁山、鹰手营子等据点的兵力，由西往东对我区进行包围‘清剿’，妄图一举将坚持在‘无人区’的我军民消灭掉。我们区干部被迫退到驴儿叫的几架大山上，情势十分危险。正在这时，接到了县委组织部长李泽同志的亲笔信。信中大意是：敌人决心要把我坚持‘无人区’的力量彻底消灭，为保存实力，可把老弱伤残人员暂时安排到附近我较有工作基础的部落去，区干部和‘无人区’的青壮年民兵自卫队员也暂时撤离‘无人区’。接到县委指示的当晚，我们就在村长张振久家里召开党员、区干部和村干部会议，讨论县委指示。当时，我正患重感冒，由区长李建明主持会议。李

建明同志念完县委的信以后，会场一时沉静，无人吭声。过了一会儿，老党员费占林同志说：事到如今，先叫我们这些老村干部商议一下，然后再向区委汇报。我同意这个意见。过了半个多小时，村干部回来了。他们的意见是：县委的指示要坚决执行，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请区委带全体区干部下山，撤离'无人区'，由村干部在山上坚持。他们说：'我们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里山大沟深，敌人不可能把我们杀净。'同时，他们又提出：'希望在敌人大扫荡过后，区委再回来领导我们。'我躺在炕上，听着这些老同志的话，心里象针扎似的难受，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些与我们生死相依的群众。我叫警卫员王凤银把我扶起来。我问他：'王凤银，你怕死不怕死？'王凤银回答说：'不怕死。要死也是我先死，主任后死！'我说：'好！'于是我又对区长李建明同志说：'建明同志，请你带队下山。'李建明同志却问他的警卫员高山：'你怕死不怕死？'高山说：'不怕死，至死保护区长！'"

最后由区委宣传部长带领一部分区干部连夜下了山，丁春生和李建明留在山上。群众听说区委书记、区长坚持在根据地里，都十分高兴，信心倍增，坚持展开了反"扫荡"斗争。

4、**饮水思源**

在"无人区"的斗争环境中，党的群众路线经受了严峻考验，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得到了升华和净化。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没有半点"特殊"的念头，都是那样水乳交融般地把自己融合于群众之中。1942 年春季，冀东军分区司令部驻在五指山根据地天桥峪一带，天旱人多，把泉水吃干了。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等几位首长就去挖泉修井。当时群众就编成歌曲

传唱："李运昌，司令员，率领八路十二十三团，来到北口外，开展游击战；群众没水吃，群众去挖泉……"时隔半个世纪了，群众还在吃用着那口井的水，饮水思源，群众在井旁立了一座纪念碑，镌刻着"国运长存"四个字。

人民群众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然会"国运长存"。

（二）生　存　下　来

由于日本侵略军对"无人区"里根据地的连年摧毁到了灭绝一切生存条件的程度，要坚持住根据地，头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必须创造最低的生活条件，千方百计地生存下来。

1、穴居野处

从反集家斗争开始，烧房就是日本侵略军最疯狂的手段。穷苦的山民安身立命的家屋，日军来了一把大火，片瓦无存，家产荡尽，群众家家呼天抢地，有的老人愤然跳进火坑自焚。在党和抗日政府帮助下，群众又重建家园，头一两次，还大都是就着没倒的墙壁基本上照原样建起来。到后来，一次一次地被烧毁，墙壁崩塌，建筑材料也越来越困乏，重建的房子也就越来越简化，由两泼水变成一泼水，已经全然不是什么房子了，只是象征性地横着架上几根树枝，顺着搭上一些茅草，既不避风也不遮雨。日军来了还是给烧掉扒平，抗日军民就住废窑，住长城烽火台，住山洞，象原始人一样穴居野处。可是人们却再也没有初被烧房时的那种恼丧，而是泰然处之。

中共承兴密联合县委书记李守善在其《忆承兴密人民的抗日斗争》一文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小黄岩山神庙西沟的群众，挖的是成排的洞，我们去了，他们风趣地告诉我们：

‘我们住的是花市大街’。每个洞里一铺炕,一两个背筐,全家家当都放在筐里,敌人一出动,联络哨一喊,马上背起筐就上山。”

这个“花市大街”实在别致,反映出革命人民的向往和对胜利的信念。

迁遵兴联合县的各级领导机构都设在五指山根据地里,在深山里建起窝棚,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县委田赛在森林里就着梯田的坝台自建了一个小茅屋,在门口贴起一幅对联,上联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下联写:“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横批是:“烧了再盖”。乐观情绪影响了群众,群众则提出口号:“敌人多了围山转,敌人少了跟他干,坚守深山战顽敌,不进‘人圈’当奴隶。”

2、**大生产运动**

从1942年起,日伪对所谓的“无住禁作地带”发起大规模以破坏生产为目的的“割青扫荡”,使根据地的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了取得最低的生存条件,抗日军民连年发起大生产运动。

1941年秋、冬之际,日伪军在丰滦密地区疯狂推行集家并村,党政领导在组织群众反集家斗争中,动员群众在转移前搞好“坚壁清野”,把粮食种籽及生产工具掩藏好。1942年春季,就动员群众从集家点或隐蔽地回到山地春耕,号召:“不荒一亩土地!”抗日政府还明确宣布,土地基本上不分界线,被遗弃的土地都可以代耕,一切收获归生产者所有,并且豁免抗日公粮的负担。对生产生活有困难的户,政府还给予救济帮助。日伪军发动“扫荡”,破坏生产,群众就组织起来,顽强坚持,虎口夺粮一般,付出了极大牺牲。1942年3月,密云县张家坟村

副村长、共产党员任宗玉与党员任宗芳、任永刚3人，团结抗日骨干任宗山、任宗学、孙长瑞、韩二炮等，组成7人生产互助组，带头回到“无人区”里去春耕。不幸在日伪军“扫荡”中全部被捕，受尽了酷刑折磨，个个坚贞不屈，终于全部惨遭杀害。当时抗日政府命名张家坟为“七烈营”，并为七位烈士刻了一块镌有“不屈不挠”的纪念碑，一直珍藏到建国后，才公开竖立起来。

1943年和1944年以后，为了适应“无人区”特殊环境，能够在异常频繁的战斗情况下坚持生产，各根据地在大生产的组织形式上，基本上采取了“劳武结合”和“变工互助”的办法。这种生产组织与延安根据地的互助组及建国后的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有很大不同。最大特点是一切服从于军事斗争。为了便于警戒，有利于随时战斗转移，基本上采取以民兵组织为单元，把男女劳动力都组织起来，打破土地界线，伙种伙收。党政机关的干部、子弟兵也都参加生产劳动。在生活上，对山区群众实行半救济半供给的办法，有了粮食群众同党政干部和子弟兵们就伙吃一锅饭；没了粮食，就大家上山去采野菜、蘑菇充饥。党政干部、子弟兵同群众生产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挨饿忍饥在一起，爬冰卧雪在一起，血流在一起，汗淌在一起。这种组织形式，当时大家都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然而，它绝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个实实在在的战斗整体，是民族精神凝聚的结晶。

3、**支援与运输**

长城线上，日伪构成了一条所谓的“国境海关”封锁线，在各块根据地的周围，又以据点、部落、警备路构成包围圈，既是军事封锁线，又是经济封锁线。为了断绝口里口外贸易往来，

禁止货币流通，严格取缔一切贸易。在伪满洲国的所谓法律中，“经济犯”是仅次于“国事犯”的重大犯罪。所有这些反动措施，目的就是彻底封死根据地的生活来源，使“无人区”真正成为绝缘体式的绝地、死地。

为了支持“无人区”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长城内侧抚宁、卢龙、迁安、遵化、平谷、顺义、密云、昌平、延庆等地靠近长城线上，设有各种物资供应站，筹集粮食、布匹、衣服、鞋袜以及食盐、火柴等物品，通过一条条秘密交通线，源源不断送往“无人区”。

运送物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1940年开辟热河山区之日起，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论党政干部和部队进山区，都要背上各种生活用品去救济群众。对极度困苦的山区根据地来说，这点物资不过是杯水车薪，然而，却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点和加深了党与人民的感情。当然，最主要的方法，还是发动群众搞运输贸易。丰滦密联合县为了打破日伪军对“无人区”里根据地构成的层层封锁包围，提出了“掘堤放水”的战斗口号，号召群众“人人贩运有饭吃，家家贩运有衣穿”。并且由抗日政府办起供销合作社，把群众采集的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品，通过地下运输线送下山去，再组织山外商人运进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布匹、药品等。还规定，凡是进入根据地的各种物资，不但一律免税，而且抗日政府帮助推销或包销。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在通过封锁线时，子弟兵或民兵给予警戒和保护。

随着日伪的经济封锁不断强化，运输物资成了越来越艰险的战斗任务，甚至付出过生命的代价。

1942年冬初，冀东子弟兵第十三团战士们的鞋子都破

了，战士们冲锋不得力转移又困难，在北水峪战斗中吃了很大亏。平谷一区群众给做了一批鞋子，可是难以送过封锁沟。游击队长刘向道奉命率部下山去取鞋，刚出了山就遭到日伪军的层层包围。经过顽强战斗，区委书记鲁小平和 20 多名战士付出了宝贵生命，终于将 900 双鞋取上山来。1942 年冬，“无人区”根据地里粮食严重匮乏，连每人每天 7.5 两的最低限度的供应都难以保证。平谷县土门东沟村民兵英雄胡广才带头组成五六十人的运粮队。他们沿着人迹罕至的崎岖山路，绕过日伪的层层封锁线，一次往返百余公里，没有车马运输，全部靠人背，一冬天背上山 10 万公斤公粮，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食。

由于根据地军民坚持生产，尽管日伪军疯狂破坏，总是有亩产 50 斤左右的收成，再加长城内的支援，山区根据地的军民总算可以半温半饱。然而，即使有了点粮食，想作熟了吃也是个大难题，碾子磨盘被掀翻炸毁了，锅碗瓢盆也都给砸毁了，大家就想出许多奇特的办法来作饭，用石头把玉米粒捣碎，用日军钢盔煮饭；砸杏仁挤油，青石板上烙饼；挖土坑铺树叶焖饭；把南瓜掏去瓤熬粥等等。当然，作出的那些饭的模样是可想而知的。

（三）英 勇 的 拼 搏

在紧张激烈的保卫根据地的反围攻反“扫荡”战争中，民兵们成了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他们表现得异常英勇顽强，而且创造了许多灵活机动的战术，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进攻。

1、喊哨

“无人区”里的根据地，都是由分散在高山绝顶之上的小村落结合起来的，各块根据地之间，以至一个个山头之间，都被日伪军以据点、部落和警备路分割包围着。所以，各块根据地都以民兵大队、中队建成独立的战斗体制，各个山头、村落都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为了扭转被分割包围的不利形势，形成更强大的战斗力，普遍建立了民兵联防体制，以利于协同作战。为了加强通讯联络，除采用鸡毛信、消息树等办法外，在承兴密联合县长城内外几块小根据地里创造了一种喊哨的办法。县委书记李守善在其《承兴密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回忆文章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在大小黄崖、大岭、南北水峪、四座楼、罗家沟一带，南北长约百余里的山区，山顶接山顶，山头接山头，仿古代烽火台的办法，三五里一个联络哨，昼夜监视敌人，群众称为‘活电线杆子’。敌人一出动，联络哨一喊，几分钟就可以传出几十里远。虽不如电话快，但比电话传的广，党政军民都可以听到。群众欢迎，敌人对此最恨。山大，我们地形熟，敌人不好对付。特别是我们设在面对敌人据点的武装岗哨，山高、地险、隐蔽，敌人最头疼。敌人一出来先吃冷枪，敌人要追，早已无影无踪。敌人分兵‘扫荡’，民兵就在山顶对群众喊话，说敌人到什么地方了，指挥群众转移。敌人抢山头，民兵就和敌人转山头，打麻雀战。敌人搜山沟，又会遇到民兵的地雷、石雷。”

当时，笔者也正坚持在这一带，事隔几十年，还常常反思这段斗争生活，觉得这种喊哨的办法比起消息树来就更适应“无人区”战斗的需要，是组织和指挥民兵麻雀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特别是每当山头上民兵喊哨声一起，一人呐喊，万山

回声，群峦反响，实在气势磅礴。群众所以用这种公开暴露的喊哨的办法，也是“无人区”这种特殊环境的特定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激情的渲泄，一种愤怒的示威。你不是要制造“无人区”吗？要使中国亡国灭种吗？英雄的根据地人民就偏偏高声呐喊。这激昂的呐喊，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宣告，这里永远不是“无人区”，这里有千千万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在捍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其奈我何！

2、麻雀战

民兵们的武器，都是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淘汰下来的破烂枪，而且一个中队只能给骨干民兵配备几支，民兵就千方百计搜罗武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拿到手就是杀敌武器。1943年冬，狗背岭根据地小西天村的民兵从长城上找来两门铜炮，身长2公尺，重32公斤，上面铸有使用方法和效力，可以装火药1.5公斤，最多2公斤，喷射小铁球，射程500公尺左右。可巧，一次日军进山扫荡，民兵就用小炮轰击，乱了阵的日军又踏响了地雷，吓得屁滚尿流败阵而逃，多少日子不敢进山骚扰。爱国名将戚继光的遗物派上了抗日救国的用场。

“英雄洞”的事迹是狗背岭根据地民兵中队的骄傲。

1943年间，兴隆县六道河子据点日伪军总是从狗背岭北面闯进来，民兵们就研究如何守住根据地的北大门。他们利用在北沟门悬崖绝壁上的一个山洞作阵地封锁沟门，连续打退了日伪军几次进攻。于1943年12月19日，日伪军前来报复。山洞里的民兵李秀峰（共产党员）、王玉祥、杨长起3人英勇抵抗。直打到弹尽药绝而且都负了伤，他们就用石头、枪托把爬上的日军击落山涧，一直顽强战斗到深夜，三个民兵安全转移出去。据当时地下情报人员报告，一天激战，打死、摔死日军

18名，伪军10多名。1945年冀东十四地区英模会上，狗背岭民兵中队被誉为“民兵模范”，那个山洞被誉为“英雄洞”。

民兵们的麻雀战，起初只是打冷枪，后来就有组织地展开分段战法。日伪军进山时，先打其首，延缓日伪军的行动，掩护群众转移。日伪军进了山，民兵们就分成战斗小组，分散到各个山头，彼此呼应打冷枪杀伤日伪军，阻挠他们的搜索、抢掠和割青苗。日伪军撤走时，就打其尾，截下抢走的物资。当日伪军“扫荡”间隙时，县区武装部就组织民兵主动出击，抓特务，锄汉奸，破坏交通，围困据点，扰得日伪军昼夜不得安宁。

3、地雷战

地雷是民兵保卫根据地最有力的武器。当时在“无人区”的根据地里，如密云莲花瓣、平谷县四座楼、兴隆县五指山、宽城县王厂沟、青龙县花厂峪、绥中县周岭沟、迁西县小关庄等地都设有制造地雷、手榴弹的工厂，生产大量的地雷手榴弹供部队和民兵使用。

可想而知，在“无人区”的恶劣环境里，生产炸弹的条件是何等困难。1942年秋，设在五指山马架沟村西北峪老窝铺的炸弹厂，开始一无所有，但在群众的支持下，难题都得到解决。没有铁，群众就到处去搜集，仅羊羔峪、马架沟两村群众就献铁2500公斤。没有焦炭，民兵们就潜入寿王坟铜矿去“偷”。没有耐火材料，就由唐山地下组织搞出来，运送几百里，越过许多封锁线弄上山里来。在军民奋力突击下，仅15天就投产了。

制造地雷不能满足需要，民兵们得到长城上古人留下的滚木雷石的启发，就研究出造石雷的技术。石雷杀伤力虽然小些，却又有铁雷不可比拟的优点，就是磁性探测器难以发现。山里头到处怪石嶙峋，熊蹲虎踞，块块可怖，谁知道哪一块会

轰然炸响呢！民兵们又到处写上“小心地雷”，“此处有地雷”之类的标语，弄得日伪军寸步难行。

有了大批的地雷、石雷，就可以在根据地周围布起地雷阵，保卫根据地。象平谷县与兴隆县交界的四座楼、罗家沟、白崖一带，曾是冀东西部地区供给部、卫生所等后方机构所在地，为了保卫这片根据地的安全，周围村的民兵组成联防体系，层层布雷，处处设卡，使日伪军轻易不敢袭击根据地。

兴隆县黑河川赵大地（成功村），是五指山根据地的“西大门”，为了守住“西大门”，成立了五虎地雷组，以支部书记虎林为首，虎平、虎春、虎义、虎地等几名共产党员，以地雷为主要武器，率领群众同日伪军展开激烈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还经常主动出击。先后炸死日伪军 50 多人，打死打伤日伪军 60 多人。民兵们也付出了牺牲。如虎春（傅春），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在敌人“扫荡”中，他先后 4 次不顾个人安危，从日伪军包围或追击中挽救 60 多群众脱险。最后一次，当他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自己陷入重围，用一枚手榴弹炸开了自己的胸膛，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年仅 18 岁的宝贵青春。

绥中县加碑岩一带根据地，1943 年刚开辟不久，日伪就“扫荡”摧毁，制造“无人区”。象这样新开辟不久的游击区是难以坚持的。可是，事在人为，周岭沟出了个英雄人物董万功，他带头成立一个民兵自卫队。开始只有 3 条破枪，董万功和大家学会了埋设地雷。地雷又不够用，老石匠董万功就带头做石雷，并培养出 50 名爆破能手。他们在加碑岩一带，大摆设地雷阵，多次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军的进攻“扫荡”。而且逐渐发展，把地雷封锁区扩大到明水塘据点周围，吓得日伪军不敢轻举妄动。加碑岩一带成了辽西走廊上的一块根据地。抗日政府

授予董万功“人民柱石”的英雄称号。

(四)打破牢笼 开展“人圈”工作

1、民族优势

当日伪在热辽地区完成全面制造“无人区”的计划以后，大部游击区变质成了集家区，陷于孤立的根据地受到疯狂摧残，要坚持住热辽地区的抗日斗争，必须一面顽强奋战保卫根据地，一面加强“人圈”工作，打破牢笼，解放“人圈”人民群众。

对“人圈”工作的基本政策，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日本侵略者用集家的办法同共产党争夺群众，但是，“人圈”的围墙隔不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心。恰恰相反，陷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更加热切地盼望着共产党去拯救他们。中共冀热边特委于1944年4月18日发出的《热南地区一年以来的敌我斗争》一文中指出:“我党我军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之解放希望寄托于我们。因此，我们占着政治优势，尤其是民族优势。”在这个基点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人圈”工作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隐蔽发展，基本上采取地下工作的方式，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争取由日伪绝对控制转变成两面政权。二，要执行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更宽大的锄奸政策，对伪职人员及上层人物，要耐心争取教育，体谅他们的处境，不过高要求，只要求其尽可能保护群众，同我们建立一定的联系。严禁滥捕滥杀，除罪大恶极者给予镇压外，一般地宁可错放，绝不错杀。三，最主要的是必须切实关心群众，千方百计救济“人圈”的群众。

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经过多渠道地渗透，死囚牢般的“人圈”也渐渐出现了生机。

2、**打破牢笼**

在群众基础较好，靠近根据地，有条件保护群众的一些地区的“人圈”，就采取政治攻势与武力出击相结合，打破牢笼，拆毁“人圈”，群众又重回山地坚持抗日斗争。象昌延二区汉家川一带的“人圈”，在1942年春开始建部落时，就展开激烈斗争。建成部落后，每个部落都隐蔽下抗日骨干，并在部落的围墙下留下暗道，工作人员可以隐蔽出入部落工作。到1943年春，酝酿成熟，区长李文科和游击队长魏兴顺率游击队，先从汉家川下手，逮捕处决了三个作恶多端的汉奸，号召群众拆毁“人圈”。第十团子弟兵也来配合，又连续平毁了台自沟、二道关等7座“人圈”。从山里被集并来的群众连夜逃回山里，抗日政府及时给安排好生活，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汉家川一带又成了游击根据地。

青龙县干沟、杨岩子、盘龙沟一带山深林密，地形很好，群众也有一定基础，1943年冬集家并村后，群众不堪忍受日伪的压迫，就秘密进行抗日斗争。到1944年11月间的一天晚上，凌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率武工队突进“人圈”，铲锄了三个铁杆汉奸，人心大快，群情振奋，说：“铲锄‘两霸天’，推倒鬼门关，跟着共产党，建设新家园。”乡亲们扶老携幼纷纷逃往山里，重新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3、**隐蔽渗透**

在日伪控制的中心区域，难以形成新的根据地，而又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地区，就采取隐蔽渗透的办法开展“人圈”内的抗日工作。如丰滦密八区，集家后只剩下15户坚持在山上，区长李健等就首先做好这15户的安置工作，又逐步进行争取工作，动员青壮年回到山里坚持抗日，并通过“人圈”中的上层设

法保护他们的家属的安全。经过内外串通隐蔽渗透，全区40多座“人圈”都有了隐蔽的抗日工作，对峪、大峪、长哨营、琉璃庙、汤道河等20多座“人圈”有半数以上青壮年逃到山区，参军或当了民兵。1944年6月，子弟兵又攻克西湾子、宋营子两个中心据点，地下党政干部又乘胜发起政治攻势，从此，大部分“人圈”内部反动统治瓦解，只剩下一个外壳，有名无实了。

兴隆县“无人区”里有多块抗日根据地，这是开展“人圈”工作的有力依托。1943年以后，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圈”内部。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等种种办法，控制“人圈”中上层人物，不少“人圈”中，由党员干部打入伪组织，当上部落长、村长、甲长等，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抗日工作。与此同时，通过组织群众搞贩运，动员回山里种地，或给予代耕帮助，解决“人圈”中群众的生活困苦。当时，根据地群众生活也十分窘迫，但是仍然尽力接济“人圈”里的群众；“人圈”中的群众也想方设法支援根据地，送情报或掩护抗日人员老幼家属等。这些微薄的互相支援，这种“相濡以沫”的精神，增进了根据地与“人圈”中群众的友谊和联系。通过多渠道点点滴滴的渗透，渐渐汇成了潜流。据兴隆县的调查统计，到1944年，全县199座“人圈”中，60%由日伪绝对控制而转变成隐蔽抗日地区，20%转变成抗日两面政权，其中不少部落已完全为抗日政权所控制，抗日干部及游击队可以开会或住下，不少地方重新建立了党组织。

“人圈”工作的广泛深入展开，使变质的广大游击区又恢复成隐蔽的游击区，打破了对根据地的分割包围，从孤立无援的险恶处境中解脱出来，对保卫根据地和坚持热辽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作用。

十三、民族脊梁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军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战在“无人区”里，终于在热辽地区坚持住抗日游击战争，控制了冀东、平北、热河、辽西等战略走廊地带，为以后的扩大解放区和收复东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前进通道。然而，在极端艰险的斗争中，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在开辟热辽地区初期，就牺牲了两位名将——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和八路军第十团团长白乙化。在嗣后长期坚持“无人区”斗争中，相继牺牲的领导干部有：冀东西部地分委书记田野、第一专署专员杨大章、十一团政委耿玉华、十三团副政委廖峰、十团政治部主任王波、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长高桥、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占中、李建国、迁遵兴联合县县长姚铁民、迁青平联合县县长刘全民、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青平办事处主任张真理、十三团副营长薛辉荣、岭上武工队长秦英、东北工作委员会冀东分会武装部长宋国祥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热河省共牺牲党政干部500多名，战士6000多名。仅在兴隆县境内，就牺牲党政干部300多名，战士、民兵3000多名。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战斗在长城内外“无人区”的英雄儿女们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就是伟大的民族之魂。

(一)中国的夏伯阳

包森，是冀东人民广为传颂的游击英雄，英姿勃勃，指挥作战出神入化，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不，包森就是包森，他不仅战争中善用奇兵，而且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很高的政治水平。

1939年间，冀东抗日斗争处于低谷时期，不少人怀疑在冀东这深远敌后地区能不能坚持游击战争。正是包森率部转战长城内外，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术于冀东的特殊环境，迅速打开了局面，壮大了队伍。1939年1940年间，日伪开始在热南山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主要就是对付包森游击支队的，但是在他的指挥下都被粉碎了。

包森用兵如神，敢于出奇制胜。1942年1月13日，在遵化县果河沿，他率领7个连装备低劣的部队，对装备精良的伪治安军第二集团军发动突然袭击，经过激战，全歼第四团，击溃第三团和集团军直属部队，吃掉了比自身大两倍的伪军。战果报到晋察冀军区，军区司令部立即回电“重查战果”，直到二次申报，司令部才相信了这个奇迹。包森参加指挥的整个打治安军战役是一个更大的奇迹，冀东子弟兵以两个团4000多的兵力，对伪治安军26个团4万多兵力发动战役进攻，经过两个月20多次连续作战，仗仗胜利，歼灭治安军6个团的兵力。创造了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以劣胜强的战绩。

包森当年遗诗：

马踏春风蓟水急，绿草滩头缴降旗；

后人续句：

当年义气遗豪语，犹是今朝鼓舞词。

打治安军战役刚刚结束，包森立即率部出征，准备越过长城，以胜利之师打击在热南制造“无人区”的日伪军，不幸，于1942年2月17日，在长城线上野户山战斗中光荣牺牲。

万里长城的历史长卷上永远铭刻着包森将军的英名。

（二）乙化精神

白乙化，文武双全，不仅有很高的军事、政治素养，而且是个富有理想的哲人，“乙化精神”多年来在人们中传颂着，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1933年，白乙化是个刚满20岁的青年，他酷爱读书，聪明过人，是个前途无量的高材生。然而，他却说：“我爱读书，我更爱祖国。”“国家危亡，还有什么个人前途；个人才能不用于祖国民族，又有什么用处。”于是投笔从戎，告别亲人，从家乡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峪来到辽西一带，发动民众抗日，组织起一支号称“平东洋”抗日义勇军。由于他有军事天才，作战神出鬼没，得了“小白龙”的绰号，成了辽西义勇军中的传奇英雄。可惜，他的队伍没有被日军打败，却被国民党政府强行缴械解散。他遂到北平中国大学挂籍读书，不久，就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1937年，他又成功地发动了绥西东北垦区的暴动，任总队长；不久，队伍编为八路军第十团，他出任团长。1940年春，他率部挺进平北、热西，迅速打开局面，作出卓越贡献。“小白龙”的英名又在长城内外广为流传。

1941年春的一天，白乙化陪同客人到密云县赶河场龙泉庵览胜。当老僧得知这位身材伟岸、相貌英武、浓须倒竖的游客就是八面威风的“小白龙”时，立即取来笔墨恳请白乙化为禅院题诗留念。白乙化挥毫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古刹映清流，松涛动夙愁，
原无极乐国，今古为诛仇。
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
燕山狂胡虏，壮士志增羞。

1941 年春，日军对刚刚开创的平北地区发动疯狂的“扫荡”，相继在一些地区策划制造“无人区”。日伪军兵力强大，地区基础还很薄弱，形势异常险峻。白乙化立即率部反击，并向深远敌后出击。在恶劣的战斗环境中，白乙化常常这样激励自己也激励战士们，他豪迈地说：“革命就不能怜惜自己的生命，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1941 年 2 月 4 日，在白马关外降蓬山战斗中白乙化光荣牺牲。冀热察挺进军部发出为悼念白乙化的《告全军同志书》，高度评价白乙化的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称誉他是“中华民族英雄”。有一首悼亡诗云：

名将星沉冀北踪，降蓬山上夕阳红，
兵挥白马身先死，旗指黄龙志未终。
血泪家乡十年隔，风云事业一生匆，
长河若解英雄恨，滚滚奔涛怒向东。

（三）遗　嘱

坚持长城线上“无人区”斗争，持续向东北挺进，开展东北游击战争，最终收复东北，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更是东北人民优秀儿女们的夙愿。象白乙化这样为解放东北而献身的领导人中，有：沈爽（吉林双城人）、王波（辽宁辽阳人）、高桥（黑龙江密山人）、姚铁民（辽宁海城人）、齐英（辽宁北镇县人）宋国祥（辽宁黑山人）等。

姚铁民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出身贫寒的姚铁民，从青年时代投入东北军达 14 年之久，是个忠实的行武军人。他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不满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扣押张学良的背信弃义行为，愤然离开东北军，走上反蒋抗日道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一名勇敢的斗士。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狱后，又发动狱中暴动成功，终于投奔共产党八路军，并且主动请缨挺进冀东，随时准备挺进东北。1938 年来到冀东后，就在长城线上扎下了根，积极参加指向东北的军事、政治斗争。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姚铁民这个只知服从上级的旧军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1940 年成立迁遵兴抗日联合县政府的时候，姚铁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县长；1941 年大规模开辟热南地区的时候，他任长城工作团副团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对热南抗日游击区的开辟和根据地的建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一位倍受群众拥护的好领导干部。他最后的被捕牺牲，更突出表现出爱护群众不惜牺牲个人的高尚情操。

那是 1943 年 2 月 5 日，正是日军制造“无人区”最疯狂的时期，姚铁民和几名游击队员住在兴隆县黑河川红石峪，突然遭到日军袭击。正值大雪封山，群众转移行动困难，日军就猛烈射击群众，但日军也因动作困难一时难以形成合围。姚铁民和游击队员本可以从容转移。但是，他为了掩护群众，就率领几名游击队员奋起抵抗，把日军火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经过一场激战，群众安全脱险了，而姚铁民和战士们已弹尽药绝陷入重围，姚铁民和 5 名游击队员被捕。

姚铁民被捕后，为了保护地方工作的机密，保护基层组

织，改名宋德，称自己是游击队长。但当日军得知他就是日夜追捕的迁遵兴联合县长时，就百般诱惑和重刑拷问。姚铁民铮铮铁骨，直到被折磨得成了一个再也无处用刑的废人，也没有从他嘴里吐出半个字的机密。

姚铁民的民族气节甚至感动了承德监狱的狱警，他们暗地里为他疏通门路，通知他家乡的儿子来承德探监，并且在水泉沟万人坑里单独掩埋了姚铁民的尸体，还为他保存了给儿子的最后遗嘱：

振福吾儿：

这是父子最后诀别，回忆余自进关入陕，本想与诸同志携手共同抗击日寇，今不幸被捕入狱，即为革命，夫复何言！现即宣告死刑，决不望生，况余为国捐躯，死复何憾！余所最堪痛心者，祖国尚在沦亡，诸同志仍在水深火热中努力奋斗。吾儿即已成年，汝当以身许国，以继余志，是为至嘱！

（四）轻装诗

1943年5月13日，在宽城县王厂沟战斗中牺牲的第十三团一营副营长薛辉荣，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他万里跋涉，转战冀东，身经百战，身先士卒，牺牲时年仅22岁，身后无一遗物，只留下了一首宝贵的《轻装诗》：

轻装，轻装，
一笔一枪；
为了信用，
全凭手章；
笔能学习，

枪上战场；
一颗赤心，
交给我党。

这首连字句都“轻装”了的简练诗篇，是冀东地区抗战期间特别是残酷的“无人区”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1942年至1944年间，冀热边长城内外都被日军深壕高堡封锁起来，制造成大范围的“无人区”，抗日军民不仅生活异常艰难，而且战斗频繁，就连司令部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都处于高度流动高度分散的游击状态中，当时形容说：“马背上的司令部，背包里的抗日政府”，是很逼真的。从司令员到每个战士，都必须彻底轻装。但是，当时政治整军和整风学习非常紧张，要求人人身上轻装，个个头脑武装，就是战胜“无人区”特殊环境的胜利保障。广义地说，薛辉荣烈士所倡导的这种“轻装”精神，就是老红军光荣传统的具体体现。

“无人区”斗争中，出现了许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人物。象十一团政委耿玉华，于1942年6月11日，在平北赤城县长嵯山战斗中，拼到最后，率领19名战士跳下悬崖。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烈士们都象《轻装诗》所描述的，除去枪枝、钢笔、笔记本以外，没有身外之物。

（五） 当 代 佘 太 君

最值得敬佩的是丰滦密中心区张家坟南猪头岭的邓玉芬大娘，人称“当代佘太君”。

邓大娘和丈夫任宗武，含辛茹苦几十年，拉扯着7个儿子过生活。1933年，日本侵占了家乡，并且划入伪满洲国，人人不得再称自己是中国人，而必须说是“满洲国人”，不然，就是

"国事犯",会招来杀身之祸。邓大娘却一次又一次地教育儿子们:"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1940年夏,八路军第十团开到长城线上,以张家坟一带为中心创建根据地,并动员群众参军成立游击队。邓玉芬、任宗武两口子立即送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参加了游击队。她和丈夫也都成了村中抗日骨干分子。后方医院设在她家,老两口就成了伤病员最贴心的护理员。当时子弟兵中传颂着这样一句话:"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

1941年秋,日军发动万人大"扫荡",疯狂制造"无人区",地方上成立民兵组织,邓妈妈又送两个参军不够年龄的四儿子任永合、五儿子任永安参加了民兵,同他父亲一起坚持在"无人区"里。不幸,于3月21日,遭到日军袭击,丈夫和五儿子被日军杀害,四儿子被抓走。当时被组织上安顿在长城内基本区的邓大娘,悲痛欲绝,谢绝了同志和乡亲们的挽留,毅然领着小六和小七回到已成"无人区"的猪头岭,坚持抗日斗争。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大儿子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了。二儿子任永水负了重伤,回家休养。扶持好了许多伤病员的邓大娘却没能够保全住自己的儿子,伤势恶化死在家中。不久,又传来消息,四儿子惨死在鞍山劳工集中营中。从此,豁达开朗的邓大娘脸上再也见不到笑容,眼里却也没有泪水。她只是默默地日以继夜地操劳,春种秋收,做鞋做袜,支援前线,照顾伤员。她抱着一个希望,就是小六小七快长大,去报效祖国,为父兄报仇。

1944年春,日军疯狂摧毁以张家坟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混乱中跑丢了小六,小七又得了重病,烧得通身火炭一

般。重病中的小孩子哪里经得住冰天雪地饥寒交迫的熬煎，就哭叫起来。搜山的日军大喊大叫着到了附近，如果暴露了，不仅母子落入魔爪，附近隐蔽着的许多乡亲都会招来祸殃。情急之中，邓大娘用烂棉败絮塞满了小七一嘴，小七猛踢猛挣，邓大娘就紧紧地搂住他，死死地堵住他的嘴。搜山的日军走远了，小七也断了气。还没有个名字的小儿子，就这样惨死在母亲的怀里了。邓大娘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撕心裂肺绝叫一声，昏了过去。

丈夫、二儿子、五儿子的坟旁又添了小七的一座小小坟茔。邓大娘扑倒在坟茔前守候了一夜，当曙光照红了万里长城，坚强的邓大娘又一次战胜了巨大的精神创伤，重新站了起来。

母爱是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可是，在“无人区”斗争中，有多少母亲象邓大娘一样，象摘去心头肉一般堵死了自己心爱的孩子。有的母亲，既舍不得孩子，又不能连累大家的安全，万般无奈，就抱着孩子跳下山涧，母子同归于尽。据《冀东日报·八年抗战纪实》一文记载，在承兴办事处四、五、六三个区里，前后就发生过八起这样悲惨的事件。

“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宁可信乎！

十四、黎明前的战斗

（一）妄想时针倒转

1944 年，解放区敌后战场展开局部反攻，濒于覆亡的日本侵略者仍然作垂死挣扎，妄想确保本土、朝鲜、满洲，以求“体面”地结束战争。据《大东亚战争史》① 记载，在日本大本营 1945 年拟定的《战争指导草案》中，仍然强调要把满洲同其本土视为“一个整体”，要加以“确保”。因此，对于八路军向热河地区的进攻引起极大的关注。据《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

> “关东军及满洲国政府，1943 年，已把作为全满治安最重点地区转向热河省。将原岸谷警务厅长（当时总务厅地方处长）起用为副省长。44 年，李运昌等，从长城沿线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冀察热辽区’（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对日本人果断地展开反击，大大地动摇了满洲国。”
>
> “同年 12 月，热河省副省长岸谷隆一郎，让该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丞组织‘热河一心队’，从整顿治安的满华国境转移，越过长城，进驻华北。这个部队是根据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北支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所订

---

① 服部卓四郎著，军事译粹社印行。

的《关于满华国境地带整顿治安的协定》进行派遣的。至年底，由北支方面军指挥下，编入北支那特别警备军[①]（司令官：陆军中将加藤柏次郎），参与遵化方面的警备。”

从其新的战略态势分析，日本侵略者仍然坚持其“确保冀东，才能确立满洲”的基本方针。他们妄想拨时针倒转，重温1933年《塘沽协定》的旧梦。那时是进攻，此时是防御。但都是要控制住冀东，在其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之外，再增设一条类似当年“军事分界线”式的第二道防线，将冀东仍然变成一个“缓冲区”。为此，华北方面日军与关东军达成默契，在冀东地区作了一系列的战略新部署。

1944年底，由10个伪满省属警察讨伐大队合编的“一心部队”（4500人）进驻长城内线遵化、迁安、抚宁等地，司令部设在遵化，控制长城内侧地区。1945年春，又从伪满洲国开进冀东伪满正规部队“铁石部队”，共3个旅（约1.5万）人，进驻北宁线，司令部设在唐山。与驻冀东的华北特别警备队、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及伪绥靖军协同作战（由“北特警”司令部统一指挥）。并且将冀东划为“特别行政区”，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政会（伪新民会）“一体化体制”。由原来伪满大汉奸姜凤飞出任行政长官，以协调关系。并计划从1945年春季开始，在伪冀东道所辖8个县山区推行伪满式的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制造新的“无人区”。妄图实现冀东“满洲化”，进一步将冀东划归伪满统辖，构成其所谓“西南国境线”的“第二防线”。

在平北地区，于1944年9月，伪满与伪蒙疆方面日伪在

---

① 即伪“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

张家口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并达成协议，由伪满方面日伪军越过长城，进驻赤城、龙关县的独石口、云洲、后城等战略要地，协同伪蒙疆方面日伪军大举“扫荡”，以确保长城一线。

据统计，一时麇集在长城内外冀察热辽地区日伪军达 17 万之众，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出现了“黎明前的黑暗”的恶劣形势。

（二）粉碎制造新“无人区”计划

对于伪满方面日伪军的这一新的动向，特别是要在冀东地区制造新的“无人区”的计划，引起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高度重视，1945 年 2 月 28 日发出的《关于扩大解放区方案》中指出：

> “在冀热辽已增加伪满军 11 个旅，讨伐队 10 个，与平北两个旅，并向南推进一步，把‘无人区’扩大到长城以内。其目的则为积极向我进攻，与过去在长城外制造‘无人区’主要是防御我向伪满洲国发展有很大不同。但在锦热路北无大批敌伪，大为行政警、自卫团防御，人民渴望我再去。如果敌寇能实现其压缩企图，则在压缩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对冀热辽、平北地区大举“扫荡”，以企图达到围歼或驱逐我军之目的。这样将对冀中、察南异常不利。”
>
> “根据上述形势，目前应是我们挤退北面敌寇向我压缩（特别是平北与冀热辽）和扩大解放区的有利时机。”
>
> “除了随时准备进行反‘扫荡’外，我在进攻方面应该主要的以逐渐向外扩大，并与主动战役行动相配合，进攻开辟新地区。”
>
> “冀热辽目前对伪满军应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一方

面在军事上不断予以打击(按冀热辽军区目前计划执行),把他的气焰打下去,打破其集家企图。在长城两侧"无人区",按照冀热辽区党委计划积极活动,恢复与坚持长城外"无人区"的游击战争,牵制由北南压之敌,以巩固我口内阵地,并准备向热辽发展之阵地。"

根据晋察冀分局指示要求,冀热辽军区发动了打伪满军战役,乘伪满军刚刚入关人地生疏立足未稳之机,给予迎头痛击。

打伪满军战役分三期进行。从2月12日开始,到2月底为第一二期。主力部队、地区队及游击队、民兵广泛出击,取得初步胜利。4月2日,冀热辽军区又发出《反伪满军战役延期的指示》,发起第三期战役,延长到5月底。要求更加广泛动员,党政军民一致发动"总力战"。到5月底,打伪满军战役胜利结束,共作战230次,毙伤俘日伪军5035名。与军事打击的同时,对伪满军发起强大政治攻势,给伪满军在精神上以很大打击。打伪满军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伪在冀东制造新的"无人区"的计划,巩固了冀东基本区,为向热辽地区出击的扩大解放区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向"无人区"大出击

1、梅花阵推进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扩大解放区方案》中,对全区各解放区作出了全面部署,部署中对冀热辽给予突出重视,要求冀晋、冀察、冀中各地在时间上,"均须以冀热辽开辟热河中部及绥中地区的时间为基准"。并要求冀热辽和平北应在6月初齐头并进,举行开辟热辽战役。对冀热辽和平北向伪满地区出

击的组织形式上，根据伪满辖境大面积“无人区”的特殊情况作出了具体的安排，指示说：

“在雁北、察南，采取武工队的方式开辟工作，一般是好的方式，但在伪满国境内，由于人民和我军接近即遭到敌之烧杀、迁移的极端野蛮政策，使武工队以反复活动逐渐组织人民的方式遇到大的困难。同时，到敌后去须穿过伪满军防区及长城线的‘无人区’，而远远的离开自己阵地，加以锦热路以北的辽阔地区有敌点碉，执行战役时，以梅花型队形出现为好，而在主力兵团的周围组织多数武工队，在统一领导下进行较大面的占领。”

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在发起打伪满军战役的同时，即着手积极准备扩大解放区进军热辽地区的各项工作。并且认真总结了从 1938 年以来多年开辟与坚持热辽地区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重点总结了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经验得失。冀热辽区党委于 1945 年 2 月 5 日发出《关于对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相继又发出《关于恢复开辟热辽的各种政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基本方针及具体政策都作出重要指示。并派出小分队向热辽地区出击，搜集情报，了解情况，制订进军方案。

2、**多路出击**

在冀热辽地区，担负出击热辽地区扩大解放区战役任务的是第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地区。为了加强领导，三个地区都在地委领导下临时组建了地分委，以三个军分区中抽出的主力部队为核心，地方干部和游击队组成若干武工队为外围，组成“梅花阵形”，向热辽地区分头并进，对“无人区”大出击。

西路为第一北进支队，由第十三团团长师军、政委王文和

第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率领，主力两个连和3个县建制的武工队，共500多人，于6月27日从古北口东南密云县姚树峪出发，经12天急行军，7次激烈战斗，突过承德、滦平、丰宁的集家区，于7月8日进入围场县境。这一带是“生荒”地区，毫无群众基础，立足未稳即遭近万余日伪军的疯狂的“扫荡”追击。第一支队立即化整为零，分兵开展群众工作，在围场、隆化、丰宁三县交界处开辟出一片游击区，并曾袭击牛肚子沟、燕各柏、大唤起、大石头、白水等日伪据点。

中路为第二北进支队，由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第十五地委组织部长宋诚率领3个主力连和5个县建制的武工队，共700多人，于6月20日越过长城，向都山、五指山、七老图山推进。连续解放了大屯、孟子岭、南天门、九虎岭等19个日伪据点和“人圈”。并攻克上谷车站，然后分兵两路，一路进入热南五指山根据地，配合民兵展开反“扫青扫荡”，一路突过锦热路，进入热中七老图山区，活动在承德、平泉、宁城一带，恢复承平宁地区。

东路为第三北进支队，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与东工委冀东分会组织部长张化东率领3个主力连和4个县建制的武工队，共800多人，于6月22日出发，分兵三路，出义院口、界岭口、九门口，向热东、辽西进击。一路上攻克千杆沟、马杖子、张杖子、刘杖子等据点，进入绥中明水塘、兴城碱厂、建昌大屯、朝阳六家子、朱杖子、玲珑塔、青龙白家店、下抱榆槐等地活动，先后攻克13个日伪军据点，解放了一批“人圈”。

平北地区第十团和游击队也从5月份发动两次战役行动，攻克了长城内侧剪子岭、镇宁堡等12个据点，解放了独石口、云州、后城、二道关、花城等战略重镇，扩大解放区1万多

平方公里，逼退了进入长城内线的伪满方面日伪军。于6月间，与冀热辽军区同步，成立了热西地分委和热西支队，由关涛任地分委书记，十团团长王亢任支队长，并成立滦平（西）、丰宁两个工委和办事处及武工队，全力向热西推进，先后解放了周四沟、汤道河、琉璃庙等据点和“人圈”。基本上恢复了丰滦密地区，再次开辟龙赤特三区，在黑河川上建立了3个区政权。

3、**最敏感的神经**

从1945年初，由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冀东军分区升格为冀热辽军区，新体制的出现，引起华北和伪满方面日伪军的重视。认为把本来抗日游击区很少的辽宁也纳入“冀热辽”的建制，与解放区总反攻的战略部署有关。估计一方面是为了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可以取得争夺东北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则认为“目前共军工作重点放在取得、强化总反攻的基地”①。因之，八路军扩大解放区的战役行动，就象触动了日伪最敏感的神经，立即采取对策。当八路军几路支队挺进热河、辽西地区时，日伪军一面顽强阻击，一面集中起伪满第五军管区所辖的5个旅伪满军，组成一支机动部队，向热中、热西、热东、辽西地区疯狂“扫荡”，对挺北支队穷追不舍，根本不给予站脚喘息之机。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于7月下旬，第二第三支队返回冀东基本区休整，留下部分地方工作人员隐蔽坚持斗争。只有第一支队顽强战斗到日本宣布投降。

---

① 承德日本宪兵队1945年《灭共对策资料》。

十五、最 后 胜 利

（一）胜 利 的 狂 欢

1945 年 8 月 10 日上午 6 时 45 分，日本外务省向盟国发出乞降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华民族更是取得了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举国上下浸沉在狂欢喜庆之中。正在塞罕坝上同日军周旋的冀热辽北进第一支队的狂欢，反映了坚持在“无人区”恶劣环境中抗日军民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北进第一支队政委王文在《北进第一支队》的回忆文章中作了生动的论述：

“8 月中旬，正当我们苦于无法筹备冬衣，开始集合队伍，准备按上级指示向平北转移时，突然接到群众传来的消息，说：‘日本投降了，讨伐队已经回县城。’这消息虽然振奋人心，但是，处于黑云压顶、敌人疯狂进攻的时候，一时难以确信。于是我们就一面集合队伍，一面派人侦察。8 月 18 日中午，我带一个排正在大唤起哈里哈沟邢有家吃饭，侦察员匆忙地走进屋来，喜形于色地大声报告：‘日本确实投降了，围场的鬼子已去承德集中，城里边只剩下 300 多警察队。这是第三乡的乡长从棋盘山警察所得到的消息。伪警官还急着托人找我们的关系呢？’这个消息，恰似一声春雷，极大地振动着每个人的心弦，顿

时发出难以自抑的反响。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立即放下饭碗，连蹦带跳地冲到院子里，高喊：'抗战胜利万岁！'一个好开玩笑的班长把一碗带汤的莜麦卷子扣在一个战士头上，拔腿就跑。战士们一窝蜂似地追了出去，抓住那个班长就是一顿捶打。最后，由四个战士拉着他的手脚左右摇摆，号称'打油'。那个满头面汤的战士，使了一个眼色，四个人齐声叫喊着：'一二'把班长扔进靠近墙角的水坑里。大家前仰后合地喊着、笑着，直乐得泪眼迷离，嗓音嘶哑，连气都喘不过来。"

整个"无人区"里也是一样，胜利消息传来，立即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唱着："天明了，天亮了，'无人区'的人民解放了！"的歌曲，走出深山老林，配合游击队冲向"人圈"，拆毁围墙，捣毁伪机构，返回故里，重建家园。

（二）雷厉风行执行总部命令

1、"现驻"、"即日"非同小可

抗战胜利，中国的政治形势急骤变化，从民族矛盾转入国内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受降问题，而对东北的争夺是当时的一个关键。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丢了东北就不能控制华北。美国一些军政要人也说，国民党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让共产党进入东北。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叫嚣：没有东北便没有全中国。但是，国民党从"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后，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丢了大半个中国，东北更无一兵一卒。胜利了，要抢掠东北，又鞭长莫及。于是就利用其合法地位同苏联政府谈判，企图从苏军手中"和平接受"东北。

对于国民党这种下山摘桃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的行径，

共产党的态度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在谈判之际（14 日签字），延安八路军总部于 8 月 11 日发出第二号命令，原文如下：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　德"

于 11 日晚间，中共中央又发出一份内部电报，指示说：

"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往四省。"

8 月 17 日，晋察冀军区给冀热辽军区电报命令：

"为有效配合苏蒙军在林西南进部队，除李运昌带 3 团进东北外，另外组织极大可能兵力，迅速通过'无人区'，在锦热路北积极行动，夹击顽抗苏蒙军之敌。"

这些命令的下达，一方面是要八路军的部队立即行动，配合苏军作战，对日伪受降，接收东北；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国际国内公开申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立场，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有权接受东北。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原东北军外，特别是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地区的李运昌所率冀热

辽部队，从1937年起，就在长城内外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始终把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最终解放东北作为战略任务，并在热河、辽宁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以无比顽强的战斗精神坚持在“无人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当然可以合理合法地进入东北，接受日伪军投降。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中特别指明：“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命令中的“现驻”和“即日”四个字非同小可，“现驻”指明了冀热辽部队对热河、东北受降的合法地位；“即日”，则强调了进军东北的强烈的时间性。

2、**时间就是胜利**

时间就是胜利。在战略转折关头尤其如此，当时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时间的竞赛。所以，中共中央在一系列电报指示中，反复强调争取东北是“千载一时之机”，“时机万分紧迫”，“迟延一日即有一天损失”，“不容有片刻迟缓”，否则“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等等。

作为最先进军东北的冀热辽部队的行动，表现出强烈的时间观念。8月11日收到总部二号命令，14日，冀热辽区党委即完成了进军部署，下达后，各地委经过研究作出安排，立即出动。

中路，十五地区行动最快，17日，先头部队就出了喜峰口，于26日进入平泉，与苏军会师。又分兵两路，一路向赤峰，一路向朝阳进军。坚持在宁城“无人区”的宁赤工委书记张立文与晋绥地区派入赤峰的地下工作者王逸伦在赤峰会合，在苏军支持下，组建了赤峰市临时政府。

西路，第十三团和坚持在“无人区”雾灵山根据地的十六团于31日解放兴隆，收编了伪满军1个旅部队后，迅速进入

承德，与苏军会师。与此同时，坚持在雾灵山根据地的“北进敌后武工队”，解放了大杖子据点，又进入滦平城。坚持在围场的“北进一支队”，于20日，一路解放了围场，另一路配合苏军解放了隆化县城和丰宁凤山。

东路，以第十六地区的部队组织第一梯队，先头部队于28日出关，29日在绥中与苏军会师。31日，在苏军配合下解放山海关，立即乘火车向辽宁疾进，9月4日进驻锦州市，9月6日抵达沈阳。由李运昌及冀热辽区党委、行署等主要领导人率三个团组成的第二梯队，于9月7日抵山海关，8日进入锦州，14日进入沈阳。

当时，共抽调了冀热辽军区1.2万部队，占总兵力的2/3，抽出各级主要领导干部2500多人。这样牵动全局的大变动，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部署，付诸行动，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和扯皮掣肘。在组织上进行了几乎涉及到每个干部的去留升迁的大调整，也没有任何人讨价还价。一切为了胜利，一切服从中央战略部署，上下一致，纪律严明而自觉，这就是那个时代共产党的作风。没有那样雷厉风行的作风，就不可能保证进军东北计划能快节奏地完成。

（三）外交胜利的基础

当八路军进入热河、辽宁地区时，由于苏军受中苏条约及一些国际协定的限制，有所顾虑，不少股部队刚同苏军接触时，有的受到欢迎，得到支持；有的遭到阻难，甚至被解除武装。当曾克林部进入东北中心城市沈阳时，就引起了与苏军的外交纠纷。

据曾克林在其《执行总部命令，先机进入东北》一文中回

忆，于9月6日，他们乘列车进入沈阳站，苏军感到很突然，立即派部队将火车站包围起来，一个苏军军官质问曾克林等，“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的？谁叫你们来的？”曾克林与副政委唐凯等经过研究，认为，我们是在冀热辽地区坚持抗战多年的八路军，一直以解放东北为己任，抗战胜利，我们奉延安总部命令来配合苏军作战，向日伪军受降，接管东北，是有充分理由的。决定就按延安总部二号命令精神理直气壮地同苏军交涉。于是曾克林对苏军代表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在冀热辽地区的抗日队伍。遵照延安总部命令，到东北来配合苏军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维持秩序的。”苏军代表提出：“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曾克林回答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正是奉了统帅部的命令来沈阳接收的。”几次交涉中曾克林总是据理力争：“冀热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常期在这里坚持抗日战争，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经过反复交涉，苏军终于同意我们部队下车，但要到沈阳市外苏家屯去。

交涉的初步胜利，给部队很大鼓舞。下车整队时，动作迅速，军容整齐。当部队以四路纵队出现在沈阳街头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14年之久的沈阳市人民群众，万家空巷涌上街头迎接祖国的队伍。群众潮涌般簇拥着八路军部队在一片歌声、口号声中前进。广大群众这一自发行动，大壮了军威和国威。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红军，面对此情此景怎能无动于衷？不一会，两名上校军官乘车赶来，说：“你们这个队伍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能走，请留下。”部队遂在沈阳市内故宫东小河沿安顿下来，成立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市

中心伪市政府大楼。

可是，八路军进入沈阳的消息迅速传扬出去，西方通讯社纷纷发布消息，又引起了美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外交交涉。受到压力的苏军又改变了态度，要曾克林部撤离沈阳。曾克林、唐凯等依然据理对苏军明确表态："我们是奉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的，只有我们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是不行的。"谈判僵持，苏军遂决定派出中校贝鲁罗索夫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偕同曾克林于 9 月 14 日乘飞机抵延安谈判。

曾克林争得偕同苏军代表到延安谈判之事非同小可。

日本投降，全国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即开始酝酿新的战略方针，准备实行全方位战略转移。可是要实行牵动整个解放区的战略转移，就必须有准确的高级战略情报，搞清东北情况，才能下定决心。曾克林和苏军代表正好在中共中央举棋难定的关键时刻到了延安，使中共中央及时得到了东北情况，特别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对共产党、八路军进入东北的真实态度。于是，当机立断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新的战略方针，于 9 月 15 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等领导同志于当天乘苏军飞机去东北。

在与苏方谈判中，对热辽地区的接收问题，达成了有利的协议。苏军代表带来的同朱总司令会谈的四项条件中有一条提出：蒋介石军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要求进入满洲（包括热河平泉等地）的八路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的地区。对此，中央领导与苏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交涉，谈判的基础条件就是热辽地区是八路军长期坚持抗战的解放区。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联名备文致苏军后贝加尔前

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建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中共中央 9 月 15 日电文）这一点得到苏军的承认，据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在其回忆录《结局》一文中记述说："特别指出的是，当苏军给日本占领军以致命打击和进行追击时，国民党将领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援解放中国东北的红军"，"可是当苏军在所有作战方面胜利发展进攻，并向满洲腹地猛攻日军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也转入对日本占领者的进攻。""我们记得，在 8 月 11 日，八路军便开始大举进攻，几乎整个华北地区，其中包括张家口、热河（承德）等大城市转入八路军手中。在这些地区，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同八路军协同作战。"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的结果，将已进入沈阳的部队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而对于热河和锦州两省（按伪满建制），则正式承认是我热辽解放区范围。苏军提前于 10 月 22 日开始从承德、赤峰、朝阳、锦州等地撤走，正式移交给共产党八路军接管。10 月 14 日，热河省人民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从此，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控制了热河、辽西两大战略走廊，而且在嗣后一系列谈判中取得了完全合法的政治地位，对争夺东北战略基地的斗争奠定了非常有利的基础。

〔附　件〕

说　　明

1988年，经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宏运、张宏祥介绍，日本访问学者、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读到我的论文《一个特殊战略地带——长城线上“无人区”》。当年7月间，姬田和研究生丸田孝志到唐山访问我。双方商定，将我的论文介绍到日本，并由姬田、丸田对“无人区”进行考察后，由姬田写一篇关于“无人区”的调查报告，以合著形式，于1989年9月1日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书名《又一个三光作战》。出版后，在日本及法国学术界、新闻界引起一些反应。现将该书的序章及部分有关的评论、报道附上，供读者参考。至于文章中有些情况略有出入，未作订正，读者自明。

《又一个三光作战》序章

本书问世的意义

——由与陈平先生相会谈起

〔日〕姬田光义

“无人区”和“无人区”化政策是什么？

本书对有关日中战争——中国方面称为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军队对中国侵略和统治下，究竟作了些什么，对其有关历史事实方面，由日中两国的研究者共同工作，想加以弄清阐明。同时，在昭和史临终之际，达半个世纪多富有戏剧色彩的日本历史展现之中，对其特殊的阴暗部分，加以照射，同时也是对昭和史加以痛恨的反省书。

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实，指的是在沿万里长城线南北地域上，将中国人完全驱赶出去，在此广大的地域内造成“无人区”，这是日本军的一种战略与策略。日本军想以此战略和策略，对抗日运动彻底消灭，确保满洲国西南部国境线的安全，同时也确保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周围防务的安全，并想由这一带逐步向南延伸推进日本军作为大后方的基地，更想作为对苏联作战的基地。

“无人区”，东起山海关向西延伸至河北省北部的独石口，大约长 1000 公里。在沿长城的地区，日本军将中国居民强制

赶出，禁止居住，称为“无住地带”，更有甚者，禁止耕作，称为“无住禁作地带”。将中国人从世代相传遗留下来的土地上驱赶出去，强迫移住到日本军设置的“集团部落”，或叫“集家并村”，由军队和警察严加管理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当时中国人比喻说，“集团部落”象猪圈、羊圈一样，称之为“人圈”。人们因憎恨其被围困，拼命地反对进入“人圈”。当时由此逃脱者唯一的出路，便是投奔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阵营。原来想借以消灭抗日力量而设置的“无人区”，却具有讽刺意味的成了抗日运动的温床。

归根到底，“无人区”设置的过程，也正是日本军遭到中国人激烈抵抗的过程。日本军在那里作了笔墨难以记述的非人道行为。本书以史实为根据，仅对此过程和非人道的具体情况加以揭露，以给后世留下证言。至于这样空前绝后的事，在昭和史中应该摆在什么地位，那就是读者诸贤的事了。

本书问世的意义

中国方面不消说，在日本历史学界也不是没有谈及过“无人区”问题的，比如，前面谈到的日本防卫厅出版的《华北治安战》，就有所记载，还有许多从相反的立场出发描述日军侵略的过程以及中国对日本侵略抵抗的著述中，也涉及过“无人区”的问题。但是，触及到的问题的大小及深刻性，就少得可怜了。特别是《华北治安战》，是一部收集了丰富多彩的史料和证言的详备战史，可是在“无人区”的问题上滞笔了，这能说是偶然的现象吗？

本书从正面抓住了日本军的“无人区”化政策的实际情况，这一业绩在日本开始得到好评。现在，日本的研究者、作

家、新闻工作者、旧军人，都在研究探索被防卫厅战史、中高校教科书中严格控制和避讳的历史问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使用毒气、“三光政策”及鸦片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挖掘和研究，揭示了历史真实面目。本书只不过是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希望以此推动历史研究领域向深度广度发展。

那么，让我们把“无人区”问题与上述诸问题作个比较，看看“无人区”的历史特征又是什么呢？

“无人区”化政策，虽然不是象“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样集中的惊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但是，它是经过长期精心周密策划，且有组织地展开的，在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一场大屠杀。或者可以说是一场消灭中国人的战争。

“无人区”化政策也不象“七三一部队”那样露骨的、残酷无穷的、非人道的活体实验，但是，把人们从祖先留传下来的土地上，强行驱赶到别的地方去，把人们进行集中管理，有意识有目的地摧残人生和土地，这是比“七三一部队”更大规模的活体实验。

而且“无人区”化政策超越了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事例的个别性、偶发性，它是一开始就有计划地追求地区性、空间广泛性和长期性的“又一个三光政策”。

总之，“无人区”化政策就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意识地追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事件集大成的体现。

这个问题之所以至今还没能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焦点，我认为其最大的原因是，“无人区”的时间性、空间性扩展的太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极不充分。我相信，今后如果日中

两国历史研究者，都关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会理解到“无人区”化政策，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精神、思想、感情等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集中体现。这一点，正是本书问世的意义所在。

历史家的难处

这虽是题外话，但是，承受如此重大压力，作为笔者，在选择研究课题，积累历史资料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历史学家的难处。单纯地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人类生活发展的足迹；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的继承。那么，人类的发展不就是一直描写着历史的前进、发展的轨迹吗？还是走过了退步、保守的道路呢？这只好自问自答了。这就不得不想到本书所描写的我们的前辈所作所为的血腥味了。

笔者本人认为，人类虽然是沿着进步、发展的轨道前进的，但是这种乐观的思想表达中，也有其反对者，历史上有过无数证明其反对论的公正性的根据，但是，无论持那一种立场观点的，作为历史学家，为了能全面地把握人类的历史，都必须不加可否地直观历史事实。

回顾我国的历史，尤其是自己生活在昭和年代里，不能说完全没有日本人的自豪和优越感，但是也看到了无数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行径，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的同胞和民族中隐藏着阴暗凄惨的传统。如果在中国居住或旅行，感受尤为深刻。

和现在的中国相比，无疑日本的物质是优越的，如从这点来批评中国，指摘中国的缺点，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说生活在日本土地上的大多数日本人沉浸于自己的优越，这并不

过分。这里不能简单地割断历史下结论，我们必须正视在历史上手脚沾满无数中国人鲜血这一事实，不然，对历史该作如何解释呢？然而，这点正是历史学家的难处。我们不能回避证明在中国土地上渗有我国民族的血迹，而只单纯地去讴歌日本的经济发展。笔者来到中国已经一年多了，在此期间，考察、观光、旅游、访问了好多地方。所到之处，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日本人留下的影子，也就不能不看到近代以后，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痕迹。

若为中国人说句话，那就是他们并不愿意让人看、也不愿说日本人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只要不是需要，他们是不想涉及过去日中两国那段不幸的历史。正如下文所述，全国无论什么地方，大体上县级(2000余处)的地区，都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专门机构，详细调查研究了在日中战争中，地方上发生的事件、被害情况等，均有详细记载。假如旅行观光者稍加注意和细心观察，便可了解这些事实。特别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尤其是对日中战争史研究的人，根本看不到对日本人不公开的资料和文献，于是必须通过有关部门接触那些对日本过去曾有过切身感受和记忆的中国人。

与陈平先生相会

1988年初夏，在将要迎接“七·七”纪念日前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天津三个月的作者本人，偶然由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先生们那里借来一本很薄的书，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一位地方党史研究者所写的在内部刊物上刊登的文章，这就是本书的第二部的《一个特殊战略地带——长城线上“无人区”》。从此，我便知道了与我共同执笔的陈平先生的名字。在此以前，

我已去过几个地方作过旅游，就如前文所说过的，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感情，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再次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有的日本人以前虽然接触过一些情况，但是对“无人区”和“无人区”化政策，这样一个特定的课题，日本人是完全不知道的，可是一个中国人竟在顽强彻底地继续追求这一史实，使我甚为震惊；同时对所有日本人，过去都不能全面了解到这一历史事实也使我再次受到震动。

当然，象前文说过的，日本人也用自己的手添补了许多历史空白，这是非常珍贵的。可是，如果与中国人所作的工作相比，不得不说作得太少了。参照前边所说过的中国各地党史部门所作的调查研究，也可以这样说。同样，与中央级公开发表的或应该公开发表的资料相比较，也是如此。例如，1988 年 8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侃氏《事实的记录和历史的证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献资料选编》出版之际的论文中提到，特别整理了从 1931 年的所谓“满洲事变”(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期间，日本在中国实行的各种侵略政策为题的资料集，全集共 15 卷，800 万字，要花费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出版。大概此资料集中，也包括与本书有联系的华北地区讨伐战的内容。经与李侃氏直接面谈确认，不仅有这样庞大的资料，而且地方的调查研究工作也都有不同之处，两者结合起来，确实可以说，作者具有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

话题再回到陈平身上来。

我读完陈平先生的论文之后，当即想到能否让更多的日本人也能读到这本书。故在马上与青木书店联系谈判的同时，我本人亲自拜访请教陈平先生，同时并想按照陈平的论文中

所描述的地点进行实地调查。正好认识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留学生（研究生）丸田孝志。便机智地请他参与了翻译工作。通过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魏宏运、张宏祥，与陈平先生取得了联系。就这样，我和丸田在1988年的“七·七”事变五十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于唐山车站与陈平先生初次会晤。我选这个日子，是因从天津新闻中得悉，唐山不单是纪念“七·七”，而且还有如后所述有关冀东大暴动五十周年纪念日，并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之故。

唐山市在战争中是日本军控制的重要煤炭生产的地方，也是近年来（1976年）大地震后被大书特书引人注目的地方。来到唐山后，最初看到的是，东站的屋宇上高高挂着“抗日冀东大暴动五十周年纪念”红地白字的横幅，和“向抗日老干部学习”的标语。我们顺便了解到这个地方的特殊性的历史。

在车站出栅口，看到来迎的陈平先生，他是位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体格健壮，面色红润，假如第一次看到第二次不会认错有着倒八字形眉特征的，比预想要年轻得多的初老年人。我们虽然仅是初次见面，但是象有着共同研究课题的同事特有的情况，象老相识一样，在交谈中便很机智地接触到问题的核心。在我来访之前，已将这次访问、咨询的各项内容致函于陈平先生，其中我对他的论文非常感兴趣，关于追溯“无人区”之事，应把历史事实真实地告诉给每个日本人，不要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等观点业已陈明。陈平先生对我的意见有同感。他说，对有关“无人区”历史的研究，有着共同的认识和理由。其后，在本书出版之前，陈平先生和我们一同进行过三次实地调查，天津和唐山之间往返数次，进行提供资料、解答问题。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有着如此亲密往来的共事，在愿望上并不是梦想，在深厚的交往中，我们对他朴素无饰、谦虚的品格，报以深厚的尊敬和亲爱之感。如果没有他大量的调查研究积蓄和大力协助，这本书的问世将是不可能的。为此，在这本书中介绍一下陈平先生的经历，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 平 先 生 简 历

陈平先生，本名陈翰章，陈平是抗日游击战时用的别名，由于本人喜欢，至今还用这个名字。他于 1925 年生于河北省遵化县(现属唐山市管辖)鲁家峪，就是第一章开头写的那个村庄。这个村是含本村 6 个自然村组成的，陈平先生是这个村西峪出生的，当时该村仅有 10 余户人家，近处无水井，据说必须到离村 5 公里外的地方去汲水。

家境虽不算富足，但种有十几亩农田和果树园，过着不那么赤贫的生活，但是因一次与本村有势力的地主打官司而败落。其父是个中医，就到处行医谋生。1927 年 10 月，在遵化邻县玉田县为中心，暴发了以反对苛捐杂税的京东农民暴动，他父亲参加暴动，并初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他考虑到为了孩子们的将来，让其受教育，比遗留点家产为好，便让陈平入了本村小学，于 1938 年又进入简易师范学习。作为农村医生的儿子，生活是不那么好的，过着以杂粮为主食，没有副食品的苦日子。

1938 年夏，暴发了有名的冀东暴动，于 1939 年便很快地在遵化县山区形成了抗日根据地。是年，陈平先生因种种原因不能专心坚持学习，由学校中途退学，年仅 15 岁的陈平便在山里的小学校当了教师(当时在中国是少有的)。冀东暴动没

有参加，但是在他父亲和小学时教师们的影响下（这些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满怀强烈的抗日思想，曾两次投奔八路军根据地参加游击队，但都没有找到。在他任教的小学校隔壁，便是日本军据点，在那里每日有很多中国人被审讯和拷打，更激起了他对日军的仇恨，他便离开了学校，抛弃了教师的职业，投身到抗日阵营。

在八路军里，陈先生主要担当宣传工作。从 1941 年至 1943 年之间，由于日本军封锁、扫荡、讨伐，使“无人区”达到最严酷的境地，八路军的活动陷于最困难的时刻，就连正规军（第十三团）生活也是艰苦的，人们坚持在深山区，在被烧光的废墟上就地而眠，吃着野菜，并频繁地参加战斗。一次，他和民兵们遭到日本军的伏击，他从山崖跳下，险些丧了生命。但是受到了群众的营救和保护，潜伏在群众之间。他和民兵们，经常是避开正面战斗，对日军进行侧击和尾追，设法截下日军抢走的粮食和物品。陈先生每年都去看望以前救过他的群众。陈平先生亲切地深情地讲述着青春时代的情景。

日本投降后，内战期间，陈平先生由八路军的宣传队，转为新华社冀东分社的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唐山《劳动日报》副主编。1980 年，调至唐山党史办公室工作，1982 年任该办公室主任，现在是离休干部，但仍帮助做党史工作。他仍在继续研究他一生研究的课题——抗日战争和“无人区”。现在陈平先生的正式头衔是，河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唐山市党史研究会会长，各地方的人们依然称他为主任。

致 读 者

日本军把陈平的故乡变成了“无人区”,陈平先生对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仇恨和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促使他一直在坚持调查和研究活动;不仅如此,陈平青年时代的斗争经历和革命历程,使他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寄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之所以我能下决心,进一步调查日本军的暴行,一方面是对当时日本军制造“无人区”极为愤慨,再者,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对日本某些人篡改教科书事件的不满和斗争。虽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对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更不允许对历史任意歪曲、篡改和抹杀。

如果象某些日本人对教科书事件的态度那样,就象陈平所说,青年时代的战斗经历和革命历程将会被否定。所谓对日本某些人的愤恨,包括着两层意思,其一是陈平本人之恨,其二是无数中国人的民族之恨。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开头讲到的各地党史办公室工作情况,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本书不完全是中国人写的,也许在日本读者中,有人会说我过于为中国人操心。不过,我作为日本作家,我想不理解中国人的愤怒、悲伤、喜悦和希望,就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日中友好。但,这绝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中国人说的事情和要求,其本意是尽量直率地向中国人提出疑问、批评和要求,并且进行深入的调查。相信,与我合著的陈平先生也会理解我们。陈平先生在各地向别人介绍我们时,总是说:作为中国历史的日本研究者,要遵照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日中战争,是为了不让日中之间再次发生那种悲惨和不幸——“无人区”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感谢他的这番话,同时也想把这番话作

为本书出版的说明或主题思想。

（下略）

（郭维藩译）

日本军的“无人区化”政策实态的描述

——评《又一个三光作战》

〔日〕茨城大学教授　石岛纪之

日中战争中，日本军的战争犯罪行为，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活体实验、毒气弹的使用、阿片毒害等，是非常著名的，但是关于“无人区化”政策，人们还不大知晓。所谓“无人区化”政策，是日本军将沿万里长城南北两侧土地上居住的中国人驱赶出去，人为地制造成“无人区”，这是日本军的战略计划。日本军想以此消灭该地区的抗日运动，确保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的安全，并巩固华北这块日本军的后方基地。作为“无人区”的地域是：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北京西北），长约850公里，南北宽处约250公里左右，总面积可达约5万平方公里。

本书第一次正面揭露了日本军的“无人区化”政策。

本书最大特色是：由原八路军的宣传队员，现在是唐山市党史研究会会长陈平氏，与日本有代表性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者姬田光义共同研究的成果。

在去年夏季，当时在天津南开大学从事研究活动的姬田氏，在读陈平氏题为《一个特殊战略地带》的“无人区”论文后，

甚为震动，遂在着手翻译的同时，并由陈平本人作为向导，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这样合作的条件下出版的本书，第一部是姬田氏的调查报告，第二部是富有不同色彩的陈平氏的论文。第二部里有关“无人区化”政策及抗日游击战的正统论文，和第一部姬田氏所主张的夹叙夹议的富有个性的评述形式的写作，形成了巧妙的对照。

人 间 地 狱

读了这本书以后，对有关在日中战争中，日本军所犯的非人道、残暴的战争罪行，有了新的认识。书中提到，如著名的旅游圣地承德地区的万人坑，是当年日本军、宪兵、警察等势力逮捕杀害的无数中国人的肉丘坟，现在在那里还残存着好多的尸骨。对“无人区化”政策实行得最彻底的位于长城北侧的兴隆县，大约有2000多个村庄被破坏，并将约占全县八成的人口驱赶至199个“集团部落”之内。对一个被视为与八路军有密切关系的村庄，将其成年男子几乎杀光，人们称为“寡妇村”。

在中国人称为“人圈”的“集团部落”里，连最低水准的粮食和衣服都很少，更由于居住环境恶劣，传染病的流行，再加上日本军不断地检举迫害，就如文字的涵意成为“人间地狱”。正如姬田氏对“无人区化”政策的评述，是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有意识追求的，是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暴行集大成的体现，是有其确切意义的。

中国对在15年战争中史料的搜集整理，除对有关日本军侵略政策史料出版15卷之外，各地方也在进行着调查、研究、整理。其中之一，如陈平氏论文的发现，对迄今为止很少为人

所知的"无人区化"政策的真实情况，为本书所揭露，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

（郭维藩译）

（日本《经济学家》1989年11月14日版，书评）

《又一个三光作战》

沿万里长城线上的“无人区”

强制村民移居揭露了旧日本军的政策

日中共同研究的成果

日中战争(1931—1945年)时期,旧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施行的“无人区化”政策的实际情况,由日中两国研究者初步正式研究,并进行了揭露。

围绕日中战争的研究,如对南京大屠杀和旧日本陆军七三一部队(石井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及毒气战的研究,已有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扎实地进行着,但对“无人区化”政策的真实情况,至今几乎还没提出来,对其内容还不大清楚。现由日中两国的研究家,共同在中国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到将村民强行驱赶出去,人为地制造“无人区”的政策,即日本军在华北地区推行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其地域、空间之辽扩及经过长年累月周密地策划实施,有系统的展开了大量杀人,并想抹杀中国人的作战能力种种罪行,得到了证实和认定。

担任共同研究任务的是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52岁)和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历史研究员陈平先生(64岁)。陈先生历任新华通讯社记者、唐山市党史研究会会长。先生毕生研究“无人区”,现在还在继续研究活动。姬田教授等由去年3月至

今年7月，在当地访问了许多有关人员，在亲自听取调查的同时，并对有关各地党史办公室存有的记录资料进行了了解。了解到“无人区化”的政策是：由山海关至河北北部，约1000公里，沿长城内外地带，将中国人强行赶出，禁止居住，称为“无住地区”。更甚者禁止耕作，称为“无住禁作地区”。企图对以八路军为中心的抗日运动加以扼制，并想确保北京周围的防卫等重大意义。

由祖先留传下来的土地上被赶出的中国人，转到日军设置的“集团部落”去居住，并由日军和警察加以严密监视和管制。在此过程中曾遭到中国人激烈的反抗，日本军反复多次进行了大量的屠杀。

该教授的调查报告，举了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的一个事例：该村由1941年2月开始，曾遭日军大规模地“扫荡”和“讨伐”，将村民的房子烧掉，老人和孩子被烧死。对八路军和干部强迫坦白，拒绝者当即予以枪杀。

当地的一位老人和姬田教授面谈时说：“不许我们住在这里，让搬到别的村子去。人们都哭着离开了村庄，以后这些人都被日军用军刀砍死了，只有我是幸存者”。他成了历史见证人。

承德市党史办公室主任说：“日本军为了把中国的民众和八路军分离，制造‘无人区’，对该地区进行大逮捕、大‘讨伐’，被杀害的尸体都扔到‘万人坑’。其正式的统计数字为4.6万人。由1933年开始，至1944和1945年，大‘讨伐’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是他的证言。

农民们按着日本军的命令，把养育自己的房子毁掉，背着生活用具，进入指定的“集团部落”，这里没有房屋，只好在空

地上生活。

对日本军长时期大规模的“无人区化”政策，至今只有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作了一些简短记载，说，对治安难以保持的村庄，暂时实行移民，造成了“无人村”。又提到沿万里长城仅有幅度4公里的带状地区划为“无人区”。

但当时的北部地区的部队长铃木启久回忆说：武力强制村民搬出，曾遭到村民怨恨；八路军则利用“三光政策”进行宣传，给日本军在作战上也带来了严重的神经紧张。这也是事实。

对持续进行实地调查的陈平先生，他的故乡曾经就是“无人区”，他本人就是真实的受害者。他在致姬田教授的信中说，促使我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如教科书事件，及某些日本人对战争认识的态度，这都是不能允许的。他作了如此的倾述。

这个研究成果，最近将由青木书店出版，书名为《又一个三光作战》。

（日本《每日新闻》1989年8月14日，夕刊，第3版）

《又一个三光作战》

姬田光义 陈 平著

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以守卫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为名，对沿长城线的南北的地区，将大约140万的当地居民逐出，设置了“无人区”，有十数万死者及被害的居民，其苦难的情况，是难以言喻的。并涉猎了华北地区有关各县存有的资料，并调查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对此悲惨的历史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这是日中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

（丸田孝志译，青木书店出版）

（日本《朝日新闻》1989年10月15日第12版）

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中日两国历史学家最近揭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

日军灭绝人性的“并村计划”

〔法新社东京1989年8月15日电〕题：调查报告透露日军在中国屠杀的情况

由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说，从1933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军为执行庞大的“并村计划”而屠杀了4.6万名中国人，其目的是在华北建立一个“防御缓冲地带”。《每日新闻》于今天——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4周年的日子公布了这个小组的调查报告。

由中国历史学家陈平和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牵头的这个由学者组成的小组说，日军强迫一些中国村庄的居民全部撤走。凡是不肯撤走的老百姓都被杀了。这些历史学家从1988年3月以来一直在收集材料，其中包括幸存者叙述目睹情况和官方档案里的文件。

据这些材料说，日军试图把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长150公里的地带上所有的中国人统统赶走，以便于守卫北京。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一个文件揭露，“日军为了切断人民和中国军队的联系而建立无人区”，被屠杀的老百姓达4.6万名。历史学家们想从日本方面寻找文件，但是遇到了重重困

难。

他们在日本防卫厅的一份文件里找到简单提到并村计划的情况，透露“把住在难以控制的村子里的居民都赶走，使村庄里空无一人”。

当时华北日军司令官铃木说，他的军队用武力实行并村计划。他还说，人民对这个计划恨之入骨，因此，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武器”。

由这些历史学家的调查报告汇编的一本书不久将在日本出版。